NO. 28
OCT 2026

在野堂™

Opposition Party
Freedom. Truth. Resistance



OPPOSITION PARTY

海內外民主實踐與觀察

網址：www.ZYD1998.com

策劃：毛慶祥

火種不滅，精神長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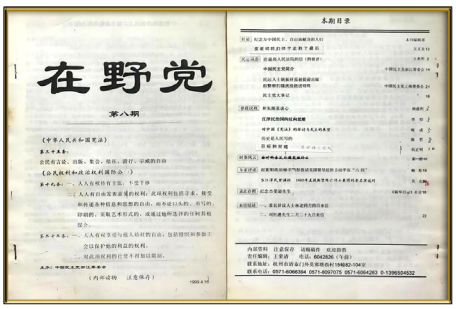
The greatness of a n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its moral character can best be judged by how it treats its people

中國民主黨主辦

目录 Contents

開篇 Prologue 01
02 目錄 Contents
在野黨簡介 About the Opposition Party 03
思想火種 Seeds of Thought 05
05-07 人物專訪 Voices of Change
08-09 民主火種 The Spark of Democracy
真相中國 China: The Truth 10
10-17 時事評論 Current Affairs Commentary
18-39 社會評論 Social Commentary
民運之路 The Road to Democratic Activism 40
40-46 民運之聲 Voice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
47-49 民運行動 Democracy in Action
50-53 民運同道 Fellow Democracy Activists
連載 Serial 54
54-60 作品連載 Serialized Works
雜志社介紹 About the Magazine 61

《在野党》简介



图为《在野党》第八期

《在野党》杂志是中国民主党组党时期唯一的党刊，以传播中国的民主、人权等理念为宗旨，成立于 1998 年 9 月。**《在野党》**由毛庆祥先生倡议，并在中国浙江省创办，浙江筹委会成员轮值各期的编撰。出刊至第 9 期后，绝大多数成员被抓，刊物由聂敏之、陈树庆、王荣清继续出刊至第 11 期，因聂敏之等人被抓而停刊。

但民主火种一直未灭，在历经 27 年之久，在毛庆祥、谢长发、朱虞夫和郑存柱等海内外中国民主党人的共同努力下，期刊于 2025 年 6 月 25 日在美国洛杉矶成功复刊。它正在以全新的面貌，延续前辈的精神火炬。

复刊**《在野党》**杂志分为《思想火种》、《真相中国》、《民运之路》、《视频专栏》、《作品连载》、《档案馆》等内容模块，设有官方网站 https://www.zyd1998.com，并于每月 25 日刊出电子期刊，纸质期刊会同步发布，敬请订阅。

主要成员介绍：

毛庆祥（1950 年 5 月 24 日），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新**《在野党》**杂志的发起者。浙江杭州人，自由撰稿人、人权活动家。1976 年 " 四·五运动 " 参与者，被关押三个月；1978 年起投身杭州民主墙运动，担任《四五》、《华东》等民刊编辑，1981 年因 "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 判刑三年 。1998 年积极筹建中国民主党，主编党刊《在野党》。1999 年 6 月被捕，11 月以 " 颠覆国家政权罪 " 获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直至 2007 年 9 月 14 日刑满获释 。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

朱虞夫（1954 年 2 月 1 日），现任**《在野党》**杂志总编辑。浙江杭州人，诗人、异议作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1978 年底投入杭州民主墙运动，是发起人之一，主编《四五》月刊，并多次被传唤、抄家。1989 年 " 六四 " 因 " 参与动乱 " 被收容审查，撤职；1998 年积极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筹备工作，并于当年 11 月当选为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秘书长、全国筹委会筹委。1999 年 6 月 19 日被捕，9 月 15 日正式以 " 颠覆国家政权罪 " 判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2006 年 9 月 15 日出狱。出狱后仍持续民主运动，2007 年再次被捕判刑二年、剥权二年；2011 年因 " 茉莉花运动 " 被捕。判刑七年、剥权三年，累计服刑达 16 年。出狱后仍被严密监控，直至胃癌晚期出境治疗，目前居住在美国。

谢长发（1951 年 10 月 7 日），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主席，是复刊**《在野党》**杂志的倡议人。湖南望城县坪塘镇人，民主异议人士。1989 年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任 " 工自联 " 领袖，六四后坚持公开谴责当局暴行，被判劳动教养两年。1998 年与潘明栋等筹建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屡次遭拘留；自 2002 年起坚持定期聚会，联系各地民运人士并资助经济困难者。2005 年撰写《中国民主党宣言》、《昭告海外同胞书》等文，并筹划召开全国代表大会。2008 年因批评汶川地震 " 豆腐渣工程 " 再度被捕，2009 年以 " 颠覆国家政权罪 " 判刑 13 年。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

郑存柱（1967 年），现任**《在野党》**杂志社社长。安徽合肥人，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企业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党员、海外党部高层人士。1989 年六四期间发起合肥学生运动，组织发起安徽省高校自治联合会并率学生赴京声援，是安徽省与政府谈判的学生代表之一。2000 年在上海秘密参加中国民主党，2006 年在美国洛杉矶建立海外联合总部，历任全国联合总部副秘书长及副主席、主席等职务。

组织框架介绍：
总编辑：朱虞夫　社长：郑存柱　出品人：景辉辰

荣誉主编（目前均居住在中国大陆）：**毛庆祥、谢长发、胡石根、陈西、吕耿松、查建国、陈树庆、许万平、刘贤斌、胡明君、 黄燕明**

《在野党》设副总编辑、副社长、轮值总编辑、副主编、编辑部、责任编辑部、美编部、信息技术部、采访部、翻译部、收稿部、校对部、宣传与发行部等职能部门和行政部、财政部、外联部、人权观察部等综合部门，并设有日本分社，成员多为中国民主党的海外新生力量。



图为《在野党》复刊第十二期杂志社部分成员 - 洛杉矶

Introduction to The Opposition Party

The Opposition Party was founded in September 1998 as the only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during its formative years. Initiated in Zhejiang by Mao Qingxiang, with members of the Zhejiang Preparatory Committee editing in rotation, the journal was dedicated to advancing the values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in China. By its ninth issue, most of its editors had been arrested; even so, Nie Minzhi, Chen Shuqing, and Wang Rongqing continued until the eleventh issue, when further arrests forced it into silence. For years, the publication remained a symbol of democratic aspiration and the sacrifices borne by its founders.

After twenty-seven years, the flame was reignited. On June 25, 2025,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veteran leaders Mao Qingxiang, Xie Changfa, Zhu Yufu, and Zheng Cunzhu, together with a new generation of overseas activists, The Opposition Party was successfully revived in Los Angeles. Its reappearance not only honors those who endured prison and repression but also reaffirms the commitment to record truth, preserve memory, and carry forward the ideals of freedom and human dignity.

The renewed The Opposition Party is published monthly, in both digital and print editions, with sections such as Seeds of Thought, China Unveiled, Paths of the Movement, Video Columns, Serialized Works, and Archives. It maintains an official website at www.zyd1998.com As a platform for dissent, it seeks to amplify voices silenced inside China, to link the efforts of activis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o ensure that the struggles of past and present are neither erased nor forgotten. Above all, it stands as both a witness to history and a torch for the future, sustaining the spirit of opposition through changing time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你可以关押我的身体，但无法改造我的信念”

—— 十四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一位民主人士的坚持与守望

记者：贾嘉　沈美花



人物简介

陈树庆，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中国民主党成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与公民权利问题。

陈树庆出生于普通家庭，早年从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公平、普通民众处境以及公共权力运行的观察，逐渐形成对民主、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思考。1989 年“六四事件”对其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民主化道路。

此后，陈树庆参与中国民主党相关活动，并从事民主、人权理念的传播与相关刊物工作。因参与和推动民主运动，他曾多次遭遇政治打压和监禁，并经历了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

在长期的政治压力和监禁生活中，陈树庆始终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可能依靠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或某一种单一力量完成，而需要海内外不同群体长期共同努力。

如今，陈树庆依然关注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他同时也呼吁海外民运人士和年轻一代，在坚持理想、关注中国社会的同时，首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健康，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

当谈及自己为何能够长期坚持时，他用一句简单而坚定的话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采访导语

十四年六个月。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漫长得足以改变人生的时间。然而，对于陈树庆而言，这十四年六个月不仅意味着铁窗、失去自由，也意味着一次关于信念、意志和坚持的考验。

在中国的监狱体系中，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一样，被纳入所谓的“教育改造”体系。思想要被改造，生活习惯要被改造，纪律要被改造，劳动也成为所谓“改造”的一部分。

但面对这一切，陈树庆的态度始终非常明确：“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也不会改变。”

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他十四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中最核心的坚持。

一、监狱里的“改造”

采访者：您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多的时间，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陈树庆介绍，中国监狱对犯人有一整套所谓的“改造”体系。“不管是政治犯还是普通刑事犯，他们都认为需要改造。”这种改造包括思想、生活习惯、纪律以及劳动等多个方面。

陈树庆说，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中长期存在一种观念，即认为人可以通过环境和制度进行重新塑造。“他们认为，人是可以被改造的，所以监狱里面也要对犯人进行各种改造。”其中，劳动是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下到车间，就要生产一些劳改产品。很多劳动都是强迫性的、没有报酬的。”

对于陈树庆而言，监狱生活同样意味着严格的管理、劳动以及长期失去自由。但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思想信念不会因为进入监狱而发生根本改变。

二、“他们想改造我，但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记者贾嘉问陈树庆：“您刚才说，毛泽东认为人都是可以被改造的，那么他们改造成功您了吗？”

陈树庆的回答十分直接。“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么认为的。但是我，是不能被改造的。”他说，自己很早便向相关人员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态度。“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但如果他们要求自己放弃原则和信念，他的态度同样明确：“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都不会改变。绝不投降。”

这并不是一句情绪化的表达，而是他长期以来对自己行为和原则的一种界定。在他看来，一个人当然可以反思自己、修正自己的错误。但是，坚持真理与被迫放弃信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如果我认为自己错了，我当然可以改变。但是如果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我不可能因为压力而去接受。”

三、在监狱中寻求一种“相安无事”

尽管拒绝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陈树庆也并没有选择无意义地制造冲突。他表示，监狱管理人员后来也逐渐了解了他的态度。双方形成了一种相对现实的相处方式。

“他们的意思是，不要去尽可能破坏或者冲击他们

现有的秩序。”即使陈树庆认为某些制度并不合理，监狱方面也希望他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意见。“他们说，你认为哪里不合理，可以向警官或者领导反映。能改的，我们尽量改；不能改的，也会说明原因。”

对于这样的态度，陈树庆也选择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应对。“所以后来在监狱里，我们之间相对来说还是能够相安无事。”

四、来自家人与海外社会的关注

陈树庆认为，自己在监狱中的处境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与多个方面的关注有关。“我要感谢我的家属，也要感谢海外的民运人士，以及全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各种组织。”他说，国际社会和海外人士对政治犯、人权状况的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外部监督。“如果共产党对我欺负得太厉害、压迫得太严重，也会担心造成不好的影响。”

进入监狱时，一位工作人员曾向他表达过这样的态度：“我们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的。不是我们希望你来的，既然你来了，我们这里也不是只针对你一个人。”对方同时表示，在监狱管理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会尽量给予相应照顾，但陈树庆也需要遵守基本规定。

陈树庆对此采取了相对理性的态度。他表示，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自己也愿意遵守基本的管理规定。

五、十年牢狱中的劳动生活

陈树庆介绍，在监狱中，自己最初也经历了严格的管理和劳动。在经过相关管理阶段之后，他被分配到监区劳动。“我下车间干了大约三个月的活，后来到了后勤岗位。”

相比长期在生产车间工作的犯人，他所承担的劳动压力相对较小。“后勤也是每天工作，从早到晚都要出工。但是和车间里的犯人相比，生产任务压力没有那么大。”

他坦言，监狱中的劳动基本没有报酬。“这些劳动都是无偿的。”

虽然相比其他犯人获得了一些相对宽松的安排，但十多年的监狱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是轻松的经历。然而，在谈到这些往事时，陈树庆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怨恨。更多时候，他强调的是一种坚持。

六、“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采访过程中，记者多次表达对陈树庆的敬佩。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众多坚持民主理念的人中的一个。“包括朱虞夫在内，我们这样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太多了。”他说，许多人所经历的苦难和付出的牺牲，比自己更加巨大。“很多人付出的牺牲比我大，做的工作也比我多。”

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把个人的经历过度英雄化。在他看来，推动社会进步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业。“中国的民主事业，最终的成功，不可能靠哪几个人或者哪一帮人的努力就能够实现。”

七、海外民运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谈到海外的民主人士，陈树庆表达了深深的感谢。他认为，长期坚持关注中国民主、人权问题的海外人士，同样经历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困难。“海外民运这么多年来，也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大家能够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

但是，他同时强调，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和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在他看来，海外人士对于国内民主人士的支持，不仅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守望。“有了海外朋友的坚持和对国内的关注，对国内继续为民主奋斗的同仁来说，可以减轻很大的压力。”“这种守望相助、相互照应，可以让国内的人更加安心，也更有信心。”

因此，他希望海外民主人士能够继续坚持：“你们的坚持非常不容易，作用也非常巨大。”

八、中国的民主事业，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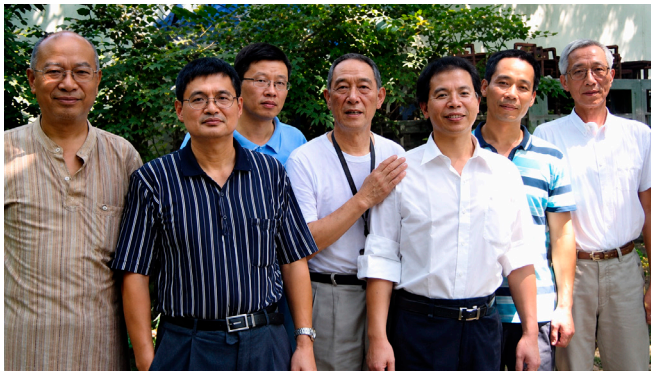
陈树庆认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未来，不可能依靠某一种单一力量。“光靠海外民运肯定不行，光靠国内的人也不行，光靠体制内的人也不行。”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不同群体、不同力量共同参与。“最终一定是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海外民运人士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海外民运绝对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当然，他也理解海外民运长期面临的复杂环境。其中包括组织能力、内部协调以及外部干扰等各种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人非圣贤。”因此，更重要的是不断完善自己，提高组织能力，在现实条件下尽可能做好能够做的事情。

九、给海外朋友和年轻一代的寄语：首先要坚持，也要照顾好自己

采访接近尾声时，陈树庆也向海外的朋友以及年轻一代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坚



前排左起：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吴义龙、陈树庆等，此照于 2010 年 9 月 14 日吴义龙刑满出狱时所摄

持下去。“首先，你们自己要坚持下去。”

但坚持并不意味着忽略自己的生活。他特别强调，应该首先把自己的生活、家庭和身体照顾好。“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把家庭搞好，把身体搞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能力，为自己关心的事业做一些事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国内的各种维权事件，可以多一份关注。”这种关注可以是一篇报道、一次转发，也可以是持续的记录和守望。“各种媒体，多一份报道，多一份转发，多一份关注。”

陈树庆相信，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对于仍然身处国内、坚持推动民主与人权的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国内奋斗的人，能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你们的帮助和作用。”

人物结语

采访即将结束时，陈树庆再次提醒年轻的朋友们：“你们也要做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家人的身体。”

简单、朴实，却又充满温度。

十四年六个月的监狱生活，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信念。经历过政治迫害，也没有让他失去对未来的希望。

当采访者感慨他的坚持时，他没有把自己视为英雄。他说，历史上有太多比自己更加勇敢、付出更多的人。平静话语中不经意间，他突然说出了一句让采访者触动心灵的话：“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或许，这句话正是陈树庆人生最简洁却最有力的注脚。他未必认为自己是英雄。他只是认为，当一个人认定某件事情是正确的，就应该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力去做。因为他相信：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但无数人的坚持，最终会汇聚成为改变历史的力量。

采访尾声：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

采访已经结束，当我们抬头将沉浸的目光转向旁边一直安静倾听的朱虞夫先生时，朱老提到了一个细节。他说，在自由雕塑公园里，就有陈树庆先生的名字。

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或许只是一个名字。但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一个名字的背后，不只是一段人生，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从最初对社会不公的朴素思考，到逐渐形成对民主与自由的坚定信念；从参与民主运动，到遭遇政治打压；从第一次被关押，到经历两次累计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 —— 陈树庆的人生，记录着一位中国民主人士所走过的道路。

在采访中，陈树庆并没有把自己描述成英雄。相反，他多次强调，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中，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付出的更多，牺牲的也更大。然而，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谦逊而忽略他的经历。

如今，自由雕塑公园中留下的那个名字，或许正是对一段历史最安静的记录。

陈树庆。

三个字的背后，是岁月，是选择，是失去自由的漫长时光，也是一个人始终没有放弃的信念。

采访结束了，那个平静又充满力量的声音不断出现在我耳边：“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毫无疑问，这句话就是陈树庆人生最简单、也最有力量的注脚。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会被更多人看见。而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也值得被记录、被讲述、被铭记。因为历史不仅属于那些站在聚光灯下的人，也属于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自由与尊严而作出选择的人。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美编：胡海宁



记者贾嘉（左）沈美花（右）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政府办公楼金碧辉煌

—— 极权主义现象之九

作者：张兴贵

一、从“仆人”到“新神”。

民主政体的政府建筑是功能性的，因为权力被视为委托 —— 民众暂时让渡部分权利用于公共治理，故建筑必须朴素、透明、可问责。极权政权则完全相反：权力是占有，是统治集团对整个社会的永久征服与所有。政府大楼必须成为新神殿，被视觉化为“永恒、高高在上、不可触碰”。大理石、镀金、巨型柱廊、水晶吊灯、轴线对称的宏大广场，所有元素共同构成一种空间宗教。民众走进或路过这里，不是感受公共服务，而是被强迫进行一场日常的臣服仪式。个人在这种尺度面前瞬间渺小化、卑微化、原子化，从而心甘情愿地将灵魂上缴。心理学与神经科学早已证明：极端尺度与奢靡材质会触发人类大脑原始的敬畏 - 服从回路，让个体瞬间感到自身的渺小、卑微与可有可无。在这样的建筑面前，人不再是公民，而是蚁民；不再是权利主体，而是被恩赐的奴隶。布尔迪厄的“符号暴力”在这里被发挥到极致：权力通过审美霸权将不平等自然化 ——“政府就该这么辉煌，质疑它就是低俗。”

政府办公大楼的金碧辉煌，是对现代政治文明的公然否定。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好不容易把“君权神授”打入历史垃圾堆，极权主义却以“人民”、“民族”、“革命”等新名词，把神授君权原封不动地复活了。它告诉我们：专制从未死去，它只是不断换装；它蔑视民众，把他们当作需要仰望圣殿的贱民。

二、榨取性掠夺的盛大献祭。

它通过国有垄断、土地财政、隐形税收、货币超发等手段，将社会创造的财富最大限度吸入权力中枢。然后，它把其中最肥美的一块献祭给权力自身的偶像 —— 那一座座金碧辉煌的大楼。为什么不把钱用在医院、学校和民生？因为极权不需要健康的、受教育的、有尊严的民众，它只需要驯服的、可动员的、保持最低生存线的螺丝钉。民生改善是危险的，它会滋养独立人格和权利意识；而一座奢华大楼则是安全的，它只生产仰望、恐惧和感激。这不是配置失误，而是优先序的彻底颠倒：权力再生产永远高于人民生存。

更恶劣的是，这种掠夺自带腐败激励。层层转包、巨额回扣、利益输送，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的忠诚粘合剂。官员们在金碧辉煌中分赃，在人民苦难中团结 —— 这是极权体制的治理术。统治集团成功地把官僚和资本精英绑定在同一辆战车上：大家一起贪腐，一起建造，一起分赃，一起高唱“为人民服务”。民众被榨干的血汗，最终化作水晶吊灯上的亮光，映照出极权最下流的嘴脸 —— 它一边高喊“共同富裕”，一边把真金白银堆在自己宫殿的门槛上。

政府办公大楼的金碧辉煌，是极权主义对现代政治文明最赤裸的背叛。它把“主权在民”彻底颠倒为“主权凌民”。它用最华丽的语言告诉每一个人：你们不配拥有，你们只配仰望和奉献。任何还在声称“这是为了国家形象”、“为了提振民族自信”的辩护，都是对智商和良知的双重侮辱。真正的国家形象，来自民众的自由、尊严与富足，而非统治者宫殿的镀金厚度。

编辑：胡景　校对：熊辩　美编：胡海宁



语言腐败

—— 极权主义现象之十

作者：张兴贵

官方通报充斥着毫无信息量的套话与宏大叙事，而民间舆论则退化为情绪化的黑话与狂热的政治正确复读，这是极权主义的成功、理性的失败。如果语言中没有“剥削”这个词，你就无法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奴役；如果“自由”就意味着在党国划定的圈内活动，自由就成了一个无法被接受的东西，认为自由是不那么美好的。极权主义通过不断更迭词汇和更改词语的含义，直接从源头上卸载了人类的批判性思维功能。

一个是造新词。极权主义制造新词，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丰富”表达，恰恰相反，是为了“窄化”语言，人为制造思想的盲区。乔治·奥威尔在《1984》说过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真理：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缩小思想的范围。在正常的文明中，人类发现复杂的现象，于是创造更细腻的词汇去逼近真相。但在极权逻辑下，这个过程被逆转了。政权通过不断向社会注入大批具有“政治隔离功能”的新词，强行夺取语言的解释权。这些源源不断被发明出来的新词，本质上是“认知阻断剂”。它们首先将苦难“技术化”与“无害化”，因公权力膨胀而受难的血肉之躯，被概括为“社会面动态清零”、“全周期闭环”、“不可避免的代价”时，苦难的个体性被消灭了，人类的痛苦变成了报表上冰冷的统计数字；当经济结构性崩溃、民众失去生计被概括为“灵活就业”、“自主择业”、“轻微结构性微调”时，体制的无能被精巧地转化为个人的主动选择；对于叛逆者，它们为人为制造的敌我对立发放“政治标签”，诸如“历史虚无主义”、“境外势力”、“害群之马”等新词，没有任何严谨的学术定义，唯一的用途就是充当思想的捕兽夹。只要你表达质疑，这个标签就会啪的一声扣在你的头上。极权政权不断制造新词，这不是在发明语言，这是在阉割大脑。

另一个是语言污染。如果说不断制造新词是定向清除，那么更改定义和内涵等语言污染就是对整个社会进行“认知重组”，让美好的词语成为民间自主的禁忌，如小姐等。这种污染的核心机制是“词义的定义转向并崩溃”，成为模糊的、甚至恶心的。极权政权最热衷于霸占人类文明中最美好的词汇：民主、自由、法治、正义、光荣。它们将这些词汇作为政治图腾高悬，却在现实中践行着完全相反的暴政。当“法治”等同于权力的任意裁决，当“民主”等同于唯一的赞成票，语言的文字本身与客观现实发生了剧烈的断裂，谁还相信这些词语的本来内涵呢？为了在长期的政治宣教与高压环境中生存，个体被迫发展出汉娜·阿伦特所说的“不假思索的顺从”，或者奥威尔笔下的“双重思想”，也就是在大脑中同时承认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并同时接受它们。你明知那是谎言，但你必须熟练地、甚至狂热地用它来论证真理。当整个社会都习惯了这种精神分裂式的表达，语言就彻底失去了衡量真伪的功能。它变成了权力对个体尊严进行肉刑式折磨的羞辱工具，它让你在公开赞美奴役的过程中，自愿完成了人格的阉割。

当制造的新词和语言污染完成了对精神生态的清洗，公共空间就会呈现一种令人绝望的“语言荒漠化”。你会看到，整个社会的表达呈现出惊人的低幼化、同质化。人们不再具有阐述复杂因果关系的能力，不再具有进行严密逻辑论证的耐心。所有的公共讨论，最终都被简化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捕风捉影。为了安全，你开始在体制赐予的新词框架内为自己辩护；在日常生活中，你也开始熟练运用那些被污染的词汇去解构苦难、粉饰太平。你以为你只是在向现实低头，实际上，你正在用极权主义喂养的垃圾，去杀死你原本健康的理性肌体。你最终会发现，你不是在被迫说谎，而是你已经失去了说真话的能力。你成了你所反对的体制的一部分。

编辑：胡景　校对：熊辩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习近平再次访美

—— 旧金山留下的警示

作者：冯仍

2026 年 9 月 24 日，习近平将再次走进白宫。白宫已经正式公布行程，习近平与彭丽媛将于 9 月 23 日抵达美国，第二天举行国事访问，当晚出席国宴。

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这当然是一场受到高度关注的外交活动。但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我关注的并不只是白宫里的会谈，也会想到三年前旧金山街头发生的事情。

2023 年 11 月，习近平前往旧金山参加 APEC 峰会。当时，大批维吾尔人、西藏人、香港人以及中国民主人士来到街头抗议，也有大量支持习近平和中国政府的人前往欢迎。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同时出现在街头，在美国本来并不是什么问题，因为无论支持还是反对一个外国政府，都属于表达自由。

真政府，也允许人们反对中国政府。一个人在街头挥五星红旗，只要和平守法，这是他的权利；另一个人在旁边举起批评习近平或者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标语，同样也是他的权利。

问题从来不是谁可以表达，而是谁试图让另外一方不能表达。

我来到美国以后，对这一点的认识越来越深。一个社会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所有人讲同一种话，而是彼此意见完全相反的时候，法律仍然保护双方说话的权利。一个人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不能因为不同意，就抢走我的标语、殴打我或者威胁我的家人。

这也是为什么“跨国镇压”这个词这些年越来越受到美国社会关注。

所谓跨国镇压，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政府把对国内异议人士的监控、恐吓、骚扰甚至强制手段延伸到境外。美国国会举行过专门听证，美国司法部近年来也连续处理涉及中国政府海外活动的案件。2025 年，美国司法部曾宣布逮捕两名被指为中国国家安全部在美国从事秘密活动的人士。司法部明确称，中国国家安全部承担境外情报和政治安全任务。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案件中的刑事指控仍应按照法律程序，由法院最终裁决。

这种事情距离加州并不遥远。

位于南加州耶莫的自由雕塑公园，也曾进入美国司法部调查文件。联邦调查人员指称，有人员曾受命对中国异议艺术家进行监视，包括秘密拍摄、记录车辆信息以及安装 GPS 追踪设备。

这些案例放在一起看，就会明白为什么 2023 年旧金山发生的事情不能简单理解为“两群中国人在街头打架”。

如果有人只是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发生普通冲突，那当然应该由警方按照普通治安案件处理。但如果背后存在外国政府官员、情报机构或者受到其指挥和资助的组织参与，那问题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它已经不只是中国人之间的政治争论，而涉及美国境内的言论自由、公共安全和国家主权。

这也是我读到这份有关习近平再次访美的材料时，最关注的一点。

三年前旧金山发生过什么，现在已经留下大量影像、调查报道和政府记录。这一次习近平来到华盛顿，无论欢迎他的人，还是抗议他的人，都应该受到同样的法律保护。支持习近平不是犯罪，反对习近平也不是犯罪；挥舞五星红旗受到宪法保护，举起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标语同样受到保护。

真正需要防止的，是任何一方把暴力、威胁、跟踪和恐吓带进政治表达之中，更不能允许外国政府利用自己在美国的影响网络，把中国国内压制异议的方式复制到美国街头。

习近平这次访问美国，白宫里的外交当然重要。

但对白宫之外的很多中国人来说，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值得观察：三年前旧金山发生的事情，这一次会不会再次发生？

美国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不只关系到中国异议人士，也关系到一个更基本的原则 —— 来到这片土地以后，一个人是不是仍然可以因为自己的观点，自由地说话，而不必继续害怕来自另一个国家的权力。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王滨　美编：胡海宁



2026 习访美和平抗议被残酷镇压

—— 极权阴影下的海外暴力与公民觉醒

作者：张磊

2026 年 9 月 23 日中共领导人访美期间，大批追求自由民主与宪政的海外华人自发聚集，发起和平集会抗议。一侧是手持宪法第一修正案标语、高喊民主诉求的和平示威者；另一侧，则是身着风衣、头戴墨镜口罩、手持隐蔽武器的黑衣暴徒。这场本应受美国宪法与国际人权公约双重保护的和平表达，却遭遇了来自中共海外组织的系统性暴力打压。

现场撕开了伪装，证实了一个冰冷的事实：中共的跨国镇压不仅真实存在，且已演变成一套高度组织化、预谋化的海外暴力机器。这不仅是对个人基本人权的剥夺，更是对自由世界领土主权与法治尊严的直接挑衅。

一、 恐惧的逻辑：极权的独占性与暴力异化

中共为何不远万里在自由土地上无情打压和平异议者？

根源在于极权体制的内在逻辑：它绝不容许存在任何不受其掌控的反对力量。海外华人爆发的声浪直击其统治合法性的脆弱核心 —— 它证明了即便摆脱了高墙与审查，人们对自由的追求依然炽热。为将这种反抗扼杀在萌芽状态，打压行动展现出严密的战术分工：

1. 战术挑衅与激怒：打手队伍有组织地冲散抗议阵型，用言语挑衅与肢体碰撞制造冲突，意图抹黑示威者的和平属性。

2. 伪装武器化工具：现场打手将收缩金属旗杆作为隐蔽的攻击型武器进行戳刺，并利用大面积国旗与雨伞遮挡暴行。

面对具备专业化打击能力的暴力组织，本着和平初衷的示威群众因缺乏防范经验，瞬间陷入势单力薄的被动局面。

二、 暗处的全景监视：“神秘黑衣人”与寒蝉效应

冲突外围，穿梭着一群训练有素的“神秘黑衣人”。他们无统一制服，但队形工整、行动敏捷。其功能极其明确：冲突前线充当暴徒，外围则进行全景监视与资料搜集。

他们统一佩戴棒球帽、深色口罩、墨镜与耳机对讲机，三五成群地拿着相机，对示威者的面部进行系统性拍照。常识与逻辑表明：绝无普通围观者会以如此反常的装束，系统搜集他人的面部信息。他们显然是精心挑选、派驻海外的执行者。

这种严密隐匿身份的行为，恰恰揭示了其内心的虚妄与恐惧：

1. 恐惧身份曝光：害怕真容暴露后引发人肉搜查，揭穿其“一边执行压迫任务，一边将家人送往西方享受自由”的丑陋双标；

2. 恐惧法律制裁：害怕违法搜集与暴力行为被递交至联邦调查局（FBI）或国土安全部（DHS），触犯《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及侵犯公民权利相关法律，导致签证吊销与刑事追责。

这群黑衣人正将极权的“全景敞视”监视机制非法复制到自由世界。他们举起镜头，意在制造无形的“寒蝉效应”—— 通过将血脉与亲情“武器化”，把对个体的控制转化为对远方亲人的无上限威慑，迫使海外异议者在恐惧中选择自我审查，进而将极权的控制网络延伸至太平洋彼岸。

三、 网络与现实的双重绞杀：水军围剿与荒谬污名

这种系统性的镇压并未止步于实体现场，而是顺着网络世界延伸开来，形成线上线下的“双重绞杀”。当受害者将现场遭遇的暴力打击与黑衣人的监视的视频发布到网络平台后，迅速遭到了中共水军与“小粉红”的集群式围剿。

他们在评论区疯狂抹黑与攻击，给出的理由极其荒谬：或污蔑示威者“拿了反华势力的钱”、“是为了钱才表演”、说他们都是大陆逃亡到国外贪官或是重刑犯的后代；或扣上“汉奸”、“卖国贼”数典忘祖的道德意识形态帽子；甚至面对铁证如山的视频，睁眼瞎说声称“视频是剪辑配音作假”、“都是演戏”，要么就和稀泥说两边都不是“好东西”。

这种网络围剿本质上是海外物理镇压的延伸战术。其核心目的在于：通过制造泼脏水式的舆论噪音，将严肃的政治压迫事件解构为“博眼球的低俗闹剧”，从而混淆视听、瓦解公众同情，并对发声者实施二次精神霸凌与心理威慑，彻底掐灭海外异议者的舆论空间。

四、 觉醒与回应：阴影止于法治的边界

中共的海外渗透与跨国镇压，是对自由世界法治与人权的公开挑衅。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层与执法机关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切实用法律武器遏制外国极权在其领土上的非法执法行为。

然而，暴政以为暴力与监视能击溃心理防线，这完全是对自由信仰的低估。我们付出巨大代价来到这片土地，不仅是为了表达个人的诉求，更是为了替高墙内被剥夺发声权利的亿万同胞呐喊。

面对跨国镇压，最有力的回应绝非退缩，而是将恐慌转化为有组织、有条理的精准赋权：

1. 精准记录，提交证据：牢记举证“三要素”（面部特写、车辆车牌、时间地点），完整记录黑衣打手的影像与暴行细节，主动递交给美国 FBI、DHS 及当地警方，剥离其安全外套；

2. 坚守法治，拒绝沉默：用事实与公开发声打破无形监视带来的自我审查，捍卫自由社会的宪政秩序与人权底线。

极权的黑手或许能跨越太平洋，但自由社会的法治防线与公民的抗争意志绝不后退。极权的阴影，必将止于日光与法治的边界。

编辑：黄吉洲　校对：熊辩　美编：胡海宁

揭秘墨镜男的雨伞

—— 习近平访美期间抗议者遭袭事件调查纪实

作者：缪青

2026 年 9 月 24 日，美国华盛顿特区。

中共党魁习近平窜访美国期间，其夫人彭丽媛与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娅共同前往史密森尼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参观。公开报道显示，当天博物馆外聚集了欢迎人员以及不同立场的抗议者，现场出现了中美两国旗帜和不同政治诉求的标语。

然而，在这场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访问活动之外，一场围绕中国政治表达而发生的现场袭击冲突，同样值得追问：

首先，这些亲共的集会人群，现场人员是谁组织的？是谁实施了对民主抗议者的攻击行为？现场统一佩戴相同款式鸭舌帽的墨镜男，他们的真实身份是谁？他们手中的黑色长柄雨伞又究竟是什么？

这些问题，至今仍有许多细节有待美国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

一、从抗议现场到辣椒喷雾

记者事后采访了在现场的中国民主党党员，民主党河南工委主任蔡晓丽女士，据她提供的叙述，攻击行为发生了多次，最激烈一次是发生在彭丽媛参观博物馆期间。

当中国民主人士在博物馆外围，和平表达反对中共一党专政的政治诉求时，她和其他抗议者忽然遭到身份不明人员攻击，攻击者是一群统一戴着墨镜，口罩，鸭舌帽的人，他们推搡、拉扯，并有人使用辣椒喷雾对现场抗议者眼部进行攻击。

据另一现场当事人，中国民主党党员，民主党旧金山支部主任郭鉴鑫介绍，喷射动作非常迅速，训练有素，辣椒喷雾器藏在衣袖处，他们中有人撑开黑色长柄雨伞负责掩护，有人在掩护下实施攻击。现场抗议者中有人的眼部，在数秒之内连续遭到喷射。他还称，同时现场有人被掐脖子、拖拽。

这些说法目前主要来自现场当事人的陈述。究竟谁实施了喷射、谁首先动手，以及是否存在统一组织指挥，仍应由现场视频、警方记录、医疗记录以及其他独立证据予以确认。

但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类似的冲突并非第一次出现在习近平访美相关活动中。

二、2023 年旧金山：冲突已经留下记录

2023 年 11 月习近平赴美国旧金山参加 APEC 峰会期间，大批亲共支持者从美国不同地区前往旧金山举行活动。

公开报道显示，美国亚裔社团联合总会主席陈善庄曾从纽约前往旧金山组织欢迎活动。相关报道和研究资料称，他负责动员、运输纽约地区的支持者，并在现场使用对讲机等方式进行组织。

《纽约时报》相关报道还指出，2023 年习近平访问旧金山期间，陈善庄组织团体欢迎习近平，现场活动后来发生了支持者与抗议者之间的冲突；陈善庄本人也曾被拍摄到与抗议者发生争执。

这意味着，2026 年的华盛顿现场并不是孤立事件。

至少从公开资料来看，一条值得关注的线索已经出现：

习近平访美 —— 海外侨团动员 —— 亲共团体与民主抗议者同时出现 —— 双方发生冲突。

这条线索值得美国执法部门和新闻机构继续调查。

三、“欢迎习近平”的人群究竟代表多少真实民意？

另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出现的大规模亲共欢迎人群。

2026 年 9 月 23 日，纽约等地闽籍侨团组织人员前往华盛顿欢迎习近平。公开报道显示，参加活动的侨团包括美国福建同乡会、美国福建三山会、美国福建联合总会等多个组织。陈善庄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自己是提前数日抵达华盛顿参加欢迎活动。

类似的组织动员并不是第一次。

2023 年习近平访问旧金山期间，陈善庄也曾公开表示，有来自纽约的 50 多个机构、超过 1000 人前往加州欢迎习近平。

与此同时，一些海外媒体曾报道并证实，参与者可以获得交通、食宿和现金补贴。但有关具体金额和资金来源的说法主要来自媒体报道、现场人士及匿名知情人，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公开调查结论的全面证实。

因此，一个更加准确的问题不是简单地说“所有欢迎者都是花钱雇来的”，而是：这些欢迎队伍中究竟有多少人是自发参加？多少人由侨团组织？是否存在统一交通、食宿或现金补贴？资金来自哪里？组织者与中国驻美外交机构之间是什么关系？

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银行记录、车辆租赁记录、微信群通知、活动组织文件以及美国有关部门调查得到进一步确认。

四、同乡会：文化组织还是政治动员网络？

中国海外同乡会本身并不等于政治组织。

许多华人同乡会长期承担联络乡亲、慈善、文化交流和社区服务等功能。

但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公开资料也显示，中国共产党长期高度重视海外华侨华人工作。

新华社曾刊载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有关海外侨务和统战工作的材料，其中明确提到加强与海外华侨华人的联络、团结海内外闽籍乡亲，以及发挥侨务工作作用。

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断，这些海外同乡会是否已经是中共的海外代理人组织？海外同乡会是否已经接受中共

的直接指挥?

当某些侨团在政治人物访美期间能够迅速跨州动员大量人员、组织车辆、安排住宿，并集中出现在特定地点时，其组织能力和资金来源同样值得公共监督！

民主社会政治活动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谁组织，谁出资，谁指挥，谁负责！

五、陈善庄与中国官方体系的公开联系

陈善庄的身份及其与中国官方体系之间的公开联系，也值得放在这一背景下观察。

福建官方媒体 2024 年报道，陈善庄曾以海外侨胞身份回国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并受到福建当地侨联及地方政府官员接待。报道还介绍他担任美国亚裔社团联合总会主席同时兼任美国福州琅岐联合总会创会会长。

一些美国媒体和研究机构则长期关注陈善庄在美国华人社团中的政治影响力，以及他参与组织习近平访美欢迎活动的情况。

这些公开事实可以说明他的政治和侨团活动具有一定影响力，但是否足以证明他是“中共海外代理人”，仅凭政治立场或者参加欢迎活动不能作出结论，这需要依据美国法律意义上的证据和正式立案调查，

六、最神秘的“墨镜男”

回到现场。

抗议者拍摄的视频和照片中，可以看到一些墨镜男携带黑色长柄雨伞。

据现场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党党员旧金山支部主任郭鉴鑫介绍，在现场的抓扯中有人拿到了这种雨伞，这种雨伞是特制的雨伞，手感很沉，中间的雨伞柄是钢制实心的，与中国国内重大政治活动中安保人员使用的黑色雨伞十分相似，与北京天安门巡逻的中央特勤局使用的警用器具也十分类似，兼有现场遮蔽与攻击功能。

网络上还有说法称，这可能是所谓“警棍伞”或特殊安保器械。

但是，截至目前，没有可靠公开证据能够证明此次华盛顿现场出现的黑色雨伞都属于中国警卫部门。因此我们必须客观的说，携带相似雨伞不能证明其持有者身份属于中国安保系统。

“墨镜男”真正值得调查的，不是它携带的什么器械，而是：谁携带？谁购买？谁组织？谁授权？是否有人使用器械攻击抗议者？是否存在来自中共官方人员的指挥?

这些问题都需要后期通过视频、现场证人、警方调查以及物证得到答案，那么所谓“墨镜男”的真正来历自然会水落石出。

七、如果跨国镇压发生在美国，性质就完全不同

中国境内的政治异议人士面对的是中国国内的政治和司法体系。

但这在美国，美国是一个拥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权利的国家。

任何人，无论支持习近平还是反对习近平，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任何人也不能因为政治观点不同，就在美国街头遭受暴力攻击。

因此，如果最终调查确认，有人因为政治立场而遭到一个外国政府有组织地攻击、威胁或者骚扰抗议者，那么问题就不再只是一次普通的街头冲突，而可能涉及美国刑事法律、民事责任以及外国政府跨境影响活动等多个层面。

这也是所谓“跨国镇压”问题受到美国社会关注的原因。

真正的调查目标，不应该是简单给某一个人贴标签，而应该追问背后的事实：

亲共同乡会与中共的关系？有没有资金？有没有指挥？有没有来自外国政府的参与？有没有违法行为？打人事件谁应该承担责任?

结语：让事实揭开“墨镜男”的面纱

从旧金山到华盛顿，从 2023 年到 2026 年，习近平访美期间海外华人社会中出现的“欢迎”与“抗议”，已经成为美国华人社区政治生态中的一个特殊现象。

一边是由多个亲共侨团组织的欢迎队伍；

另一边是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海外的民主、人权和反共人士。

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声音，在美国土地上发生碰撞，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记录的时代切片。

但美国的答案不能是“谁的声音更大”，更不能是“谁的人更多”。

答案只能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如果有人组织暴力，就调查组织者；

如果有人实施攻击，就追究实施者；

如果有人非法接受外国政府指挥或资金，就依法调查；

而对于“墨镜男”“黑雨伞”以及背后的组织网络，最有价值的问题始终只有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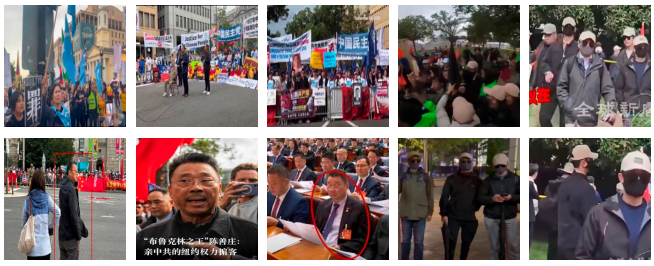
他们究竟是谁?

答案不应该由政治口号决定，而应该由视频、证人、物证、资金流和美国执法部门的调查来揭开。

只有事实，才能真正揭开“墨镜男和他们的雨伞”的秘密。真正需要维护的，是所有人在美国法律框架下和平表达意见的权利。

《在野党》旧金山记者站 09/27/26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皮与毛之外

—— 读薄瓜瓜的一段国庆感言

作者：戈冰

国庆前后，一段署名薄瓜瓜的文字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先把全文放在这里：

今天是国庆。从历史看，我们的“国”与西方的国不同。它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血脉。尤其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对政治、对体制争议颇多，见仁见智，人人皆有主张。不过，作为中国人，勿忘：中国若不强大，华人在海外无论做得多好，也永远站不住腰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连在海外反对中国的同胞，能得到西方那么多支持与同情，也是因为中国强。我个人向往世界以人类为本，但那恐怕是百年、千年之后的事了。眼下，我们不得已，只能以国为单位。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身在海峡哪边，心底里，还是为中国的昌盛祈愿吧。

这段话读起来语气很平，带着一点悲悯，也带着一点超然，很容易被当成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可是细读下去，几乎每一层都有问题。我们仅就文字本身来逐一分析。

一 . 言论的荒谬与逻辑错位

“中国强，华人腰板就硬”—— 听上去像常识，其实把两件事硬焊在一起了。一个人在海外能不能挺直腰板，首先看所在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其次看他自己的本事、品行和贡献。祖国的国力当然是背景，但绝不是决定因素。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海外华人反而更容易被怀疑。强大并不自动换来尊重。

后半句更站不住脚。海外异见者之所以获得同情和庇护，西方给出的理由从来是言论自由、人身安全和庇护制度，而不是“中国很强”。因果其实正好相反：他们需要庇护，是因为在原籍地没法安全地开口。把这份同情说成强国的红利，等于把因果倒过来，也把一个社会对人权原则的承诺，偷换成了对实力的敬畏。

二 .“权力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的信徒”

再往下看，更耐人寻味。薄家的遭遇是公开记录：薄熙来 2013 年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被判无期，谷开来 2012 年因故意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判死缓。不管人们对审判本身怎么看，一个家庭因权力斗争而骨肉离散，是事实。

可这段文字里，你几乎读不出对权力运作方式本身的任何怀疑。失势的人没有追问机器为什么这样运转，反而更郑重地向机器致意。这种心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 —— 韩愈写《拘幽操》，拟周文王被囚时的心境，最后还是落在“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被碾压的人，仍要赞美碾压者的圣明。受害者和信徒，在同一个人身上合二为一。

三 . 对海外华人和现代文明价值的认知扭曲

我们继续看对海外华人的想象。这段话无意间把海外华人写成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你做得再好，也得靠祖国撑腰。这对无数在异国凭学业、事业和劳动立足的人来说，是一种轻慢。他们的体面来自自己的双手和所在社会的规则，不是来自谁的恩赐。

国力当然会影响一国公民在世界上的处境，这点不必讳言。但这只是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描述，不能由此推出价值上的位阶，仿佛自由、法治、个人尊严这些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只是强者的装饰品，强弱一换，价值就作废。作者本人在牛津、哈佛读过书，身处的正是这些价值所滋养的地方。一边享用这些价值的成果，一边暗示它们不如国力实在，这种认知上的拧巴，值得留意。

四 . 拒绝做“毛”，拒绝依附，倡导独立的人格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比喻本身就值得停下来看一看。毛依附于皮，自己没有独立的生命。把国民比作毛、把国家比作皮，预设的是一种臣民关系：个人是附属，国家是本体。现代国家的逻辑正好相反。国家是人为了保障自身权利而结成的共同体，人是目的，国家是工具。一个人当然可以深爱自己的故土，但爱和依附是两回事。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里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一个文明里真正值得珍重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国家的公民，可以做文明的传人，但不必做任何“皮”上的“毛”。

五 . 偷换概念：将“党政体制”等同于“民族文明”

这里有一个更隐蔽的偷换。

文章开头说，中国的“国”凝聚的是民族的文明与血脉。这话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它悄悄完成了一次置换：把某一时期的党政体制，等同于绵延数千年的民族

文明。文明比任何体制都古老、都宽阔。王朝更迭了几十次，制度改换过无数回，文明却一直延续。若把二者捆在一起，等于说离开了眼下这套体制，这个民族就失去了灵魂 —— 这其实是对文明的矮化。更要紧的是，这种捆绑还附带一个后果：批评体制，就成了背叛民族。这是一种道德绑架，功能是把对具体权力的追问，转化成对血脉的忠诚测试。热爱一种文明，并不意味着必须为一切执政者背书。

六 . 身份的荒诞性：“ 盛装蹲坑 ” 与 “ 冷宫妃子 ”

身份上的反差也着实荒诞。

一个人在最自由的学府里读书，说的却是最传统的依附之语。衣冠楚楚，牛津的学位、哈佛的文凭，姿势却仍是旧式的 —— 有点像 “ 盛装蹲坑 ”。另一重形象是 “ 冷宫妃子 ”：被冷落的人，依旧向冷落她的君王表白忠心，并声称无论处境如何，心底里都盼着王朝昌盛。这里的姿态与其说是自尊，不如说是等待，等待某一天门被重新推开。以最现代的学历，包装最传统的依附，这是整段文字里最富戏剧性的地方。

七 .“ 政治投机 ” 与 “ 东山再起的幻想 ”

至于动机，我们无法也不应断言。但文本有它面向的读者。“ 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身在海峡哪边 ”—— 这句话面面俱到，不得罪任何一方；全文没有谈到任何一个具体的制度问题，也没有一个字触及自己家族的遭遇。在家族失势的背景下，于国庆日发表一番不带锋芒的忠诚表白，很难不被读成一种信号。这类表态在中国政治文化里有悠久的传统：被贬的官员写谢表、上自陈书，在颂圣的字句里表忠，也为日后留一道余地。苏轼的《到黄州谢表》就是例子。倘若今天的这段文字也带着类似的期待，那么 “ 东山再起 ” 的幻想，就藏在每一个小心翼翼的措辞里。当然，这只是一种解读，读者尽可保留自己的判断。

八 . 彻底暴露了精英教育对极权洗脑的失败

人们曾经期待，自由而顶尖的教育能够塑造独立思考的人。这段文字提供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反例：在最好的学府里读了许多年书，却仍未学会区分国家与政府、文明与体制、忠诚与依附。单个案例当然不足以论定整体，教育的作用也不会被一段文字推翻。但它至少提醒我们：当一个人的立场早在童年就由家庭、环境与话语体系预先写定，后来的教育很可能只是给它添上修辞，而不会改变内核。极权体制的 “ 洗脑 ” 并不在课堂上完成，它在更早、更深的地方扎根，精英教育未必拔得动它。

九 . 极权体制对个人的 “ 异化 ” 达到了极致

这一切最终指向一个词：异化。人本应是自己的目的，却在权力体系里成了工具；本应以自己的声音说话，却只能重复被设定好的句式。连家庭遭遇的悲剧，也不能以自己的语言讲述，只能纳入 “ 祈愿昌盛 ” 的固定叙事之中。极权体制对个人最深的伤害，不只是剥夺自由，更是让个人逐渐认不出自己，把被塑造出来的自我当成了真实的自我。这是比任何判决都彻底的囚禁，而且常常由被囚者亲手完成。

为中国祈愿昌盛，这没有错。许多批评者怀着同样的愿望。分歧不在这里，而在于：昌盛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界定，个人在其中是目的还是工具。

原文说，中国若不强大，华人便站不住腰板。我们不妨把这句话倒过来读：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最终要看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能否不依附于任何人而站直。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77 年自扇耳光的经典

——缅北的背后其实是监守自盗

作者：罗翔

这大概是近年来最经典的一场“自我打脸”：央视正在热播《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告诉全国民众缅北电诈如何被重拳打击、如何走向覆灭；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消息却告诉我们，妙瓦底的电诈园区正在异地重建，社交媒体上的招聘信息甚至超过 9300 条。

一边是“覆灭”，一边是“重建”。一边是胜利的纪录片，一边是现实世界里重新挂起来的招聘广告。这到底是在拍纪录片，还是在拍一部大型连续剧？

10 月 5 日至 7 日，中国公安部与央视联合摄制的纪录片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片中披露，河南平顶山一名母亲被骗 40.5 万元，其中还包括挪用的公款，最终投河自尽；缅北电诈高峰时期，仅佤邦勐波地区就存在 265 个电诈窝点，涉诈人员接近 6 万人。数字确实触目惊心，故事也确实令人痛心。

可是问题来了：这么大的产业，是一天之内从地下冒出来的吗？几万个涉诈人员、数百个园区、完整的通信体系、人员招募体系、资金流转体系和地方保护网络，难道都是犯罪分子凭空变出来的？

更荒唐的是，我们这些年似乎一直在重复同一个故事。

这个园区被端了——胜利！那批诈骗分子被抓了——胜利！某地被清剿了——重大成果！新闻播完以后，大家刚准备鼓掌，转过头一看：怎么又冒出来一个新的？

缅北不行了，还有妙瓦底。

妙瓦底不行了，还可以换一个地方。

园区没了，可以重新建设。

人抓了一批，还可以重新招募。

于是一个极其诡异的画面出现了：电诈园区像打不死的小强，每次新闻宣布“覆灭”，过一阵子就换个地方继续营业。

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我们到底是在消灭电诈，还是在不断追赶电诈？

更值得玩味的是，电诈园区不是荒郊野外里凭空出现的一顶帐篷。

它需要电，需要通信，需要网络，需要资金，需要人员，需要运输，需要招募，需要地方势力提供保护。

一个几万人规模的产业，能够长期运转，本身就说明它背后存在一套复杂的利益链。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电力从哪里来？通信从哪里来？资金怎么进、怎么出？招聘信息为什么可以公开传播？人员又是怎么源源不断进入园区的？

如果这些最基础的问题都没有被彻底回答，只是抓一批人、拆几个园区，然后宣布“覆灭”，那所谓的“覆灭”，究竟覆灭了什么？

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企业在境外电力、通信等基



础设施领域长期存在广泛布局。网络上因此长期流传各种关于中国企业与境外电诈园区之间关系的说法，甚至有人讽刺所谓“电诈公司是某些势力的白手套”。

这些说法究竟是真是假，当然应该拿证据说话。

可如果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为什么不能把整个供应链、资金链和通信链彻底公开调查清楚？

谁供电，谁提供通信，谁收钱，谁获利，谁保护，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要这些问题能够彻底查清楚，谣言自然就没有市场。

最怕的不是有人提出质疑，而是每一次质疑都只得到一句“我们已经取得重大成果”，然后过几个月，又出现新的园区、新的诈骗、新的受害者。

于是公众只能一次次观看同样的剧情：园区出现——警方行动——新闻报道——宣布成果——舆论欢呼——园区转移——重新招募——新的受害者。循环往复。

如果把这些年的新闻全部连起来看，甚至会产生一种荒诞感：每一次新闻都可以单独看成胜利，可所有新闻连起来，却像是一场永远没有大结局的连续剧。这才是最讽刺的地方。

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应该只是“抓了多少人”“端掉多少窝点”，更应该看看那些被骗者后来怎么样了。

被骗的钱追回来了吗？家破人亡的家庭得到什么补偿了吗？被诱骗、胁迫进入园区的人回来以后怎么样了？那些因为诈骗失去积蓄、工作甚至亲人的民众，谁来承担他们人生被改变的代价？

如果一个母亲被骗 40.5 万元之后选择投河，那么对她的家庭来说，所谓“重大行动成果”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一个已经失去亲人的家庭而言，一场新闻发布会、一部纪录片、一串抓捕数字，真的能够填补那个永远消失的位置吗？所以，真正讽刺的并不是打击电诈本身，而是某些叙事方式。

当“覆灭”成为标题，当“重大成果”成为结论，当掌声成为结尾，可现实却告诉我们：园区换个地方又开张了，招聘广告继续铺天盖地，新的受害者还在不断出现。

那么这场所谓的“覆灭”，究竟是谁的覆灭？是电诈产业的覆灭，还是一个旧园区的覆灭？

如果犯罪产业能够换个地方继续运转，如果背后的电力、通信、资金、人员和保护网络没有被真正切断，那么把一个园区炸掉、拆掉、端掉，又有什么意义？

这就像一棵树，天天砍树枝，却从来不去挖树根。最后当然可以宣布：“树已经被我们成功消灭！”可是春风一吹，下一棵又长出来了。

这才是这场“77 年自扇耳光”真正荒诞的地方：嘴上说的是覆灭，现实看到的却是重生；新闻讲的是胜利，民众看到的却是循环。

如果一个犯罪产业几十年来不断换地方、换招牌、换园区，却始终能够死灰复燃，那么我们究竟应该相信新闻里的“已经覆灭”，还是应该追问一个能够被反复宣布“消灭”、却又能够反复重新出现的庞大产业，真正没有被消灭的，到底是电诈，还是它背后那条让电诈能够生存下去的利益链？

编辑：赵杰　校对：熊辩　美编：胡海宁



中共的政治承诺与国际履约困局

作者：Yong Yi



在现代政治文明与国际秩序中，契约不仅是社会运行的基石，更是政权执政合法性的终极底线。然而，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建政与执政史，一条极其清晰且贯穿始终的主线，便是在战略弱势时大肆许诺、在权力巩固后悍然背信。这种将政治承诺彻底工具化、策略化的行事逻辑，构成了其政治基因中无法洗白的信任赤字。

建政之前，中共极其擅长利用民主修辞进行政治伪装。笑蜀编纂的《历史的先声》一书，血淋淋地揭露了这一历史讽刺。上世纪 40 年代，中共在《新华日报》与《解放日报》上铺天盖地宣扬“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基础”，甚至高调赞美美式民主与普选制度。彼时的中共，将自己包装成反对国民党威权、争取宪政自由的殉道者，借此榨取了无数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血汗支持。然而，一旦通过这些谎言夺取政权，中共便立刻露出了极权本色，不仅将当初的民主蓝图撕得粉碎，甚至连记录这些誓言的白纸黑字都成了必须严密封杀的禁书。对本国国民的第一次政治大清洗，正是从背叛自己许下的民主承诺开始的。

这种将承诺视作“权宜之计”的流氓逻辑，在其执政后顺理成章地延伸至外交领域与国际规则之中。

《中英联合声明》的破灭，就是中共在国际舞台上撕下伪装的典型例证。1984 年，中共为了顺利收回香港并安抚资本市场，向全世界郑重承诺香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资本主义制度与自由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然而，当强权自认为足够强大、足以无视国际约束时，这一具有法律效力的联合国备案条约，却被中共外交部公然贬低为“不再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文件”。随着《香港国安法》强行落地与选举制度被彻底清洗，香港的自由与法治被蚕食殆尽，“一国两制”沦为彻头彻尾的政治骗局。

在经济全球化领域，中共的背信弃义同样让国际社会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2001 年，中共为了挤进世界贸易组织（WTO），签署了极其详尽的开放承诺。欧美国家本以为通过经济融入能倒逼其走向市场化与法治化，却低估了中共对规则的投机与破坏力。二十多年来，中共一方面尽情吸血全球化红利，另一方面却极其阴暗地玩弄“选择性履约”—— 通过巨额暗箱补贴、强制技术转让、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以及非关税壁垒，彻底破坏了全球公平竞争的环境。它不是国际规则的遵守者，而是规则漏洞的寄生者与掠夺者。

从对内欺骗几代中国人的民主谎言，到对外玩弄《中英联合声明》与世贸协议，中共的行为模式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需要你时，好话说尽、高标许诺；利用完后，过河拆桥、翻脸不认。在中共的字典里，从来没有现代文明所敬畏的“契约精神”，只有赤裸裸的“实用主义”与“权力算计”。

一个建立在谎言之上、靠背信弃义维持统治的政权，或许能凭借暴力与谎言制造一时的强权假象，但其在国际社会与人类历史中的信誉早已彻底破产。当这种欺诈手段被全人类看穿之时，便是其政治合法性全面崩溃的开始。

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红蓝对弈：2026 中期选举后的美国移民政策走向

作者：贾嘉



一、距离中期选举仅剩五周，美国政治风向正在发生变化

2026 年美国中期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11 月 3 日，美国选民将投票选出全部 435 名众议员以及 35 名参议员。当前国会仍由共和党控制，但进入 9 月以来，民主党在全国性民调中的表现明显改善，众议院翻蓝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参议院也逐渐进入真正的激烈竞争阶段。Cook Political Report 最新判断认为，民主党在参议院可能净增 1 至 5 席，但要重新取得参议院控制权，需要至少净增 4 席，因此参议院竞争依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全国国会通用选票调查已经出现明显的民主党优势。近期一项 Emerson College 民调显示，民主党在国会通用选票中以 53% 对 42% 领先共和党 11 个百分点；另一项 Reuters/Ipsos 调查则显示民主党领先共和党 8 个百分点。

因此，一个越来越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如果 11 月 3 日民主党真的实现“蓝色横扫”，同时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那么特朗普政府过去两年的移民政策会不会出现重大转折？

答案是：会，但不会是简单的政策翻转。

美国移民政策并不是由总统单独决定，而是总统行政权、国会立法与拨款权、联邦法院司法权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白宫仍由特朗普控制，而国会转为民主党控制，美国移民政策真正可能发生的变化，不是“民主党立即开放边境”，而是行政权受到更强的国会监督，移民执法与人道主义保护之间重新出现政治拉锯。

二、最直接的变化：国会可能开始“管住”移民执法

即使民主党同时控制参众两院，特朗普仍然拥有 DHS、ICE 和 CBP 的行政指挥权。因此，民主党无法仅凭中期选举结果取消 ICE，也无法直接命令白宫停止遣返。

但国会有一个非常现实的武器：拨款权。ICE、CBP、移民拘留设施、遣返行动以及大量边境项目，都需要国会提供资金。

这意味着，如果民主党控制国会，移民政策最先发生变化的地方，很可能不是法律条文本身，而是预算谈判。民主党可能要求增加执法预算必须同时附带监督条件，例如：强化执法人员身份识别；加强执法录像和监督；提高被拘留者获得法律援助的机会；改善拘留地点和被拘留者信息透明度；对公民被误捕等事件进行调查；要求 DHS 定期向国会报告拘留、遣返以及执法行动数据。

因此，民主党最现实的做法并不是“废除 ICE”，而是：利用国会的拨款和监督权，对 ICE 的执法方式设置更多制度约束。这将成为 2027 年白宫与国会之间最直接的一场权力较量。

三、第二个战场：庇护制度可能重新成为移民政策核心

如果说 ICE 代表特朗普政府的“执法端”，那么庇护制度则可能成为民主党重新布局的“保护端”。

过去一年，特朗普政府明显收紧庇护政策，包括限制申请、加速遣返以及扩大第三国遣返等措施。第三国遣返政策已经引发法律和政治争议，并面临联邦法院挑战。

如果民主党控制国会，预计会重点推动：恢复更完整的庇护申请程序；强化 credible fear 审查；增加移民法庭资源；提高被拘留者获得律师和法律咨询的机会；重新评估人道主义假释政策；对部分 TPS 政策进行重新审查；恢复或扩大难民安置项目。

这里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政治逻辑：民主党未必能够直接取消特朗普的行政政策，但可以通过立法、预

算和国会监督，把庇护制度重新拉回政治议程中心。因此，对于正在等待庇护程序的人来说，国会易手可能带来的最大变化，不一定是“立即获批”，而是程序环境、法律资源和行政执行方式可能逐步改变。

四、Dreamers 可能迎来新的立法窗口

DACA 和 Dreamers 问题，则可能成为民主党最容易形成政治共识的移民议题之一。民主党长期希望把 DACA 这种行政保护转化为国会正式立法，为童年时期来到美国的无证年轻人提供更加稳定的法律身份。如果民主党同时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Dream Act 或者类似的 Dreamer 保护法案重新进入立法议程的可能性将明显增加。

但这里也不能过度乐观。即便民主党控制两院，是否能够通过大规模移民改革，仍然取决于民主党内部是否团结，以及参议院具体的政治结构。因此，更现实的路线可能是：先从 Dreamers 等政治上较容易形成共识的群体入手，再逐步讨论更广泛的身份调整。这比一次性推动全面移民特赦更符合美国国会的政治现实。

五、TPS、人道主义项目与合法移民：可能出现“政策修复”

特朗普政府近年来收紧 TPS、humanitarian parole 以及难民项目。如果民主党控制国会，这些领域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政策修复。

TPS：重新审查部分国家的 TPS 终止决定。
Refugee：提高难民项目的接纳和安置能力。
Humanitarian Parole：恢复部分人道主义入境渠道。

与此同时，民主党也可能把注意力扩大到合法移民。美国移民政策并不仅仅是非法移民问题。留学生、H-1B 工作者、科研人员、医生、工程师、企业家，以及家庭和职业移民，同样受到签证处理、排期和行政政策变化的影响。

因此，民主党如果重新掌握国会，可能推动：改善职业移民排期；缓解家庭移民积压；增加 USCIS 处理资源；改善高技能人才签证制度；保护部分留学生和国际人才。对华人社区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华人移民群体并非单一的“庇护群体”，其中同样包括大量留学生、技术移民、职业移民、投资移民和家庭移民。

六、但民主党不会简单走向“开放边境”

这是判断未来政策时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点。如果民主党重新控制国会，并不意味着美国边境政策会完全转向。事实上，民主党内部过去几年已经出现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实主义趋势：保护移民权益，同时承认边境必须受到有效管理。

民主党过去推动的两党边境方案，本身就包含增加边境人员、技术设备、移民法庭资源以及边境管理能力等内容。因此，2027 年民主党更可能寻找的是一种新的政治组合：边境继续管，严重犯罪继续执法；但减少无差别式执法，同时恢复庇护、人道主义和合法移民渠道。这与“开放边境”并不是一回事。而这恰恰可能成为民主党未来几年重新塑造移民议题的核心。

七、真正的权力冲突：白宫与国会谁说了算？

假设 11 月 3 日民主党同时拿下众议院和参议院，美国将进入典型的分裂政府状态：白宫是共和党，国会是民主党。

这意味着特朗普仍然可以通过行政权：指挥 ICE 和 CBP；调整 DHS 政策；发布行政命令；调整部分签证和边境政策。

而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则可以：控制拨款；举行听证；调查行政部门；传唤政府官员；要求政府提交文件；修改移民法律；对行政部门形成持续监督。

因此，2027 年美国移民政策最值得关注的，不是某一项政策会不会立即被取消，而是：总统的行政权与国会的立法、拨款和监督权将发生正面碰撞。在这场碰撞中，联邦法院又会成为第三个重要角色。

换句话说，美国移民政策很可能形成：白宫 VS 国会 VS 联邦法院，三方博弈。

八、为什么参议院翻蓝尤其重要？

如果只看众议院，民主党翻蓝已经足以改变华盛顿的政治气氛。众议院可以加强调查、举行听证、推动拨款谈判，并提出新的移民法案。但如果谈到真正意义上的立法改革：参议院才是关键。

目前民主党需要净增至少 4 席才能控制参议院。因此，即使民主党成功夺回众议院，也不意味着它能够自动推动新的移民法律。

这也是为什么 2026 年中期选举需要分开观察：
众议院翻蓝：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将面对更强的调查和监督。

参议院翻蓝：意味着民主党获得更大的立法和人事任命影响力。

参众两院同时翻蓝：才真正意味着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面临系统性的国会制约。

九、对华人移民而言，真正需要关注什么？

对于华人社区而言，与其简单讨论“民主党好还是共和党好”，不如把自己的移民身份放进不同政策类别观察。

已经拥有合法身份的人：包括永久居民、DACA、TPS 以及各种合法工作身份持有人。最值得关注的是政策稳定性、身份续期以及行政审查方式。

正在移民程序中的人：包括庇护申请者、工作许可申请者、移民法庭案件以及家庭和职业移民申请者。如果未来国会增加 USCIS、移民法院和法律援助资源，程序效率和法律服务环境可能有所改善。

没有合法身份、也没有正在进行有效移民程序的人：不能简单理解为“民主党赢了就安全”。民主党仍然会支持边境管理和一定程度的移民执法。

未来真正可能形成的区别，更可能体现在执法优先级、程序保障和个案处理方式上，而不是完全停止执法。

十、2027 年最值得观察的五个信号

如果以《在野党》记者的角度观察，选举之后真正值得追踪的，不是竞选口号，而是以下五件事情：

第一，民主党能否控制参议院。这是移民立法能否真正推进的第一道门槛。

第二，ICE 和 DHS 预算谈判。这是白宫与国会争夺移民政策实际控制权最直接的战场。

第三，Dreamer 立法是否重新启动。这可以观察民主党究竟选择“小步立法”还是继续追求全面移民改革。

第四，庇护、TPS 和人道主义政策是否出现制度性恢复。这将直接影响移民保护体系。

第五，联邦法院如何处理行政部门的移民权力。如果法院进一步限制总统单方面改变移民政策的空间，国会的作用将更加重要。

十一、我们的判断：不会“全面翻转”，但可能发生一次再平衡

如果民主党最终实现参众两院“双翻蓝”，最可能发生的不是美国突然进入“开放移民时代”，而是一场持续两年的政策再平衡。

特朗普政府过去强调的是：边境控制、移民执法、拘留与遣返。

民主党控制国会后，可能试图增加：国会监督、程序保障、庇护、人道主义保护和合法移民改革。

两者之间不会迅速分出胜负。更可能出现的是一种新的政策组合：边境安全继续存在，移民执法继续存在，但执法的范围、优先级和程序受到更多国会限制；与此同时，庇护、Dreamers、人道主义保护和合法移民渠道重新获得政治空间。这可能是 2027 年美国移民政策最重要的变化方向。

所以，中期选举改变的，是移民权力的分配方式

2026 年中期选举表面上是在决定 435 个众议院席位和 35 个参议院席位。但如果从移民问题来看，这场选举真正决定的，是未来两年谁能够约束总统、谁能够控制预算、谁能够推动立法，以及谁能够决定移民政策的政治议程。

如果共和党继续控制国会，特朗普政府目前的移民政策将获得更大的制度支持。

如果民主党只夺回众议院，最大的变化将是调查、监督和预算博弈。

如果民主党同时夺回参众两院，那么美国移民政策才可能真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白宫继续强调执法，国会开始重新强调程序、人道主义和合法移民改革。

因此，11 月 3 日真正值得观察的，不只是“蓝色浪潮是否出现”，而是：美国移民政策的权力中心，会不会从白宫重新部分转回国会。这，可能才是 2026 年中期选举对美国移民政策最深远的影响。

编辑：黄吉洲　校对：毛一炜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别让出境自由，变成一种等待批准的资格

作者：LIU XIAOCAI

一个普通人想出国读书、工作、探亲，或者只是看看世界，应当拥有多大的自主权？当政府能够阻止一个人离开时，它又应当承担怎样的说明义务，接受怎样的监督？这些问题关系到每个人能否安排自己的生活，也关系到公民与政府之间最基本的权利边界。

2026 年 9 月 15 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使这些问题再次受到关注。需要准确地说，这份规定没有宣布全民禁止出境，不能直接等同于关闭国门。但其中涉及出境事由核实、不准出境和告知例外的内容，确实值得公众认真审视。批评应当从具体条文出发，追问权力边界与公民保障。

出境自由从来不只是买一张机票、去一个地方。它关系到一封来之不易的录取通知，一份支撑家庭生活的工作，一场等待多年的团聚，或者与病重亲人的最后一次见面。一次出境受阻，对于管理部门也许只是一个决定，对于当事人却意味着无法弥补的损失。

正因为如此，限制出境不能成为轻率的管理手段。作出决定的人，应当考虑它给一个家庭带来的后果。限制依据是否明确，证据是否充分，期限是否合理，有没有影响更小的替代措施，这些都应当经得起追问。公民需要能够理解规则，也需要能够挑战错误的决定。

新规第三条涉及身份和申请事由核实，允许有关机关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并规定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导致不予签发证件或者不准出入境。这使核实标准尤为重要：一般疏漏、行程变化和故意欺骗，应当如何区分？什么资料与核实目的有关？个人需要配合到什么程度？

如果标准不够清楚，普通人就陷入一种不安：材料交了，还不知道是否足够；问题回答了，还担心表达是否会被误解。这不是说上述情况必然发生，而是任何涉及重大自由的制度，都应当提前防范这种风险。规则越具体，公民越容易遵守，执法也越容易接受监督。

第六条原则上要求书面告知不准出境的事实、理由、依据和救济途径，同时为影响国家安全、刑事案件侦查等情形设置不告知的例外。告知义务具有重要意义，而例外的适用同样需要严格约束。一个人如果难以知道自己为何被限制，就难以有效提出异议。

国家安全当然需要维护，但这一理由必须具有可审查的具体内容。即使某些信息确实需要保密，也应当有相应机制核查限制是否合法、是否必要、是否仍应继续。保密不能让错误无法纠正，更不能使受到影响的人无限期地等待。

新规第二条还涉及对特定高风险目的地的提醒和必要时劝阻。“劝阻”不能直接解释为全面禁止出境，但其执行边界应当清楚。对于具有判断能力的成年人，政府应提供可靠的风险信息，并尊重其依法作出选择的能力。任何进一步的强制措施，都需要明确依据。

保护公民的责任，与尊重公民的自主权，应当同时得到落实。人们前往某个地方，涉及工作、家庭和其他迫切需要。行政管理必须认真对待这些具体处境，不能只从管理便利出发，把复杂的人生选择简化成一句“最好不要去”。

也应看到，出境查验和不准出境制度并非此次新规才建立。2013 年施行的《出境入境管理法》已经规定相关手续与限制情形。因此，讨论的重点应当是限制范围、执行标准和纠错保障，而不能把过去描述成毫无限制，再把今天描述成所有人都无法离开。

事实上的准确，不会削弱对自由的坚持。公众完全可以在承认管理制度存在的同时，要求它受到严格约束。政府掌握的决定权越大，就越应说明如何防止误用。权利保障不能停留在原则表述中，还应体现在当事人能够及时获得解释、提出异议和得到处理的每一步里。

如果一个政府担忧人才流失，或者担忧人们对未来失去信心，就应认真了解离开背后的原因。人们期待怎样的工作机会和教育环境？他们能否通过劳动获得稳定生活？遇到不公时，是否相信问题会得到公正处理？这些问题影响着人们愿不愿意留下，也影响着他们愿不愿意回来。

当然，并非所有出国的人都不愿回来。求学、探亲、旅行和移居有着不同目的，不能把每一次离开都理解为对国家的否定。一个人热爱自己的语言、文化和亲人，也可以选择在海外生活。公民不应因为拥有不同的人生计划，就被要求不断证明自己的忠诚。

即使有人决定长期定居海外，这种选择也应受到尊重。国家的发展最终应当服务于人的生活。人们愿意留下，是因为看见机会、感到安心，并相信自己的努力能够有所回报。增加离开的困难，无法代替改善这些条件，更无法自动赢得信任。

值得警惕的是自由在日常手续中逐渐缩小。如果材料要求不断增加，核实范围不断扩大，而解释、监督和救济没有同步加强，个人安排生活的空间就受到挤压。防止这种风险，需要公开的规则、清楚的责任，以及对执行情况持续而具体的监督。

所谓防止把人“焊死在国内”，应当落实为可以检验的要求：限制必须有依据，期限必须受约束，错误必须能纠正，受到影响的人必须有切实可用的救济途径。公众不必等到大门彻底关上，才有资格讨论门上的锁由谁掌握。

护照依然握在手里，航班依然起降。每个人都应能够相信，自己符合明确、合理的法律条件时，生活计划会得到尊重。一个有信心的政府，应当努力创造让人愿意留下的环境，也尊重人选择离开的自由。

编辑：张致君　校对：毛一炜　美编：胡海宁

中国人为什么越来越冷漠

—— 中共统治下的戾气、恐惧与信任崩塌

作者：赵雪峰

这些年来，许多人都有一种感受：中国社会的戾气似乎越来越重。地铁里一次碰撞可能演变成争吵，开车时谁也不愿让步，网络上一句意见不合就可能招来辱骂。面对陌生人的困难，有些人的第一反应并非帮助，而是警惕：“会不会被骗？”“会不会被讹？”

于是有人问：中国人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冷漠？

但真正应该问的，也许不是“中国人怎么了”，而是：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学会了防备、沉默和攻击？

中国人当然不是天生缺乏善意。灾难发生时有人捐款，陌生人遇到危险时也有人挺身而出。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一个社会究竟是在鼓励善意，还是在不断提高信任和善良的成本？

过去几十年，中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极其激烈的竞争环境。住房、教育、工作、医疗、养老，每一样都关系到家庭的安全感。如今又叠加了房地产调整、就业和收入压力。当越来越多人觉得生活空间正在被压缩，人就更容易把身边的人视为竞争者。

问题不再是“规则为什么不公平”，而变成了“别人是不是占了我的便宜”。

更值得注意的是愤怒的流向。

任何社会都会有不满。工资被拖欠、房子烂尾、政策不合理，人自然会愤怒。区别在于，人有没有安全而有效的渠道表达这种愤怒。一个值得讨论的现象是：当向权力表达不满的成本很高，而攻击普通人的成本很低时，愤怒就更容易横向释放。

对老板的不满不能说，于是回家骂孩子；对现实的不满无处表达，于是在网络上攻击陌生人；自己曾遭受过不公平待遇，等拥有一点权力，又把同样的不公平施加给更弱的人。最终形成了一种令人悲哀的社会关系：面对强者谨小慎微，面对弱者却异常苛刻。

而冷漠，有时也未必意味着没有良心。中国人从小常听到一句话：“少管闲事。”为什么看到别人遇到困难不愿帮？因为怕惹麻烦。为什么看到不公平选择沉默？因为担心影响自己。

当一个社会长期让参与公共事务、帮助陌生人、公开表达不同意见意味着额外风险时，“冷漠”就可能成为一种自我保护。于是人们逐渐学会：不要相信陌生人，不要多说话，不要出头，不要管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久而久之，被消耗掉的正是社会最宝贵的东西 ——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所以，我不愿意把这些问题简单归结为“中国人素质差”。

在中共长期一党执政、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媒体、结社和政治表达受到了严格限制。当批评权力的成本高于攻击普通人的成本，当人无法改变规则却又每天承受规则带来的压力，那么压力就更容易在人群之间转移。这正是我所说的中共长期统治之下形成的一种畸形社会生态。

所谓“畸形”，不是说中国这个民族出了问题，而是正常的人被放进了一个不正常的激励结构之中。当说真话需要计算代价，沉默就会成为理性选择；当帮助别人可能带来麻烦，冷漠就会成为自我保护；当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受到限制，愤怒就更容易变成人与人之间的攻击。

所以真正应该追问的不是“中国人怎么了”，而是：为什么一个拥有无数善良普通人的社会，会逐渐形成彼此防备、彼此伤害的生存逻辑。

如果一个社会最终让人害怕权力、提防邻居、攻击弱者、习惯沉默，那么最值得反思的就不只是人的“素质”，而是这个社会为什么会被塑造成今天这个样子，作为统治者的中共，难辞其咎。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好学生”修炼手册

作者：徐陈鹏



偶然间，我看到了一段初中政治老师曹志星的教师节采访视频。他如今已是我们镇上中学的校长，坐在镜头前，语气和蔼地谈论自己的管理经验，对学生的用心，以及学校成绩的提高。这与我记忆中的他极不相符。他曾把一个个头很小的学生抱起来往墙上撞，让一个比他还高的学生蹲下去，往他的背上猛踩，还经常用黑板擦给学生“洗头”。想起他当年的那些畜生行为，我忍不住在朋友圈发了几句牢骚。我预料到爸妈会劝我删掉。毕竟都是一个镇上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我没想到，第一个劝我删除朋友圈的，竟然是我三姨。

一、一个“好女人”

三姨是个可怜人。她结婚第二天就开始遭受家暴，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二十多年。亲戚们骂过她丈夫，劝过他不要那么冲动，我外公也后悔把女儿嫁给这样一个人渣，却没有一个人劝她离婚。我读高中时，三姨和丈夫已经分居，他却仍会跑到县城骚扰她，找她要钱、打她。我劝三姨离婚。她说两个孩子还在念书，等表妹考上大学再说。后来，前三姨父嫖娼、出轨被发现，亲戚们才终于一致认为：这个男人实在太不是东西了，必须离婚。我那时觉得非常荒唐。一个“好女人”被丈夫打了，是不能还手的；天天挨打，也不能轻易离婚。丈夫第一次嫖娼，要劝他回头；第一次出轨，要强烈谴责。只有屡教不改，在亲朋好友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她才终于可以离婚。仿佛二十多年的殴打，还不足以成为结束婚姻的理由。而三姨这个“好女人”，又要教育自己的女儿成为“好女人”：不要早恋，远离男生，出去玩要报备，胖了要减肥。最重要的是，好好学习。“我这辈子辛辛苦苦，都是为了你们。”她经常跟我讲述自己受过的苦，又反复强调自己从来没跟别人诉过苦。可想而知，表姐和表妹听过多少次：“我从来没跟别人诉过苦。”

二、我们是怎样成为“好学生”的

初中时，老师打学生是常态，羞辱更是不在话下。我的语文老师郝德义是二班班主任。他在我们三班从来不打人，教课认真，大家都喜欢他，我也觉得他是个好老师。直到有一次课间，我看到他用三角板的一角往二班学生的手掌上猛斩下去。他打人时脸上发狠，完全不像在我们班上那副和风细雨的模样。我开始讨厌他。而比厌恶更强烈的，是恐惧。我曾试探着跟朋友说他打人多么凶狠，得到的回复却是：“他也是为了我们好。他从来不乱打人，我们有时候太皮了，他才打我们。”甚至有时候，我直接叫他的名字，也会被制止：“不准叫他名字，要叫郝老师。”我开始怀疑自己。大家都认为他是好老师，我讨厌他，是不是说明我是一个坏学生？多年以后，我又见过一次郝德义。与他重逢，我甚至有一种亲切感。但是，他一笑，我依然感觉到恐惧。

其实，我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反对老师打学生。看到同学因为上课吵闹而挨打，我有时也觉得他是应该的。甚至我自己因为讲话被老师打了，也觉得没什么好委屈的。毕竟，是我破坏了课堂纪律。我的班主任聂祥斌，在我看来是初中老师中最有人味的一个，但他有时也会发神经。有段时间，一个同学经常欺负我。他每次打我一下就跑，我总是追不上，只好向班主任求助。周一的升旗仪式上，班主任把我们两个叫上台，让我当众扇他耳光。站在那里，我手足无措。以前他打我，我总想追上去还手；而这一次，我却希望他跑，飞快地跑。他没有跑。他安静地站在那里，等待着惩罚。最后，我伸出手，在他的脸上摸了一下。他哭了出来。我感到非常愧疚，而随之而来的，是一股巨大的无聊感。那时候的我还不懂，这种无聊感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本在两个同学之间流动的关系，在老师绝对权力的干预下，被粗暴地画上了句号。

三、你有农民工辛苦吗？

大一暑假，我自己办了一个辅导班，赚了点钱。后来去东至县城玩，请一帮高中同学吃饭。席间聊起办辅导班的经历，我说自己又要教学，又要管事，很辛苦。

一个我一直认为很聪明的同学突然问我：“你有农民工辛苦吗？”如果是别人说出这样的话，我大概不会奇怪。可偏偏是他。我一直觉得他很聪明，应该能够想到许多别人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始终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问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当然没有说自己比农民工更辛苦。我只是说自己很累。难道因为有人比我更辛苦，我就不能说自己累了吗？

后来，我看电影《狗十三》，看到一些弹幕：“还是打少了。”“矫情。”“都是闲的。”“我小时候比她苦多了。”这种口气，我太熟悉了。我小时候挨过打，也没怎么样；我吃过那么多苦，也没见我整天抱怨。既然我能忍受，你凭什么不能？仿佛一个人过去忍受过多少痛苦，就获得了要求别人忍受同样痛苦的资格。而那些不愿意忍受的人，不是太矫情，就是太闲了。

四、另一种服从

我有一个朋友，从小生长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父母对弟弟的偏爱和对她的忽视，让她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她努力表现，希望获得父母的爱；父母偶尔给她一点体贴，她便又觉得他们终究还是爱自己的。有一次，她又被父母辱骂、贬低，独自坐上了去拉萨的火车。她在火车上给我打电话，讲起自己的成长经历。她理智上知道父母对她很残忍，却始终放不下对亲情的渴求。我告诉她，不是所有父母都会真正爱自己的子女，也没有必要非得获得父母的认可。你还有朋友，有男朋友，世界那么大，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困在那个得不到爱的家庭里？她在电话那头大哭了一场。我静静地听着，预感到这可能是她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她会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

后来，她开始接触心灵疗愈，花钱报班，修行、感悟，还经常向我分享自己吸收了宇宙高维度能量的心得。她甚至开始给别人做心灵顾问。有一次，我让她给我做疗愈。我向她抱怨，领导不看具体工作成果，只看员工工作的姿态。你好像稍微闲一点，就是在偷她的钱，而且她说话极不尊重人。朋友劝我站在领导的立场考虑问题，理解领导的压力，反省自己是不是工作没做好，是不是太冲动了。我又问她：“我有一个手下，安排给他的活总是做不好，我应该怎么办？”她说有事，下次再聊。后来，她再也没有续上这个话题。

从她平时写的文章、制作的视频和做疗愈的方式来看，在她的体系里，似乎只有面对上位者时，你的心态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她很喜欢一些宏大的词语：疗愈、成长、宇宙能量、高维度……当有人诉说来自父母、老师、领导的压力时，她总会和风细雨地告诉对方：你要改变自己。你要提高自己。而当我告诉她，我的下属给我带来了怎样的烦恼时，却几乎毫无悬念地得不到答案。扎在她身上的毒箭，被她稀释成莲花清瘟注射液，推销了出去。

五、那个被打进医院的“刺头”

忘记是哪一年，石门街政府和外地开发商合作拆迁新街。大部分居民都同意了，只有街口一家始终不肯签字。后来，开发商找人把那家的男人打进了医院。我爸说：“那个人就是个刺头。别人都同意了，就他不同意，耽误大家的事，无非是想多要点钱。”最后又补了一句：“被打活该。”我不知道那个男人为什么拒绝拆迁，也不知道他提出过什么要求。但在我爸的叙述里，这些似乎都不重要。因为大多数人都同意了。于是，唯一不同意的人，就成了那个“不懂事”的人。而因为你不懂事，所以你活该被打。

六、“好学生”长大了，就成了“良民”

疫情解封以后，我和一个老同学聊起过去三年的防疫。我跟她说起封控期间发生的种种问题。她说：“国家也没有办法，疫情多难控制。我们好不容易挺过这三年，你看，一解封，多少人阳了？”我问：“清零这么好，为什么不继续呢？”她说：“国家也不容易，保护了我们三年，总要发展吧。”我又说起那些走上街头反对严格防疫政策的白纸抗议者。她说：“国家防疫多不容易，这些人捣什么乱啊。”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说。我绝不能说她是个坏人。她平时待人很有礼貌，性格甚至有些软弱。可无论政策继续还是停止，无论前后发生什么，她似乎总能替一个比她强大得多的东西找到理由。

防疫后期，我经常在 QQ 空间发一些所谓“负能量”的东西。之所以发在那里，是因为我希望以前的学生们能够看到一些和官方宣传不同的东西。后来，一个高中隔壁班的同学在 qq 上找我，问我既然对中国这么不满意，为什么不去国外。我跟他说了一些自己不满的原因，他几乎听不进去。他既愤怒于我的“不忠”，又可怜我这只迷途的羔羊，告诉我现在中国发展得多好，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将来中国一定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最后他说：“只有弱者才会抱怨环境，强者从不抱怨，只会努力奋斗，让自己过得更好。”

前段时间，我一个表姐在朋友圈发视频，教儿子模拟杀“日本鬼子”。我打电话劝她，不要让一个孩子从小去憎恨自己从未见过的人。后来谈到中国的宣传教育，她突然说：“弟弟，你不能不爱国啊。”我说：“我不是不爱国，我只是不爱共产党，也不爱习近平。”她马上

紧张起来：“你别再说了，再说我挂了。”我问：“你怕什么？你是怕我，还是怕习近平？”后来我们没有再争下去。我同样不能说她是坏人。她一直很关心我。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感到害怕。我害怕的并不是几个面目狰狞的恶人。我害怕的是，一个普通人如何在日复一日的教育、宣传和生活经验里，慢慢学会什么叫“懂事”，什么叫“顾全大局”，什么叫“感恩”，什么叫“爱国”。然后再把这些标准用在别人身上。

小时候，我们被教育要做“好学生”。老师打你，是为了你好。你受了委屈，要先想想自己哪里做错了。长大以后，我们又学会了做“良民”。国家有国家的难处。政府有政府的安排。别添乱。别抱怨。最可怕的不是我们自己学会了低头。而是有一天，当别人不肯低头时，我们会主动走过去，替掌权者按住他的头。然后告诉他：谁让你不听话。

七、你为什么要活在仇恨里？

妈妈看到我的朋友圈后，果然劝我删掉。她苦口婆心地问我：“你为什么要活在仇恨里？为什么不懂得宽恕？”我觉得莫名其妙。我仇恨他什么呢？他又没有打过我。为什么我骂他几句畜生，就成了活在仇恨里？

曹志星当我们的老师还不足一年，我却记了他将近二十年。因为恐惧。他的暴力虽然没有施加在我身上，却随时可能施加在我身上。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突然发作，也不知道下一个被抱起来往墙上撞的人会不会是我。二十年前，我亲眼看见那些暴力。二十年后，我看到的却是他坐在教师节采访的镜头前，和蔼地谈论自己如何关心学生。那些被他打过的学生有没有得到过道歉？这些年里，他有没有真正反省过自己？我不知道。可我不过是在朋友圈说出自己亲眼见过的事情，就已经有人来劝我放下仇恨、学会宽恕。

我不删。因为我不服。要不要宽恕，是受害者自己的事情。我没有被他打过，也没有资格替那些被他殴打过的学生宽恕他。只有加害者的帮凶，才会首先劝受害者放下仇恨，而不是劝施暴者放下棍棒。我不宽恕，因为我不配。那些被他殴打过的学生没有得到道歉，还轮不到我替他们原谅。更何况，我从来不相信，一个没有忏悔过的人，仅仅因为时间过去了，就自然变成了一个好人。我也不相信，一个没有真正面对自己过去错误的政府，仅仅因为那些错误已经成为历史，就不会在将来犯下同样的、甚至更大的错误。时间不会自动带来悔改。遗忘更不会。

八、毛病不改，积恶成习

这种“听话”的教育，并不是从我们这一代才开始的。我的爷爷奶奶那一代人经历了三年饥荒、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和文革。这样的经历，留给下一代的往往不是反抗的经验，而是更实际的生存智慧：少惹事，少说话，离权力远一点。他们被折磨成了共产党的“良民”。这些生存经验，又变成了对子女的教育。

而到了我的父母这一代，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又经历了“严打”、反自由化、1989 年的政治风波和严格的计划生育年代。他们见识过暴力执法的冤狱，做小生意的以“投机倒把”罪抓进牢里，超生被牵牛扒房，以及 89 年前后权力主导的社会氛围的迅速变化。这些事情一次又一次告诉他们：不要和权力较劲。于是，上一代传下来的“听话”，不再只是一句家训，而成了一种被现实反复验证过的生存经验。所以，我从小也被教育要听话、要顺从、要尊重老师、尊重长辈、不要惹事，不要跟国家对着干。

而到了我们这一代，我又看见很多人正在用类似的话教育自己的孩子。一代人被这样教育长大，然后再把同样的标准交给下一代。父母要求孩子服从，老师要求学生服从。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也慢慢学会了彼此监督，看谁还不够听话。我们不仅继承了上一代人的恐惧，也继承了他们解释恐惧的方式。于是，很多本来应该被追问的事情，就这样一代一代变成了：“算了。”很多本来应该被纠正的伤害，也一代一代变成了：“都过去了。”没有被反省的东西，就这样被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毛病不改，积恶成习。

正因如此，我才越来越反感那句：“为什么不能宽恕？”为什么一个人说自己累了，要先证明世界上没有比他更累的人？为什么一个人受了伤，要先反省自己是不是太矫情？为什么一个人不愿服从，就有人觉得他被打也是活该？为什么到了最后，总是受伤的人被要求成熟一点、宽容一点、懂事一点？

我已经做过太多年的“好学生”，不想再做“良民”了。如果连正常表达自己的感受，都要先自省自查，反省自己是不是不够宽容、不够成熟，那么我宽恕的恐怕不是那个曾经施暴的老师。我只是又一次宽恕了自己的懦弱。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沉默与抗争

—— 法国新时期“革命”纪实

作者：刘畅



一、巴黎人的无奈

记得刚到巴黎时，我坐着移民局警车，我望着窗外，一个醉酒老头，右手一个酒瓶，左手一本书，在闹市区路中央声嘶力竭控诉着什么，警车赶紧绕开。停在红绿灯时，一个流浪汉又来挑衅，脚踢副驾驶大门。坐我旁边的女警官很淡定，打开最新版的苹果手机玩着游戏，把我也吸引过去，看得正着迷，女警官还脸红了，赶快翻出他儿子的照片 ..... 我不禁感慨，在普通法国人眼里，这个世界一面是革命，一面是“罗曼蒂克”。

在巴黎生活呢，恰逢大罢工，街道上垃圾堆积如山，坐着地铁，突然广播通知：地铁罢工。你稀里糊涂被丢在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地铁站，只好绕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公交站台。刚开始，站台上聚着一群人，大家怨声载道，抱怨公交怎么还不来。等了半天，公交还是没有。人一个个散去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心想，算了，走吧，看来公交也罢工。我只好悻悻然穿过马路，准备徒步远走。就在这个时候，一辆公交车突然来了。我赶紧转身往回跑。结果还没等我跑到站台，公交车已经开走了。那一刻，我站在巴黎街头，突然不知道该气还是该笑。

几个月后，全城又骚乱，到处都是烟雾缭绕，一会这座仓库被烧，一会那座公寓被烧。一次马路边抽烟，看到一个蒙面人在用打火机试图点市场里的垃圾堆，一个大妈突然问：Que faits vous？那个人跑了。大妈赶快通知市场管理员 .....

法国人的运动，有时候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你明明知道它会发生，却永远不知道它究竟会以什么方式影响你的生活。

社会进步靠运动推动，运动则由人民掌控，这才是人民的意志和自由，倘若你的人民嘴不能说、言不能传，只有被动接受，那不是人民，而是奴隶或者牲口！当然，法国人民是“真人民”，他们敢怒敢言、敢爱敢做，为什么“敢”，因为法律允许，人民拥护。

二、华人的沉默与黑人的抗争

法国是世界民主的灯塔，也是民主运动的祖师爷，从法国大革命到巴黎公社，从共产国际到十月革命，再到中共“解放”战争。但百年来，民主运动早就被他的学生们当成了“夜壶”，用完了就塞床底下，还不准别人用，而他们的革命导师法国呢？却依然“革命”不断，动不动罢工，动不动示威游行。这就苦了法国人民，一会地铁罢工，一会公交罢工，一会清洁工罢工，今天又是学生运动，严重影响了市民生活，垃圾堆成山，但有什么办法？“革命”是共和国的立国之基，是国家赋予人民的权利，世代相传已成习俗。法国人民要革命，法国的黑人同胞也要革命，还是积极推动和参与，一会是暴动，一会是商店被砸、被抢，公交站被砸，车被烧。几年前一个警察在黑人驾驶逃逸时碰着胳膊误走火，黑人尚且如此激动。然而很多朋友说，巴黎也曾有警察打死华人，中国人却闷着不出声，小打小闹后也不了了之，说中国人太不团结，但笔者认为，难道仅仅是中国人不团结造成的？原因很多，分析如下：

1. 中国人的特点是“忍得”，这是几千年皇权宗法塑造下中国人性格，一点鸡毛蒜皮的事不计较，事不关己也不管闲事，久而久之就各自为政。中国人有没有团

结的时候呢？有，革命时代疯狂灌输了民族主义、阶级主义、爱国主义，就产生不少凝聚力，红卫兵、知青把“革命”输出到香港、日本、加拿大，搞得国外一片狼藉，随着八九六四的破产，老一辈早变成被阉割的老牛，没了脾气，年轻一辈又一代代被强化政治洗脑，成为了红旗下的顺民。到了国外，也确实把“温顺”“皮实”“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带出来了。

而法国人，不论肤色，可以因为一个插队、一个烟头给别人叽叽呱呱半天，把“君子动口不动手”发挥到了极致，鼻子对鼻子对骂，恰如中国农村妇女骂街，偶尔胀红着脸、扯着脖子面对面咆哮，很好地诠释了“高卢雄鸡”，这是他们的权利，他们也就不用忍！

2. 华人在欧洲尤其是法国算小众群体，种族力量弱小，觉得数量还比不上黑人弟兄，明显底气不足；加上，在老共的“革命”传统熏陶下，中国人窝里斗的传统得到极大发扬，出了国也彼此不那么信任，甚至于彼此提防，这就导致人数有限还不那么团结。

3. 黑人弟兄在欧美几百年移民史也不夸张，时长和绝对数量都是华人移民比不了的，在这漫长时期，与白人的磨合的斗争已经形成风俗、传统和本能，经验丰富且获得了不少成功，尤其是美国，经过百年抗争，获得了极高的社会地位和法律保障，只要一出问题，一旦上升为种族主义，让白人弟兄都防不胜防！华人祖祖辈辈没有这段海外“革命”历史，所以革命意识淡漠、经验缺乏。

4. 法国黑人老移民有不少从事教育、法律、科研等正当职业，但也有不少新移民，从事正当职业的不多，除了干点底层工作，占福利、钻空子大有人在，类似于国内定义的流氓无产阶级，一有事，这个群体自然成为被煽动、利用的对象！这跟默默无闻、苦心经营的大多数华人差别很大，无论有身份没身份，他们“有产”就意味着“资产阶级局限性”，也就没有“革命”的勇气。

5. 民主国家的特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是他们的权利，动不动游行示威，这本身就是工作的一部分。但习惯逆来顺受的华人看来，这样的抵抗浪费时间精力，也改变不了大趋势，这也是八九六四之后的社会风气：服从大局、顺从大局才是中庸，没有大局（国）哪来的个体（家）呢？于是不抵抗和接受命运。

因此，华人与黑人在法国面对公共事件时表现出的不同社会表达，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谁更团结、谁更勇敢”。它既受到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移民时间、人口规模、社会组织程度、经济地位以及法律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也与不同群体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和行动方式密切相关。沉默未必意味着懦弱，抗争也未必意味着正确；真正值得思考的是，革命也好，不革命的罢，合法合规的基础上，表达合理的主张没什么不对，争取恰当的权利也没什么过错，是值得鼓励和推崇的，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不能限制人民的表达。但是如果这样的表达方式上升到煽风点火、威胁人身安全等，那也是需要杜绝的。无论是哪个种族，既然生活在法国的领土，就应该热爱这个国家，切不要动不动拿种族主义作为借口，制造矛盾和动乱，而让民主运动变了味。中共口口声声宣传的“爱国主义”，民主国家也可以借鉴嘛，大家移民到这个国家，讲着同一个语言，呼吸同一空气，吃着同样的法棍，无论肤色都是兄弟，国家对我们不公，我们就一起来反对和表达，国家对你们好，就一起来拥护。但千万不要学共产党，没阶级要强分阶级，没有隔阂偏偏要修一堵墙，同一个民族尚且不团结，怎么来团结世界人民呢？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美编：胡海宁



遥遥领先，为何飞不起来？

—— 从“弯道超车”看中国可回收火箭的技术困境

作者：罗翔



中国这些年最喜欢讲“弯道超车”。但如果把产业发展的路径扒开来看，会发现一个尴尬事实：很多所谓的自主崛起，并不是凭空从零开始，而是在全球产业链转移、国际订单和西方企业严苛标准中，一点一点“喂”出来的。

为什么中国电子产业发展得这么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承接惠普、戴尔、苹果等跨国企业的制造订单。外企把产品要求、质量标准和验收规则带进来，中国供应商才真正知道：一块铜箔、一颗螺丝、一个连接器不是“能做出来”就算合格，而是必须满足尺寸、公差、可靠性、寿命和一致性等一整套指标。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工业教育。

企业不是看几份图纸就突然拥有工业能力的。真正的能力，是在一次次订单、失败、返工和退货中磨出来的。客户告诉你哪里不合格，供应商再改；客户提出更高要求，供应商再升级。久而久之，一条成熟的产业链就这样形成了。

汽车工业同样如此。几十年来的国际合作带来了零部件体系、生产管理、质量控制和全球供应链标准。中国企业从“照着造”，逐渐发展到“自己造”，再到“自己设计”。今天中国汽车产业拥有庞大的供应链体系，与这些长期积累当然脱不开关系。

航空工业也是类似逻辑。中国企业参与波音、空客等国际航空产业链，在机翼、机身结构件、起落架等领域接受国际标准训练。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学会制造一个零件，而是学会什么叫航空级质量控制、材料一致性、结构可靠性和适航标准。

所以，后来中国能够推出自己的民用飞机，并不意味着过去几十年的国际产业链经验消失了，恰恰相反，这些积累正是后来发展的基础。至于运-10，能造出一架飞机，与能不能建立完整的民航工业体系，是两回事。飞机能飞起来，不等于拥有成熟的民航产业。

问题到了航天领域，就变得更加有意思了。因为航天恰恰是一个很难依靠西方产业转移完成工业启蒙的领域。苹果可以给你订单，波音可以给你零件，但火箭呢？核心技术、关键材料、发动机、控制系统、飞行软件和测试体系，并不存在一个成熟的西方企业把完整订单体系搬过来，告诉你：“按照这个标准生产。”

于是，一个现实问题出现了：即使你知道可回收火箭应该怎么飞，也未必知道组成它的成千上万个零部件，怎样稳定、可靠、批量地制造出来。这就是“知道技术路线”和“真正拥有产业能力”之间的鸿沟。

马斯克和 SpaceX 已经用长期试验验证了可重复使用火箭的路线：垂直起飞、发动机深度节流、姿态控制、返回制导、垂直着陆和重复使用。既然路线已经有人走通，后来者照着走，为什么不能明显更快？





因为工程不是电子游戏，更不是把别人的攻略抄下来就能通关。设计图不会自动生产发动机，参数不会自动培养供应商，一次试验成功也不会自动变成稳定量产。

真正困难的地方，往往藏在不起眼的细节里：高温合金能否稳定生产？密封件能否经受极端温度和压力？阀门能否保持数千次动作的一致性？隔热材料批次之间会不会出现差异？焊缝有没有微小缺陷？传感器在剧烈振动下还能不能正常工作？这些问题单独看都不起眼，但叠加起来，就是火箭能不能安全返回的生死线。

所以，真正决定可回收火箭速度的不只是总设计师手里的图纸，更是整个供应链背后的工业基础。所谓后发优势也只有在产业基础足够成熟时才真正存在。

如果别人已经把题目做完，而你连每一种材料、每一个零件、每一套测试设备都需要重新摸索，那么你拿到的不是答案，只是别人写在黑板上的一句话：“这道题可以这样解。”剩下的步骤，仍然要自己摔无数次跤。

更讽刺的是我们常把“产业链完整”等同于“工业能力全面领先”。可真正的工业能力，不是工厂多、论文多、宣传片宏伟，而是面对苛刻要求时能不能稳定制造；零件出问题时能不能找到原因；连续生产时能不能保持一致；系统失败后能不能把失败变成下一代产品的经验。

别人用了二十年烧钱、爆炸、失败、复盘，才把路线跑通。后来者可以少走弯路，却不能跳过所有试错，更不能跳过供应链成熟、人才积累、测试体系和质量文化的形成。于是熟悉的口号又响起来：“弯道超车，遥遥领先！”

只是火箭升空之前，工业能力也得先升空。宣传口号可以一夜之间遥遥领先，供应链却只能用十年、二十年，一颗螺丝、一只阀门、一块材料地把“领先”拧出来。

火箭有一个很讨厌的特点：它不看宣传稿，也不看热搜，更不会因为“全球领先”四个字就改变物理规律。发动机不会因为喊“自主可控”就自动提高寿命，阀门不会因为“遥遥领先”就自动完成可靠性验证。那些藏在火箭内部、没人拍照、没人宣传的零件，也不会因为一场盛大的发射仪式就突然拥有几十年的工业积累。它们只认一个东西：你到底能不能把它稳定地造出来。

因为弯道可以画在 PPT 里，领先可以写在标题里，唯独火箭落地以后，还得看看它还能不能再飞一次。

当一个国家越来越擅长宣布“遥遥领先”，却仍然需要用十年、二十年去补一颗螺丝、一个阀门、一项材料的工业积累时，我们究竟是在实现真正的弯道超车，还是只是在不断制造一种“已经领先”的感觉？

编辑：周志刚　校对：王滨　美编：胡海宁





给台湾年轻人的一封信

作者：蔡诗文

致台湾的年轻人：

我来自中国、爱台湾。有些话想写下来给你们，希望我们可以有机会坐下来谈谈。

首先我想说，我能理解你们累了。从小到大，每一次选举都被说成"关键的一战"，每隔一阵子新闻就提醒你，对岸又在演习了。另一边，你只是想努力过幸福的日子。

这份疲惫，民调里看得见。2024大选之前，2023年6月台湾民意基金会的一份民调，已经把这种年轻人的心情表现得非常明显：20至24岁选民中，柯文哲的支持度高达67%，远高于赖清德的8.8%和侯友宜的7.4%；25至34岁中，柯文哲也以40%领先赖清德的28%和侯友宜的13%。"不要再吵统独，先顾好我们的生活"，说中了很多那时候台湾年轻人的心声。

柯文哲涉案后，民众党的好感度明显回落。《美丽岛电子报》2026年4月民调中，20至29岁对民进党的反感度一度达54.5%；但到6月，民进党在这个年龄层的好感（44.3%）已略高于反感（40.3%），反而是国民党与民众党的反感度都超过五成。不过，两次民调中都没有任何政党在年轻人中获得过半好感。许多台湾年轻人并没有稳定倒向哪一党。这透露的或许是一种对政党政治的疲惫。

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买得起的房子、可以规划的人生，这些愿望一点错都没有。你们当然可以厌倦那些反复出现的政治口号，也可以不想每天追着选举和两岸新闻跑。政治本来就不该吞掉一个人的生活。

但也正因为你们已经很累了，我更想把一些我亲眼见过的事情讲给你们听。不是为了让你们更焦虑，也不是要你们活在战争的恐惧里。怎么看、怎么选择，由你们判断。

我眼中的台湾

在台湾，特别是在台南，常让我停下脚步的是街角那些小店。很多已经开了几十年，传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他们不急着扩张，只是一年又一年把同一件事做好。一个人敢把一辈子押在一间小店上，是因为他相信今天的用心，明天还会有收获。

十多年前，我在花莲旅行时请过一位导游。他支持国民党。大概知道我从中国来，他一路上讲了不少"两岸一家亲"的话。我心里并不认同，只是没有说出口。但让我记住他的，是另一件事。

那天天气不好，他带我去的景点很快就逛完了。他大概觉得收了钱却没让我玩尽兴，过意不去，就多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带我去一处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天然硫磺温泉。看到我喜欢那里，他脸上露出了一种松了口气的笑。这些年想起台湾，我常想起那个表情。这份善良，跟他支持哪个政党无关。

这些在台湾再平常不过的事，在我的国家却从来不是理所当然。在中国，一间开了二十年的小店，可能因为一纸通知就得关门，没有人需要向你解释。2021年突如其来的"双减"政策，几乎摧毁了中国原本庞大的学科类课外培训行业。公开挑战官方叙事的人，轻则被约谈、重则坐牢。2020年初，武汉医生李文亮在同学群里提醒大家防范一新冠状病毒，被警方以发布、传播不实信息等理由训诫，一个月后，他死于新冠。2015年的"709大抓捕"中，大批维权律师、法律工作者和公民被带走、约谈或拘押，律师王全璋后来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在中国，大多数人都学会了先活下来，别的以后再说。

同样的年轻人，不同的命运

在台湾，你们可以公开批评市长、批评总统，可以上街抗议，第二天照常上班上课。2014年春天，台湾的学生占领了立法院。不管怎么评价那场运动，参与的人后来面对的是选票、舆论和法院。

同一年秋天，香港的年轻人撑起雨伞，在街头坚持了79天，要的是真正的普选。那一年，17岁的周庭是学民思潮的发言人。2020年8月，她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同年12月又因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被判刑入狱。出狱后，她的护照被扣了将近三年。2023年她申请出国读书。她后来表示，在取回护照、获准离境前，国安人员陪同她去了深圳参观改革开放展览；回来后，她还亲笔写信，感谢警方安排她了解"祖国的伟大发展"。她说，这样的信，那几个月里写过好几封。到了多伦多，她宣布不再回港报到。不久，她被香港警方列入通缉名单。

邹幸彤是执业律师，也是支联会前副主席，长期参与每年的维园六四悼念活动。2021年，她因为呼吁市民去悼念而入狱。法庭上，她说如果一定要讲"煽惑"，那是香港人煽惑她按良知行事，她为此受刑，无怨无悔。许多人离开香港的那几年，她留了下来。2026年9月11日，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监禁7年3个月。

在香港，这就是为普选、为一根蜡烛说话的代价。

2022年11月，乌鲁木齐一场火灾之后，中国各地的年轻人举起了白纸。纸上一个字都没写，因为他们知道，写什么都可能是罪。事后，参与者、年轻女孩曹芷馨在被带走前录下视频，请大家追问她们为什么被捕，

不要让她们无声无息地消失。一位拍下上海白纸抗议的纪录片导演陈品霖，因为制作并发布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被安上"寻衅滋事罪"判刑三年半。

同样是年轻人，同样想为自己的未来说话，在台湾、在香港、在中国，换来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命运。

在那堵墙里面，一直有人在看着你们

我不怪身在中国、认为统一是唯一答案的许多人。一个人从小听见什么故事、看见什么世界，会影响他怎样理解自己的国家和未来。很多人习惯了从国家、民族和集体的角度思考，却不知道一个普通人也可以问一句：我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当权力又可以随时、任意的介入，而普通人很难要求它解释和负责，久而久之，人就会学会先顺着大局走。

中国也有另一些人。他们不是多数，但他们在。2019年香港的年轻人上街时，有数百位身在中国大陆的大学生手写字条向香港致敬，并附上学生证或身份证的局部照片证明自己真的来自中国。后来有人把这些照片整理成了一段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KArxVyqFOs

所以，当我说希望这样的地方能被好好守住，我并不是觉得你们肩上有什么历史使命。你们没有义务替那一边的人负责，更没有义务为了证明什么而牺牲自己的生活。

我只是想告诉你们：你们拥有的这些选择，对有些暂时没有选择的人而言，远比你们想象得珍贵。你们可以投票，可以批评政府，可以上街，可以说"不"，也可以什么政治口号都不相信。

这些事情对你们来说也许已经普通到不值得一提，但正因为普通，它才值得被珍惜。

一场不只关乎市政的选举

11月28日是九合一地方选举，22个县市同一天改选首长和地方民代。这是2025年大罢免之后的第一场全国性选举，也普遍被看作2028年总统大选的前哨战。中选会估计，这次的首投族有60多万人。

地方选举谈的多半是托育、捷运、市场整修，正是你们最在乎的生活。但今年在台北，生活和两岸刚好缠在了一起。

现任市长蒋万安争取连任，民进党在5月征召立委沈伯洋挑战。沈伯洋是北京点名的对象：国台办在2024年10月把他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2025年10月，重庆市公安局又以他"发起、建立'台独'分裂组织黑熊学院"等为由，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对他立案侦查。一个台湾公民在台湾参选，却被中国的公安列为刑事追诉对象。

蒋万安有他的市政成绩，沈伯洋有他的政见，选民本来就该用市政的标准检验两个人。我提这件事，不是要替谁拉票，而是因为它让我看到，北京的施压不只靠海峡上的军机，也会伸向台湾人自己的选举。你们可以批评自己的政府，可以换掉自己的市长，也可以讨厌所有的政党。你们可以什么政治口号都不相信。但有一件事，我希望你们永远自己决定：谁可以被选上，谁不可以。你们不应该让北京决定你们应该害怕谁、不能选谁。请你们照常、不受恐吓地去投票，投给自己认为对的人。

这次年轻人的票也特别难预测。台北市长选战中，不同民调甚至给出了相当不同的结果。5月TVBS民调显示，在20至29岁有投票意愿的台北选民中，蒋万安以60%领先沈伯洋的37%；到了9月，信民两岸研究协会的民调却显示，20至29岁沈伯洋以42.8%领先蒋万安的37.8%，30至39岁也是沈伯洋领先。

两份民调的方法并不相同：TVBS只用市内电话抽样，并只统计有投票意愿者；信民民调则加入手机样本，对象是全体成年市民。因此，这种差距究竟有多少来自真实的民意变化、有多少来自抽样方式，目前仍难判断。

但至少有一点很清楚：台湾年轻人的票没有被任何一个政党锁住。他们可以因为市政投票，也可以因为两岸问题投票；可以支持这个人，也可以下一次换一个人。

这种"看人不看党"是健康的挑剔而不是冷漠。我在中国时从来没有机会这样挑剔。在香港，办一场初选可以换来十年牢狱；在中国，举起一张白纸可能让一个人彻底消失。在台湾，你们只需要走进投票所。投给谁，是你们的事。

最值得守住的，是选择

很多社会都走过这段路：越富足、越人道，人就越重视自己的生活，越不想谈冲突和牺牲。人人都能安心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本来就是值得追求的。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厌倦政治没有错。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有一天连"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都不再能够由自己决定。

去年底有一份民调，里面一个数字我看了很久：对政府编列的2026年度9,495亿新台币国防预算，20到24岁的年轻人有54%赞成，只有22%不赞成。说自己厌倦政治的是你们，在守护这座岛这件事上表态最清楚的，也是你们。厌倦政治，和不在乎这座岛，从来就是两回事。

我在你们身上看到的，是温柔，也是坚强。台湾的年轻人，我祝福你们。

一个爱台湾的中国人
2026年10月4日

编辑：张致君　校对：孔祥庆　美编：胡海宁

从越南高铁到全民福利：中国究竟“赢了”什么？

作者：刘畅



最近越南与欧洲签约高铁项目，本以为某些人会反思越南为什么选远亲而不选近邻？恰恰相反，国内的媒体大肆宣传，越南签约欧洲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赔了钱，还搭上廉价劳动力。明眼人一看，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新闻播了几天，效果明显不咋地，又出现另一种新闻，中国和河内签署了工业园、公路等修建协议，来宣示这个邻居并没完全抛弃自己。不过是个欧越高铁项目的合作事件，偏偏弄出两个版本的新闻。恰恰应验了中共百年不变的新闻宣传方针“报喜不报忧”，对国外事件呢，报忧不报喜，人家没忧也要弄出点“忧点”，再反其道而行之，秀自己的存在，网络上出现一个新词“赢了”，在舆论上赢了，在宣传上赢了。这样一看，如果说阿Q精神在民国之前只出现在民间，而现在是官方内定、法定，冠冕堂皇，简直到了极致！

提到越南，大家并不陌生，百年前中国的藩属国，中法战争后，法国逐步取代清朝对越南的宗主权。近代时期，经历越法战争、越美战争，最终取得独立。在经济发展上，每一步都在效仿中国，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劳动红利等，这条路线，不亚于当年模仿日本的中国。

当代的中国，无论是汉语词汇的引进，还是政策的效仿，太多脱胎于日本，什么素质教育、国企年功序列制度、国企改制、公务员选拔制、大学生扩招、大学生村官、选调生，都是日本在几十年前实践过的。更不要说，早期电影、电视、音乐中日本文化的影响，高铁、重工等工业影响。但绝大部分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一事实，尤其在互联网并不发达的昨天。在中共的意识里，功劳都是自己的，人民无功，友邦无劳，拿来的都是他自己的。那老百姓知不知道，中日建交后，日本为了支持中国发展，提供了贷款和其他援助，更不用说，上世纪80年代，提供了多少技术和生产线？中国人民，在上个世纪掀起的日语潮、日本出国风也不是假的。

在这里，我不是宣传日本有多好，而是说明，日本这个中国现代化的最大的外籍功臣之一，中国尚且可以肆意抹黑，更不要提同样有贡献和支持的美国和欧洲。中国为什么对自己有帮助的友邦这个态度呢？

答：我曾经常给他们分享一个观点，为什么中共在文革时期坚决打击一切宗教？因为中共想当“上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切风头盖过它的人物、组织、国家都必须在它之下，无论是它认为好的或者坏的。好的呢？它想方设法收编到它的麾下，或发展为党员，或者统战到其阵营，如果统战不成，就过河拆桥，把他们的功劳据为己有再抹黑之。它认为坏的呢？李洪志、马云等就是其下场。回到刚才那个问题，这些友邦虽然帮助了中国，第一、其风头容易盖过中共，第二、人权观念无法达成一致，就只有将其收功再抹黑。当中国人在侵华战争的历史叙事中被洗脑，出现仇日、反日情绪，甚至在深圳血案发生后，谁知道这个国家曾帮助中国人走向现代化？谁知道1989年后，这个国家为中国人民的人权而奔走和呼号呢？

反观越南，虽然是中国的学生，这些年默默地招商引资，默默地发展，秉持“竹子外交”，不站边，既不得罪中国，也与欧美关系稳定，逐渐成为了亚洲发展的一颗新星。主动与欧洲合作，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则。他们并没有学中国，动不动要求外企与国企合资，霸王条款一大堆，随时为“过河拆桥”埋下伏笔或者留后路。既然这样，越南就像个初出江湖的小兄弟，实力虽然不强，但谦逊低调，主动融入江湖规则，中国呢，则像个江湖老油条，有一定地位，但老奸巨猾，在它掌握绝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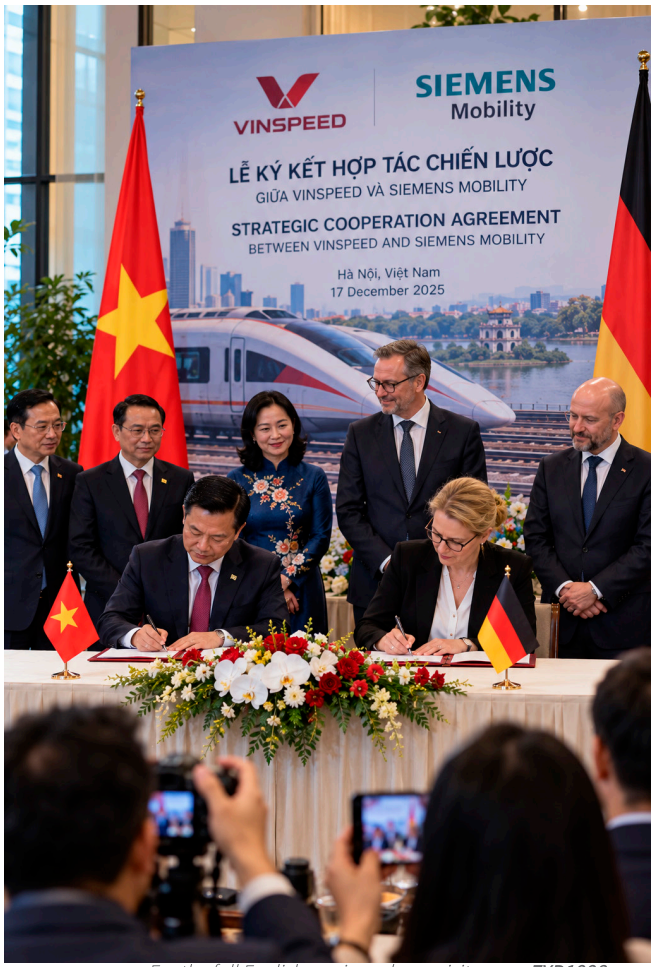
垄断地位时，别人有可能被迫顺服于它，但大环境中一旦出现更多像越南这类敦厚的小兄弟时，这种风格只会被丢进历史垃圾桶。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近五十年，到底该怎么走？治国治企如同做人，合作才能共赢，凡事不着眼于你死我活的输赢逻辑，懂得尊重他人，有收获也必须有付出，才能长久合作；如果只是仗着地大物博、人口红利，处处对他国掣肘，处处搞经济霸权，你又如何在这个世界得到尊重？又有人说了，中国和第三世界走得很近，朋友很多，但那些朋友是中国抠人民的福利去“撒币”收买的，有钱就是朋友，没钱狗屁不是，这些国家墙头草两边倒，巴基斯坦就是例子。所以，治国也得靠仁义礼智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遵守游戏规则，不是靠投机取巧，今天偶然取胜了，明天呢？友邦全部跑了，难道又回到闭关锁国、闭门造车的天朝“内需”时期？

再谈谈前段时间一个新闻，越南对外宣传，争取2050年建成发达国家。国内的人觉得越南不自量力。中国人在国内被洗脑，认为发达国家就是GDP、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硬件，其实还有什么？共产党永远不会告诉你，“发达”更多是国家给予人民的福利，从人权、医疗、教育、生老病死等一条龙保障。一个国家敢给他们人民承诺“发达”，就是承诺给予福利，这难道不是一种魄力和胆识？然而很多中国人连“福利”这个词都没听说过，更不要说福利的直观理解。以前罗大佑的歌曲《童年》，第二段唱道：福利社里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这一段也因政治原因被“和谐”掉了。中国发展了这么多年，财富积累这么多年，对内始终一句话：中国始终长期处在发展中阶段。也就是说，中国人民将长期不配有福利。要么说中国人口多了，但人口数据到底多少，它自己统计，它自己最清楚；要么说中国还要积累资本搞基建，中国的基建已经超越了很多发达国家了，还有太多重复建设，这个很重要吗？既然号称全民所有，为什么福利只限于体制内，可全民的“分红”呢？既然号称社会主义，可是全民共享福利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否则就是资本主义或寡头。

最后，希望越南能一如既往地保持这种谦逊低调的外交作风，遵守规则，主动融入世界、服务于世界，造福于越南人民，发不发达不重要，只要坚持到底，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定会成为东亚的另一种“发展”的可能，也能成为一面照妖镜，照出自己的清白坦荡，更照出真正的妖魔鬼怪！

编辑：胡丽莉　校对：孔祥庆　美编：胡海宁



祝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 苦心提醒台湾人民提高警惕

作者：关永杰



同为华语群体，我们这些出生、生活在中国的人，由衷地羡慕台湾人民。台湾今天所拥有的民主自由状态，以及在平等、法治、经济发展、人民福祉上所取得的骄人成就，不仅令我们羡慕与向往，更是整个华语世界文明的骄傲。然而，在共庆国庆的时刻，鉴于目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作为共同追求民主、捍卫自由的同道，我想提出以下两点危机提醒：

第一、借鉴香港血泪教训：绝不能相信中共的任何统战承诺

请大家务必清醒地认识到：中共是一个毫无契约精神的组织。当年的《中英联合声明》被他们一句"历史文件"彻底撕毁。如今的香港，自由与法治被蚕食，经济实力大幅倒退。香港的现状，就是中共背弃承诺所造成的结果，它是台湾最血淋淋的反面教材！大家必须时刻保持最高警惕，绝不要接受任何形式的以"一国两制"为名的政治安排。

第二、看穿武统虚张声势，更需严防"非传统超限战"的内部瓦解

要跨越上百海里的台湾海峡进行跨海登陆作战，两栖登陆与后勤保障难度极大。中共内部官僚与军工系统"欺上瞒下"的腐败，可能导致部分军备的实际性能与宣传存在差异。普京高估自身军事实力，是导致原计划闪击乌克兰，最终深陷泥潭四年多仍未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

常规战争方面中共可能力有未逮，但不要忘记，毫无底线是独裁专制政权的特质，所以，在战术上必须死守防线，严防中共的非传统手段：

——非常规威胁： 警惕化学、生物等非常规手段的潜在风险；

——舆论认知战： 严防铺天盖地的虚假资讯干扰；

——内部渗透： 严防中共用金钱或其他利益进行渗透，收买台湾内部个别立场不坚定的军事要员、政治人物、网红或明星，从内部削弱抗敌意志。

两岸的根本问题，不是什么血浓于水的宏大叙事，而是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民主与专制的体制之争。台湾的民主自由，是整个华语地区不灭的希望。希望台湾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永远坚定、自信地走下去！

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社保沦为政府敛财的工具

作者：吕峰

人民以为的社保：政府兜底，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中共治下的社保：人民兜底，为体制缺口持续买单。

据国新办发布会相关新闻，截至2026年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面对尚未参保的人群，人社部门提出，要通过“数据找人”，找到他们，动员参保。

对于这项政策，中共只关心还有多少人没有进入系统，而不是这些人为什么没有参保：是收入不足，是就业不稳定，还是对未来待遇缺乏信心？

当政府首先强调如何找到缴费者，却没有同样充分地回答民众如何负担、如何监督，社会保障就可能偏离保护劳动者的初衷，变成向劳动者转移制度成本的工具。中国社保争议背后，是中共独裁体制下权力与民众之间的不对等：制定规则的人掌握征缴权，承担成本的人却缺少有效的政治问责渠道。

一边是扩面指标，一边是家庭账本

根据网络数据，以河北灵活就业人员最低缴费基数4446元、养老保险费率20%计算，每月缴费889.2元，一年10670.4元。这还没有包括医疗保险。

同样一笔缴费，落在不同收入者身上，重量截然不同：

每月收入	每月养老缴费	占月收入比例
3000元	889.2元	29.60%
5000元	889.2元	17.80%
8000元	889.2元	11.10%

这一对比采用相同最低缴费额，只用于说明支付能力差异。对月收入3000元的人来说，单是养老保险就接近收入的三成。所谓“最低档”，并不意味着低收入者就承担得起。

根据网络公布的2025年收入数据，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36231元，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150元。河北上述最低档养老年缴费，分别相当于这两个数字的29.5%和105.1%。

家庭人均收入不是就业者工资，不能据此认定每个低收入者都必须拿出全年收入缴费。但这个对照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职工养老的缴费门槛，与部分家庭的经济能力之间存在明显距离。

政府不能把这种距离简单解释为“保障意识不足”。对于缺少积蓄的人，今天的房租、孩子的生活费和父母的医药费，都是无法推迟的支出。政策要求他们考虑几十年后的生活，也必须先尊重他们今天的生存。

一边是基金结余，一边是财政依赖

发布会相关新闻提到，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达到11.2万亿元。这个数字包含不同险种，不能全部当作养老保险的可用资金，也不能用来代替对年度收支的解释。

根据网络财政数据，2024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约8.19万亿元，支出约7.28万亿元，其中财政补助约1.93万亿元。

项目	金额
基金总收入	约8.19万亿元
基金总支出	约7.28万亿元
当年收支差额	约0.91万亿元
收入中的财政补助	约1.93万亿元
扣除财政补助后的收入与支出之差	约-1.02万亿元

最后一项只是静态算术对照，并不意味着财政补助应当被取消，更不等于基金已经无法支付。它说明的是，财政支持对于维持收支平衡具有重要作用。扣除财政补助后的收入，也不能直接等同于全部缴费收入。

既然养老保障依赖公共财政，公众就有权知道，补助如何分配，哪些群体获得更多支持，未来压力准备由谁承担。不能在展示成绩时强调结余，在讨论责任时却主要强调普通人的缴费义务。

财政压力不是独裁体制独有的问题，但谁有权决定解决办法、谁承担调整成本、谁能追究决策责任，是政治制度必须回答的问题。中共不能要求公众无条件承担

长期责任，却拒绝让公众对权力形成实质约束。

一边是共同承担，一边是待遇悬殊

根据网络数据，2025年企业退休职工人均月养老金约3962元，城乡居民养老待遇领取者约281元。

对比项目	企业退休职工	城乡居民养老待遇领取者
人均月养老金	约3962元	约281元
按月额折算的全年待遇	约47544元	约3372元
两者月待遇相差约3681元，前者约为后者的14.1倍。		

两者月待遇相差约3681元，前者约为后者的14.1倍。

两套制度的缴费水平、缴费年限和历史安排不同，不能把这一差距直接解释为相同付出获得不同回报。但公共财政的作用，恰恰应当包括弥补弱者保障不足，而不是让历史差距成为永远不必改变的理由。

一个领取居民养老金的老人，全年待遇约3372元；一个按上述河北最低档缴费的灵活就业者，全年养老缴费约10670元，约为前者全年待遇的3.2倍。这并不是同一制度内部的个人收益比较，却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农村家庭的感受：老人得到的支持有限，年轻人承担的缴费却并不轻。

最需要解释的，是公共资源为什么这样分配，以及处于底层的人能通过什么渠道推动改变。中共若以代表人民自居，就必须接受人民对分配公平的追问，而不能只要求人民理解财政困难。

一边是长期缴费，一边是门槛提高

按照已经公布的改革安排，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从2030年起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最低年限增加5年，增幅为三分之一。

如果仅以每年10670.4元作静态示例，15年缴费约16万元，20年约21.34万元，相差约5.34万元。实际缴费会受到未来基数变化影响，增加缴费也会影响待遇，因此这不是净损失测算。但对于现金紧张的家庭，多承担五年的缴费义务，已经足以改变原有生活安排。

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可以基于人口变化调整，但改革必要性不能代替公众参与。规则调整应当说明成本如何分担，为困难群体提供什么过渡安排，以及参保者的合理预期如何得到保护。

独裁体制的问题，在于政府能够要求个人修改人生计划，个人却难以通过选票追究政策制定者的责任。公众被要求相信长期承诺，却缺少足够力量约束作出承诺的一方。

保障人民，还是管理缴费者？

依法督促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是保护劳动者权益；对于依法自愿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则应当尊重选择，通过补助和便利吸引参保。不能因为掌握了数据，就把所有未参保者都当成等待完成的行政任务。

当指标层层下达，基层可能更关心新增了多少账户，而不是家庭承受了多少压力。数据系统越精密，越需要清晰的权力边界和有效监督。否则，技术提高的只是征缴效率，民众的处境并未因此改善。

不是所有社会保险缴费都构成剥削。但如果权力能够持续向劳动者提出要求，却不必充分回应其支付能力；如果制度调整的成本不断向弱者转移，而资源分配缺少有效问责，那么对其剥削性的批评就有充分理由。

中国社保需要的，不只是更强的征缴能力，更是更公平的财政分配、更可负担的参保门槛，以及公开透明、能够追责的权力运行机制。

骑手、农民工和小摊贩首先是拥有权利的人，其次才是缴费者。他们没有义务以无限忍耐，承担不受自己监督的权力所分配的成本。

政府能够找到他们的身份证号、就业记录和缴费账户，也应当看见他们的收入、债务和生活困难。社保应当帮助人民抵御风险，不能成为中共向人民转移治理成本的提款机。

编辑：钟然　校对：王滨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美国中期选举：最后三周的变数

作者：贾嘉



距离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只剩不到三周。目前的政治气氛明显不利于特朗普和共和党。经济、生活成本、伊朗战争以及特朗普个人支持率，都成为共和党需要面对的问题。近期调查也显示，独立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明显下降，民主党选民的投票积极性暂时占优。

但如果现在就断言"民主党大胜"，仍然为时过早。值得观察的是未来三周有没有事件改变选民关注的核心问题。

美国中期选举历来不是一场完全按照民调运行的比赛。尤其是今年，政治环境存在几个非常明显的"变量"。

一、第一种可能：选情继续按照目前方向发展——民主党温和反弹

如果接下来三周：油价没有明显下降；食品和日用品价格继续成为抱怨重点；伊朗战争没有结束；特朗普继续成为选举核心议题；独立选民继续远离共和党；那么选举很可能继续向民主党倾斜。

这种情况下，最可能出现的并不是所谓"民主党横扫美国"，而是：

民主党拿回众议院，共和党在参议院苦苦防守。

因为现在共和党内部已经开始把更多资源用于守住原本比较安全的席位，而不是继续向传统民主党阵地进攻。这意味着共和党内部实际上已经开始承认：部分原本可以争取的战场正在变得困难。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到投票日，众议院翻蓝的可能性会进一步提高。

二、第二种可能：突然出现"蓝色浪潮"

所谓蓝色浪潮，并不一定意味着民主党在全国获得压倒性支持。

更可能的情况是：共和党内部出现"弃保"。

一些共和党选民可能仍然不喜欢民主党，但他们对特朗普、经济、战争或者共和党国会候选人的表现已经不满意。于是出现：

"我不一定支持民主党，但这次我要投票改变华盛顿。"

目前已经出现一些迹象：部分2024年投票给特朗普的人，对共和党的忠诚度正在下降。如果最后三周这种情绪扩大，就可能形成一个非常典型的："反总统型中期选举"。

这时候民主党甚至可能获得比目前预测更大的众议院优势。

三、第三种可能：特朗普突然重新掌握政治议程

这是我认为不能低估的情况。特朗普最大的政治优势一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策细节"，而是：他非常擅长改变政治议题。

如果共和党发现经济和物价对自己不利，那么特朗普很可能会尝试把选举重新定义成：移民问题、犯罪问题、国家安全、文化战争、社会主义、边境安全、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就是说：把选举从"你生活得怎么样？"重新变成："你希望美国变成什么样？"

这可能会让共和党重新激活自己的核心选民。

而且共和党目前仍然拥有大量竞选资金，可以在最后阶段集中攻击民主党候选人。Reuters也指出，共和党目前在资金和广告投入方面仍然具有优势。所以：

特朗普并没有失去制造选举转折的能力。

四、第四种可能：真正的"黑天鹅"——伊朗局势突然升级

这是我个人认为最值得关注的变量之一。目前伊朗战争已经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一部分。如果未来突然出现：

情况A：美国取得重大军事成果

例如：伊朗主要军事设施遭到严重打击；伊朗政府接受停火；美国宣布军事行动取得重大目标；美国成功推动新的中东协议。那么特朗普可能出现一次短期政治反弹。因为选民有时候会在国际危机中出现所谓的：

"团结在总统周围"效应。共和党可能因此止跌。

但是还有完全相反的情况。

情况B：战争突然扩大

例如：美国军人出现重大伤亡；伊朗扩大报复；霍尔木兹海峡受到严重影响；石油价格继续大涨；美国被迫扩大军事行动。

那么情况可能完全反转。因为这会直接进入美国普通家庭的生活：

汽油涨价→运输成本上涨→食品涨价→通胀重新成为核心问题。

现在美国选民本来就已经对生活成本高度敏感，而近期调查显示，汽油和食品价格已经成为影响选民情绪的重要因素。

因此：伊朗战争可能成为特朗普的政治救命稻草，也可能成为共和党的政治炸弹。

关键不在"有没有战争"，而在于：战争在选民眼里到底意味着"胜利"，还是"失控"。

五、第五种可能：经济突然给特朗普一个"惊喜"

这可能是目前最容易被忽略的反转。

假如未来两三周出现：油价明显回落；通胀数据改善；股市持续上涨；就业数据好于预期；消费者信心改善；那么特朗普完全可以把选举重新包装成：

"媒体说美国经济崩溃，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对于共和党非常重要。因为经济是中期选举最大的主题。如果经济开始改善，民主党目前最重要的攻击点就会减弱。所以未来三周最值得观察的，不是某一份民调，而是油价、就业、通胀和消费者情绪有没有突然发生变化。

六、第六种可能：民主党自己"犯错"

这是民主党最大的内部风险。目前民主党最大的优势是：共和党政府不受欢迎。但问题是："反特朗普"并不等于"喜欢民主党"。

如果民主党候选人在最后阶段：过度向左转；强调一些社会文化议题；出现激进言论；被共和党成功贴上"社会主义"标签；或者出现严重候选人丑闻；那么部分独立选民可能重新考虑。

共和党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使用"社会主义""激进左派"等标签攻击民主党候选人。Reuters认为，这种攻击虽然未必能改变整个选举，但在极其接近的选区可能产生边际影响。

所以民主党现在最大的错误可能不是：不够激进。



而是："把一场对特朗普的不满，变成了一场对民主党的投票。"这两者完全不同。

七、第七种可能：民调再次出现系统性错误

这是最典型的"黑天鹅"。

美国选举已经多次证明：民调不是结果。

现在各种民调数量非常多，调查方法也高度不统一。近期报道指出，2026年选举前已经出现大量不同机构、不同抽样方法的调查，甚至一些民调的抽样来源并不完全透明。

因此完全可能出现：民主党一直领先。媒体形成"蓝色浪潮"共识。最终共和党实际表现明显好于民调。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一定赢。更可能的情况是：民主党原本预计拿下15～20个席位，最后只拿下5～10个。于是媒体会把它称为："共和党意外保住多数。"

这就是典型的民调黑天鹅。

八、第八种可能：年轻选民"嘴上支持，实际上不投票"

这是民主党最大的结构性风险之一。民主党现在的选民热情比较高。但是中期选举和总统选举不同。

年轻人、部分少数族裔选民通常在总统选举中的参与度更高，而中期选举容易出现："我支持你，但是我懒得去投票。"

如果民主党年轻选民实际投票率低于预期，而50岁以上选民投票率很高，那么民调优势可能迅速缩水。Reuters近期分析也把这个问题列为民主党可能无法形成"大胜"的重要原因。

所以最后三周真正应该问的是："年轻人到底会不会去投票？"

九、第九种可能：共和党出现"地方性逆袭"

我认为这种情况非常现实。美国不是一个全国统一的选举市场。可能出现：全国民调民主党领先。

但是：Texas共和党保住；Ohio共和党保住；Iowa共和党保住；Alaska共和党保住；Maine出现意外；Michigan民主党优势缩水。

结果就是：

民主党赢了全国舆论，却没有拿到足够的参议院席位。

这也是为什么：众议院和参议院必须分开看。

民主党可能赢得众议院，但共和党仍然保住参议院。

这是我认为非常值得警惕的"中间结果"。

十、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黑天鹅：特朗普主动把选举变成"对自己的公投"

特朗普最大的特点就是：很难退到幕后！

如果最后两周特朗普把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发挥到极

致，那么这场选举可能进一步变成："支持特朗普还是反对特朗普？"而不是："你支持本选区的共和党候选人还是民主党候选人？"

这对共和党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特朗普状态好：可以带动低投票率的共和党选民。

如果特朗普状态不好：共和党候选人会被迫一起承担总统的负面情绪。

目前Pew的调查已经显示，特朗普比过去几次中期选举中的总统更加成为国会选举的核心变量。

十一、我最关注的，其实是"最后72小时"

如果让我预测，我不会太关注10月中旬的民调。

我会重点看：10月30日—11月3日。

因为美国政治经常存在一个现象：大量选民实际上是在最后几天才真正决定。

如果这个阶段突然发生：大规模国际事件；恐袭；重大经济消息；总统重大讲话；候选人丑闻；油价突然暴涨；股市剧烈下跌；重大司法裁决；大规模抗议；重大军事行动；

那么整个选举叙事可能在72小时内改变。

十二、所以我把2026中期选举分成三个主要剧本

剧本一：温和蓝色浪潮

最简单的路径：经济不改善+特朗普继续成为负面议题+民主党投票率较高。

结果：民主党拿回众议院，参议院形成激烈争夺。

这是目前最值得认真考虑的基本情景。

剧本二：蓝色浪潮扩大

条件：经济继续恶化+伊朗战争拖长+特朗普继续失去独立选民+共和党出现内部疲劳。

结果可能是：民主党不仅拿回众议院，而且取得比较明显的多数；参议院也可能翻蓝。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特朗普浪潮"。

剧本三：共和党最后逆袭

条件：油价下降+伊朗局势缓和+特朗普重新控制政治议题+共和党成功激活基本盘+民调低估共和党。

结果：民主党可能赢得众议院，但赢得没有预期那么多；共和党保住参议院。

如果这个结果发生，媒体很可能会把它描述为："特朗普逃过中期选举惩罚。"

十三、真正的"黑天鹅"，我认为有三个

如果让我现在只挑三个：

黑天鹅一：伊朗战争突然升级

这是最危险的外部变量。它可以同时影响：特朗普支持率+油价+通胀+国家安全+美国外交政策。

黑天鹅二：民调再次严重低估共和党

这是最危险的统计变量。

如果发生，民主党可能看起来已经赢了，最后却只取得非常有限的席位增长。

黑天鹅三：经济突然反弹

这是最危险的政治变量。

如果油价下降、通胀下降、股市上涨、就业改善，特朗普可能在最后两周突然重新获得一个非常有力的政治故事："经济正在好转，不要让民主党夺走国会。"

最后，我的判断现在不要简单预测："民主党一定赢。"

我更倾向于这样判断：共和党目前处于守势，特朗普本人已经成为共和党最大的资产，同时也是最大的负担。

如果未来三周没有重大变化，民主党更有可能拿回众议院。

但参议院完全不同，地理结构决定了民主党即使在全国范围获得明显优势，也未必能够顺利拿到足够席位。

而真正决定最后结果的，很可能不是今天的民调，而是未来三周发生什么事情。尤其是：伊朗战争→油价→通胀→经济情绪→特朗普支持率→独立选民→最后投票率。

这实际上是一条完整的因果链。所以2026年的中期选举，我认为最大的看点不是：

"特朗普还能不能赢？"

而是："特朗普能不能在11月3日之前，成功让美国选民忘掉生活成本问题，把这场选举重新变成一场关于移民、国家安全、文化战争和美国未来方向的公投？"

如果他做到了，共和党仍然有可能上演最后逆袭。

如果做不到，那么目前形成的政治逆风很可能会持续到投票日。

美国政治现在已经高度极化，黑天鹅不一定改变10个百分点，但完全可能改变两三百分点；而在几个关键州，两三个百分点就足以决定整个国会由谁控制。这是一场看似正在形成的"蓝色浪潮"，但结果远未完全锁定的选举！

编辑：胡丽莉　校对：王滨　美编：胡海宁

《七十感懷》

作者：廖雙元

人生七十古來稀，衝鋒陷陣勿太急。

廉頗八十欲征戰，文龍十八建功勳。

亙古聖賢眼前過，今度小人胸中鄙。

來生不忘恩人助，萬世美名留史記！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美编：胡海宁

天怒人怨，清算在即！全球正义力量联合宣言

—— 强烈抗议独裁者习近平危害自由民主世界，人神共愤，天灭中共！

作者：刘乐园

当今世界正处于光明与黑暗决战的关键历史节点。在亿万中国同胞饱受奴役、神州大地民怨沸腾之际，中共窃国贼、极权独裁者习近平竟然企图访问美国。这是对人类文明底线的公然践踏，是对自由民主世界的极大挑衅，更是对所有死于中共暴政奴役之下冤魂的肆意侮辱！

为此，我们向全球所有珍视自由、民主、人权与正义的华人同胞及国际正义力量，发出最震撼、最紧迫的铁血呼吁：立刻行动起来，挺身而出！我们要用撕裂黑夜的雷霆之吼，彻底粉碎中共的专制谎言，用坚不可摧的抗争洪流，将这个作恶百年的流氓政权彻底埋葬！

一、独裁倒行逆施，神州大地沦为现代人间地狱

自习近平篡权、强化个人独裁以来，中共全面复辟了历史上最恶劣的极权统治。它们打着"复兴"的虚假幌子，疯狂开历史倒车。在全国范围内，中共残酷关押、迫害无数异见人士、维权律师及良心犯；它们动用庞大的国家机器，对法轮功学员、基督教徒及广大宗教信仰者进行灭绝人性的迫害，甚至犯下活摘器官这等地球上从未见过的星球级罪行；它们在新疆、西藏、香港实行法西斯式的铁腕镇压，将昔日的东方之珠变成特务横行的恐怖牢笼。

在经济上，中共大搞"国进民退"，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导致百业凋零、民不聊生，青年人失业绝望，无数家庭支离破碎。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中共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无孔不入的监控摄像头，筑起了一座禁锢14亿人的数字铁幕。在中国大陆，人民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信仰的权利，甚至连生存的尊严都被践踏至尽。这个邪恶的政权，正在把中华民族推入万劫不复的黑暗深渊！

二、恶魔黑手外伸，战狼渗透危害全球自由世界

中共的罪恶绝不仅限于中国大陆。这个邪恶轴心正撕下伪装，将其独裁触角疯狂延伸到海外。它们通过"一带一路"实施经济胁迫，用债务陷阱绑架发展中国家；它们在自由世界设立秘密警察站，跨国恐吓、跟踪、暗杀异见人士；它们利用各种伪装机构以及被收买的西方政商精英，进行无孔不入的政治渗透与间谍活动。

更令人发指的是，中共利用虚假宣传和认知战，日夜颠倒黑白，疯狂毒害国际舆论。它们在国际上拉帮结派，暗中扶持恐怖主义与侵略政权，试图彻底颠覆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中共是动荡的根源、灾难的温床。如果国际社会继续对这个恶魔保持沉默、姑息养奸，那么今日中国之悲剧，必将成为明日世界之浩劫！

三、中共不等于中国，全球退党抗暴洪流势不可挡

我们必须向全世界大声疾呼：中共绝不等于中国，中共政权更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中共是一个寄生在中华民族身上的马列恶魔，是一个靠谎言与暴力维持统治的非法黑帮流氓集团。中国人民绝不是暴政的同谋，而是暴政最深重的受害者。十四万万神州同胞同样渴望尊严、渴望法治、渴望人权与光明！

近年来，从"白纸运动"到民间连绵不断的抗暴怒吼，都在证明：民心已死，中共气数已尽！多行不义必自毙，天网恢恢疏不漏，历史的审判台已经为这个恶贯满盈的政权设好。面对独裁者的无耻访问，我们没有任何退路，唯有迎头痛击！

在此，我们发出最严厉的控诉与宣战：

彻底粉碎习近平的个人独裁与法西斯极权统治！

坚决斩断中共专制暴政危害人类文明与国际秩序的黑手！

强烈谴责并清算中共对人权、信仰、言论及新闻自由的血腥迫害！

彻底扒光中共谎言外衣，全面揭露其欺骗、控制和迫害人民的邪恶本质！

誓死声援所有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苦难同胞、维权人士与正义群体！

喝令国际社会彻底觉醒，绝不与恶魔做交易，绝不对中共暴政保持沉默！

同胞们，正义的朋友们！黑暗再长也挡不住黎明的曙光。让我们万众一心，凝聚起排山倒海的正义力量，形成摧枯拉朽的抗暴洪流！暴政必亡，自由必胜！天灭中共，就在眼前！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夏威夷支部完成换届选举

—— 以民主实践推动中国宪政转型

作者：缪青



中国民主党夏威夷支部换届选举现场

【旧金山讯】2026年10月15日，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夏威夷支部日前举行换届选举，张小驹当选新一届支部主任，王礼华当选副主任。本次选举共有16名党员参加，其中8人现场投票、8人通过远程方式投票。选举采取自主报名、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由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地委选举委员会主任杨皓担任监票人。

此次换届不仅是支部负责人的正常交接，也是在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持续探索组织建设、民主实践与政治理念传播的背景下，一次具有现实意义的组织更新。

一、民主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从支部换届看海外民主实践

因家庭原因，原支部主任孟家虎在会上正式提出辞职。与会党员对其任职期间在凝聚党员、组织活动及维持支部日常运作等方面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并祝愿其家庭顺利。

在听取辞职说明后，支部按照相关章程开展负责人选举。经过自主报名、党员投票和监票计票等程序，张小驹当选支部主任，王礼华当选副主任。

从候选人产生到无记名投票，从监票到计票，这些看似日常的组织程序，却体现着民主政治的一项基本原则：权力应当通过规则产生，并受到程序约束；组织负责人应当接受成员的选择，而不是依靠个人意志决定职位归属。

对于长期以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宪政民主为政治目标的中国民主党而言，民主不仅是未来中国应当建立的制度，也是海外民主人士在现实组织生活中需要不断实践的原则。

选举结束后，张小驹表示，感谢全体党员的信任与支持。他将认真履行职责，推动支部在组织建设、党员联络、民主理念宣传以及公共活动等方面进一步发展，并继续加强与海内外民主人士的交流。

新一届负责人也表示，将加强内部沟通与团结，按照支部章程和相关制度开展工作，使组织运作更加规范、透明，并增强支部的凝聚力与行动能力。

二、从香港走向中国民主议题：一段个人思想启蒙的历程

换届选举结束后，《在野党》记者缪青对新当选的夏威夷支部主任张小驹进行了视频专访。谈及自己为何走上关注中国民主问题的道路，张小驹将个人思想发生重要变化的起点，追溯到2010年至2013年在香港求学的经历。

张小驹回忆，在香港期间，他通过互联网以及香港有关"六四"历史的公共纪念和教育渠道，逐渐了解到1989年"六四"事件的更多信息。这段经历使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过去对中国历史和政治现实的认识，也成为他思考民主、自由与人权问题的重要起点。

他说，在中国大陆，信息来源和公共讨论空间存在诸多限制；到了香港，他才有机会通过不同渠道接触中国近现代历史，并开始思考个人自由、公民权利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

此后，香港社会的发展始终牵动着他的关注。从2014年的雨伞运动，到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他持续观察香港社会对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的诉求，并通过捐款等方式支持香港的公民社会组织和民主团体，包括香港支联会、香港众志。

在张小驹看来，香港问题并非孤立存在。香港的政治前途、中国大陆的民主转型以及台湾的安全与发展，都与整个大中华地区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

他特别提到，流亡海外的香港社运人士罗冠聪等人提出的"香港约章"倡议，也促使他进一步思考香港民主运动与中国民主转型之间的联系。

张小驹认为，只有推动中国政治制度实现根本性转型，结束一党长期垄断政治权力的格局，建立具有宪政保障的民主制度，人民的基本权利才可能获得更加可靠的制度保障，香港的自由、民主与法治才有机会得到真正恢复和维护。

他同时指出，这条道路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思想启蒙、理性交流和社会参与，也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努力。

三、民主不仅是选举，更是对权力的约束

谈到自己对中国民主的理解，张小驹表示，随着学习、观察和参与的不断深入，他对民主的认识也在逐步发展。

“最初接触民主、人权这些议题的时候，我更多是从个人对自由、反对独裁专制的朴素追求出发。随着这些年不断学习、观察和参与，我越来越认识到，民主并不只是一次选举，也不仅仅是政权更替，而是一整套制度建设和社会共识。”

他认为，宪政、法治、权力制衡、公民权利以及对不同意见的包容，都是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仅仅更换执政者，而没有建立约束权力的制度，并不能保证一个社会真正实现民主。

张小驹以台湾的民主发展为例，认为台湾已经形成的民主选举和宪政实践，为华人社会提供了重要的观察与研究案例。台湾的经验表明，华人社会同样能够通过制度建设、选举竞争和公共参与，探索符合自身社会条件的民主治理道路。

他强调，中国民主转型不仅关系到中国大陆人民的政治权利，也关系到香港、台湾以及整个大中华地区的长远发展。真正持久的台海和平，应当建立在尊重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民自主选择的基础之上。

对于海外民主人士的责任，张小驹提出了三个重点：第一，坚持记录和表达，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向外界传递中国社会的真实声音；第二，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减少不必要的内耗；第三，持续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政治现实，传播宪政、法治和公民社会理念。

在他看来，海外民运的价值不仅在于眼前能够组织多少活动，更在于能否长期保存独立思考的空间，持续积累民主转型所需要的思想资源、社会联系和公共意识。

他表示，无论未来中国政治形势如何变化，海外民主人士都应当坚持自由、人权、宪政与民主的基本信念，同时保持理性、开放和包容，为中国未来实现和平、自由的政治转型做好长期准备。

记者视频采访民主党夏威夷支部主任张小驹

四、上任后的三项重点：团结组织、培养民主素养、走进华人社区

加强支部内部团结与沟通

对于当选后的工作安排，张小驹表示，这既是党员给予的信任，也意味着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他将把加强支部内部团结与沟通作为首要任务，并计划定期举办支部辩论会。

培养民主素养

张小驹认为，一个民主组织不能只在外部批评专制，也应当在内部形成尊重规则、容纳异议和依照制度办事的习惯。只有组织内部具备相应的民主素养，才能更有说服力地向社会介绍民主制度的价值。

加强支部与夏威夷华人社区的联系

夏威夷拥有多元的族群构成和华人社区。张小驹希望通过讲座、座谈、文化交流等适当方式，让更多华人了解民主、宪政、人权和法治理念，并鼓励华人积极参与当地社会公共事务。

他同时提出，海外华人社区应当警惕跨国政治影响以及不当干预。华人社团、商会和文化组织本应服务社区、联络乡情、促进交流，不应成为任何政治力量操纵海外华人社会的工具。

他希望，夏威夷支部今后能够进一步走进华人社区，通过持续、公开和理性的交流，让更多人理解美国民主社会所强调的公民权利、法治原则与公共参与，并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五、从组织建设出发，为中国民主转型积累力量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夏威夷支部此次换届，为支部下一阶段的工作开启了新的起点。

对张小驹而言，当选支部主任不仅意味着承担组织事务，也意味着需要把个人对自由与民主的追求，转化为持续的公共行动。他所提出的支部内部辩论、民主素养培养以及华人社区交流等计划，体现了他对海外民主运动的一种理解：民主理念既需要公开表达，也需要通过具体制度和日常实践加以落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次支部换届的价值，不仅在于选出了新的负责人，更在于能否以公开、公平的程序为基础，建立稳定的组织机制，形成持续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仍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对于身处海外的中国民主人士而言，坚持表达、记录历史、传播理念、建设组织，并在实践中尊重民主规则，都是这一长期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夏威夷支部此次完成换届，能否进一步转化为组织活力与社区影响力，仍有待今后的实际工作检验。但对一个以民主为目标的政治组织来说，真正重要的，始终是能否把民主从政治口号转化为日常实践，并在长期坚持中为中国的自由与宪政未来积累力量。

在野党记者缪青撰稿10/12/26

编辑：周志刚　校对：王滨　美编：胡海宁

回不去的故乡，过不去的江

作者：刘乐园

人在年轻时，总以为故乡是随时可以回去的坐标。年轻人总觉得远方才有风景，故乡只是累了时可以歇脚的客栈。直到有一天真的走远了，才惊觉有些路一旦跨出，便是一条通往断头台的单行道，再难回头。

古人云：“游子空着行囊，却不敢回到家乡。”

刚出国时，人人心中激荡着豪情。可真正漂泊异乡才明白，自由的代价是精神上的茕茕孑立。然而，更深沉的阻碍并非物质的丰俭，而是内心的恐惧。有时候，不是不想过江，而是不知道过江以后，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去面对江东父老。

作为一个在中国大陆生活了三十多年、亲身体验过那个体制如何冷酷运作的人，来到海外自由的土地，我拿起了笔，撰写一篇篇撕裂谎言、清算极权暴政的时评文章。当我的思想与民主发声紧紧绑在一起之后，“回家”这两个字，就不再只是买一张机票那么简单。海关可过，但心里的那条“乌江”却未必容易渡过去。因为江的对面，不是张开双臂的母亲，而是严阵以待的鹰犬和冰冷的镣铐。

我常常想起大作家老舍。当年他听信统战谎言满怀希望地回国，最后却在漫天的迫害与凌辱中，绝望地沉入了太平湖。如今在网络上，像他那样应邀回国最终被迫害致死的知识分子，被悲凉地戏称为“投湖派”。过去读历史，总觉得那是遥远的时代悲剧。可我怎么也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这样远隔大洋的平凡“小人物”，竟然也会收到相似的、邀请“投湖派”入瓮的阴谋剧本。

前些日子，我接到了老家朋友打来的电话。朋友说，家乡修高速公路把我家的地给占了，要赔偿一百多万。在巨额的赔偿款背后，还隐隐透着老家各方催促、施压，一定要我“亲自回去签字领钱”的急迫。

挂断电话的那一刻，我脊梁骨发凉。在这个跨国长臂管辖的恐怖时代，那笔遥不可及的百万赔偿款，究竟是家乡迟到的眷顾，还是克格勃式诱捕海外发声者的诱饵？我不敢赌，更不能赌！因为在我的身侧，早已倒下了太多血淋淋的前车之鉴。

在美国留学的青年罗黛青，只因在海外发了几条讽刺独裁者的推文，暑假回武汉便被以“寻衅滋事”判刑入狱；在法国留学的姑娘张雅笛，只因在巴黎担任过挺藏平台编辑，回国探亲便被冠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扔进长沙看守所秘密监禁；还有那名在悉尼大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只因在澳洲参加了声援国内的民主集会，回国后竟被重判六年；即便是曾经在纽约坐拥十万粉丝的自媒体同行“周周侃”周强，在踏回国门的那一刻，等待他的也是长达数年的黑牢。

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恶俗维基案中的牛腾宇。那个二十出头的计算机天才，仅仅因为海外网站曝光了权贵家族的隐私，就在刚从日本回国六天后遭到跨省绑架。在暗无天日的黑牢里，他遭受了老虎凳、吊打、打火机烧私处等惨无人道的酷刑，最终被重判十四年！这根本不是法律，这是最下作、最残暴的政治报复与肉体消灭！

这些血淋淋的悲剧，不是历史，而是切切实实发生在此时此刻！极权高悬的铁拳时刻在向海外每一个清醒的灵魂咆哮：那扇海关的大门一旦重新踏入，代价就是你自由的终结，甚至是生命的消亡！

人其实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现实中正在被强权任意揉捏、充满告密与诱饵的恐怖故乡；另一个是记忆里永远定格、文化依然纯粹的故乡。现实的故乡形同阳谋地狱，而记忆的故乡却永远回不去了。往前看是冷酷的异乡，往后看已是血泪交织、无法靠近的昨天。

我不知道未来的中国何时才能洗净百年暴政的血腥。但我依然希望，有一天所有漂泊海外的中国人，无论持有什么样的政治观点，都可以坦然、体面、有尊严地回到自己的故乡。不用在临行前慌忙删除文章，不用隐瞒发过的声音。不必在踏上故土前，战战兢兢地问自己一句：“我回去会不会有事？”

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不该害怕普通人的独立声音；一个值得怀念的故乡，更不该要求游子必须闭嘴、下跪，才能回家。愿有朝一日，归乡的游子不再带着对黑牢、酷刑与人间蒸发的恐惧。世上最让人牵挂的，从来不是未抵达的远方，而是那个深埋在记忆里、终将重获自由与尊严的故乡。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美编：胡海宁



致：中共党魁习近平先生公开信

作者：缪青

习近平先生：

值你即将访问美国之际，我们身在旧金山的中国民主人士，郑重向你以及中共当局提出我们的五项民主诉求。

一、结束一党专政！

中国人民应当有权利拥有和决定国家政治制度以及国家领导人的权利，结束中国共产党一党长期垄断国家权力的局面。

二、实行宪政民主！

顺应世界民主潮流，建立以民主宪政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实行自由选举、权力制衡、司法独立和军队国家化的现代民主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新闻、出版、信仰和结社自由。

三、释放政治囚犯！

立即释放全部因和平表达政治观点、追求民主自由、维护人权而遭受关押和迫害的政治犯与良心犯。

四、停止跨国镇压！

停止对海外中国民主人士、异议人士及其家属进行威胁、骚扰、监控和打压，尊重海外华人的基本权利与人身安全。

五、停止极权扩张！

停止将政治压制和威权理念向境外扩张，尊重国际社会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普世制度、民主理念和价值。

我们相信，一个国家是否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与尊重，不在于国家权力的集中，而在于人民是否拥有自由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我们呼吁中共当局顺应时代潮流，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倾听和回应人民诉求。

旧金山民主人士（实名）
2026 年 9 月 19 日 17 时（美西时间）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美编：胡海宁

万里赴华府：抗议习近平访美纪实

作者：唐鑫



一、横跨全美：跨越三千英里的万里长征

2026 年 9 月 20 日上午，行动团队一行 5 人驾驶私家车从洛杉矶出发，于当晚顺利抵达拉斯维加斯；21 日下午，团队在拉斯维加斯扩充至一行 7 人，并换乘了一辆空间更为宽敞、顶部加装行李架的银灰色本田 Odyssey（Honda Odyssey）厢型车，正式踏上了横跨美国大陆前往华盛顿特区的征程。

从西海岸的阳光到中西部的平原，团队横跨无数州界。在堪萨斯州的历史标记牌（Kansas Historical Marker）前、在深夜无人的公路加油站旁、在途径的休息站里，队员们身着印有 "END CCP" 与 " 废除中共一党专制，建立保障人权的宪政共和新中国 " 等标语的白色宣传衫，留下了一幕幕坚毅的身影。这段经历不仅是体力与意志力的极限考验，更是将抗争声浪从地方推向全国的公路拉力宣示。

经过连续数十个小时的高速驾驶与轮流交替，一行人于 23 日下午顺利到达华盛顿 DC。

二、华府夜幕与白宫前喊话：抗击 " 跨国镇压 " 与声浪穿透白宫

23 日下午，习近平专机抵达华盛顿。到达华府当晚，团队未作任何休整，便直接赶赴习近平入住的宾馆附近展开夜间抗议。在华府夜色中，队员们高举 " 共产党下台 "、" 习近平滚出去 " 等标语，拉起 " 结束中共 ,END CCP!" 与 " 中国民主人权联盟（CDHRA）" 等巨大蓝色横幅，拉开了全天候抗争的序幕。

24 日习近平在白宫与美方进行国事会谈期间，白宫外围的抗议声势达到顶峰。抗议者们围绕宾夕法尼亚大道阵势全开，"Xi Jinping has got to go!" 与 "Shame on Xi Jinping!" 的现场呐喊声响彻云霄。据美联社（AP）、VOA 及 RFA 等现场媒体报道，震撼的高分贝抗议声浪已直接穿透墙体，传入白宫内部及会谈区域（within earshot of White House visit）。

综合各大国际媒体与现场组织的报道，本次抗议呈现出五大极为显著的核心诉求与特色：

严正抗击 "7-1 恶法 " 与中共跨国镇压（重中之重）：抗议现场将揭露与抵制中共 " 跨国镇压（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列为最核心的焦点。抗议群众猛烈声讨中共于今年 7 月 1 日施行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指出该法第 63 条公然主张域外适用，企图将中共的威胁与管控延伸至全球，是全世界首部将 " 跨国镇压法制化 " 的恶法。美联社与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特别记录，现场亲共欢迎阵营试图使用大型黑伞遮挡标语，甚至有背景不明人员近距离跟拍威胁抗议者及其墙内亲友。抗议团体对此强烈谴责，并呼吁美国政府与国际社会严厉打击中共在美的黑手与渗透势力。抗议成员秉持和平理性原则，在警察协助维护秩序下捍卫了公开表达的权利。

宏观体制转型与反对同化政策：现场高呼 " 结束中共一党专政 "、" 废除中共专制，建立保障人权的宪政共和新中国 "，将诉求从单纯反对领导人个人提升至推动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高度。针对 "7-1 恶法 " 将文化消灭与同化政策法律化的企图，抗议群众要求立即废除恶法。

人权保障、停止活摘与释放良心犯：现场许多抗





议者举起高智晟、王炳章、许志永、黎智英等良心犯与政治犯的照片，高呼 "Human Rights in China!" 与 "FREE JIMMY LAI"，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失踪及遭受迫害的人士；同时，法轮功学员与人权团体高喊 " 停止活摘器官！（Stop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及 " 停止宗教迫害 "，严正揭露中共暴行。

少数族群与台港自由：西藏社群高举雪山狮子旗高喊 " 自由西藏（Free Tibet!）"，强烈抗议 7-1 恶法对藏人文化与寄宿学校的同化迫害；维吾尔社群手持东突厥斯坦旗帜揭露种族灭绝；香港团体高呼 "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FREE HONG KONG!）"，台湾团体共同发声并在媒体发表 " 正告习近平：民主台湾，不容武力颠覆 " 等整版声明，展现跨族群抵抗暴政的强烈团结。

行为艺术与符号冲击：抗议者穿上清代龙袍讽刺独裁称帝、套上小熊维尼偶服，以充满政治幽默与符号化的行为艺术，成为美联社等西方主流媒体镜头捕捉与聚焦的重点。

三、跨世代抗争者大会师：民运前辈的声音与历史性交汇

在华府街头这场震撼全美的前沿抗争中，来自各个领域、跨越世代的海外抗争力量完成了近年极具历史意义的大会师，多位民运前辈也在现场与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掷地有声的发言：

著名民运领袖、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亲临现场发表演讲，并联合多位学者专家主持 " 中国国是会议 "。魏京生在发表题为《始于去习，重在新生》的演讲中特别指出：" 即使习近平真的下台，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问题就此结束，中共一党专政体制并不会自动终结。我们海外民运要做好准备，把抗议目标从 ' 反对个人 ' 推进到 ' 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制度 ' 的战略高度，为将来走向自由民主添砖加瓦。"

八九学运领袖、中国议会总召集人王丹在赴华府前发表《致习近平公开信》，并亲赴白宫前喊到嗓子哑掉。王丹在现场发言中动情地表示：" 我们来到华盛顿，就是要让习近平听到他在中国听不到的声音，告诉全世界，中共不代表中国，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我们团结在一起反对独裁专制，更不能忘记那些为了追求民主自由而被关押在狱中的勇敢者。"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带领民主党各地骨干在白宫及宾馆周边化整为零、多点布防，与群众一道维持高分贝喊话；著名雕塑家陈维明率自由雕塑公园义工团队远道而来，他在现场强调：" 海外中国人不能因为身处自由社会就忘记墙内遭受迫害的人，公开抗议就是在挑战那个依靠恐惧和政治镇压维持的制度。"

与此同时，中国民主人权联盟（CDHRA）与民主阵线的金秀红、魏碧洲等负责人，带领来自西海岸（洛杉矶、西雅图）及东海岸各地成员拉起大型横幅，将万里长征的宣示与现场呐喊紧密串联。著名维吾尔人权活动家热比娅·卡德尔（Rebiya Kadeer）率领维吾尔社群亲临现场，手持东突厥斯坦旗帜揭露人权迫害，并与现场民运成员合影交流；流亡藏人代表则高举雪山狮子旗加入白宫外游行队伍，推动 " 自由西藏（FreeTibet）" 诉求。

这场盛会吸引了广泛的媒体与政治关注。现场除了知名自媒体人、《新闻拍案惊奇》主持人兼记者大宇在第一线穿梭采访外，美联社（AP）、美国之音（VOA）、自由亚洲电台（RFA）、大纪元等各大国际主流媒体的多路记者均在现场进行深度采访与镜头记录。美国国会众议员吉姆·麦克高文（Jim McGovern）等政要也亲临现场演讲声援，与抗议民众深入交流。

四、国会对话与政策沟通：从街头呐喊到体制串联





抗议行动的影响力不仅停留在白宫与宾馆外围的街头。活动期间，团队成员更深入国会办公大楼会议室，与美国国会议员、政要顾问以及人权倡议人士进行了密集的座谈交流。这种“街头抗议”与“国会沟通”双轨并进的模式，成功将对习近平访美、中共“7-1 恶法”以及中共在美实施“跨国镇压”的强烈民间抗议，转化为美国国会政策与立法层面的重点关注。

结语：行动铸就未来

9 月 25 日，团队踏上返程，并于 27 日上午顺利回到洛杉矶，为这趟跨越全美的抗议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点。

这趟万里远征证明了：当对自由的信念足够坚定，距离与疲惫都无法阻止发声。从东西海岸的公路奔袭，到白宫街头传入墙内的呐喊，再到国会大楼内的深度对话，这群行动者与各路民运领袖用脚步与声浪，在习近平访美期间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篇章。在抗争力量日益壮大的今天，这声跨越全美的咆哮，终将凝聚成不可逆转的民主浪潮。

附录：华府抗议现场核心口号与诉求全记录

1. 声讨“7-1 恶法”与中共跨国镇压
“废除‘7-1 民族团结’跨国镇压恶法！”
“打击跨国镇压！彻底堵住中共对美渗透！”
“停止长臂管辖！停止威胁海外异议人士与墙内家属！”
“严厉打击中共在美黑手势力！”

2. 针对中共体制与政权转型
“共产党下台！滚出去！”/“Down with the CCP! Xi Jinping!”
“结束中共 ,END CCP!”
“推翻中共一党专制！”
“放弃改良幻想结束中共暴政”
“中共是最大恐怖集团”/“CCP Is the Largest and the Greatest Terror Group”
“废除中共一党专制，建立保障人权的宪政共和新中国！”
“E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ONE PARTY DICTATORSHIP RULE!”
3. 针对习近平个人与独裁统治
“习近平滚出去！”/“Out with Xi Jinping! / Xi Not Welcome!”
“习近平下台！”
“Xi Jinping has got to go!”
“Shame on Xi Jinping!”
“通缉犯习近平”/“国贼习近平”/“千古暴君习近平”
“独裁者”/“DICTATOR”
“遗臭万年”

4. 人权保障与信仰自由
“停止活摘器官！”/“Stop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停止宗教迫害！停止劳教营与洗脑班！”
“Human Rights in China!”
“释放良心犯与政治犯！”（无条件释放高智晟、王炳章、许志永等人士）
“FREE JIMMY LAI”（释放黎智英）

5. 跨社群、少数族群与区域自由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FREE HONG KONG!”
“自由西藏！中国撤出西藏！”/“FREE TIBET! China out of Tibet now!”
“保护维吾尔人权，停止种族灭绝！”
“民主台湾，不容武力颠覆！”

编辑：胡丽莉　校对：毛一炜　美编：胡海宁



不能让笔沉默

—— 独立中文笔会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之路

作者：《在野党》杂志社副主编 陆乾坤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文字从来不只是一种谋生的技艺。它可以记录一个时代的苦难，也可以揭开权力刻意掩盖的真相；可以成为思想启蒙的火种，也可以使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人突然成为政治犯。从清末报人的奔走呼号，到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从反右运动中被打倒的知识分子，到“文化大革命”中因一篇文章、一封书信而遭受迫害的普通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始终与言论自由紧紧相连。一个政权如何对待作家，往往比它在政治报告中如何描述自己，更能说明它与社会、与历史、与真相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写作有时是一件需要付出代价的事情。一个人可以因为小说中的隐喻而遭到批判，因为一篇评论而失去工作，因为记录社会现实而被传唤，甚至因为公开表达政治意见而长期失去自由。那些被禁止出版的书籍、被删除的文章、被迫关闭的网站，以及在审查压力下逐渐消失的名字，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与思想史中一条不应被忽略的暗线。独立中文笔会的诞生，正是对这种现实的回应。它所要维护的，不只是某些作家的发表机会，而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一个人能否不必先取得权力的许可，就有权说出自己的思想？

一、从波士顿开始的独立写作之路

2001 年，独立中文笔会在海内外一批中文作家的共同努力下成立。那是一个互联网刚刚开始改变中文公共生活的年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即，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新的期待，海外知识界也曾对中国社会逐渐开放抱有希望。然而，政治表达的边界并未随着经济改革而自然消失，独立写作者与官方文化体制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对于一些经历过八九民运、流亡海外或长期受到政治限制的作家而言，如何建立一个不受中国官方作家协会控制、能够直接与国际文学界沟通的组织，已经成为迫切的问题。

这项工作最初并没有什么宏大的场面。诗人贝岭与孟浪在美国波士顿开始联络散居世界各地的中文作家。按照贝岭后来对创会经过的回忆，两人一边研究国际笔会的章程，一边计算各国时差，给欧洲、美国以及中国境内的作家打电话，解释为什么需要一个独立的中文笔会。今天看来，电子邮件和跨国通讯似乎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在二十五年前，要让几十位身处不同政治环境、具有不同文学背景的作家共同接受一项组织倡议，并非容易之事。

刘宾雁、郑义、于浩成、巫宁坤、郭罗基、马建、杨炼、刘晓波、刘霞等人先后成为创会成员。最初的三十一位会员中，既有经历过共和国历次政治运动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也有在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还有流亡海外后继续坚持中文创作的人。他们的文学风格、政治经历和思想立场并不完全相同，但至少在一个问题上存在共识：中文写作不应只有官方认可的一种声音。

2001 年 11 月，独立中文笔会在伦敦举行的国际笔会第六十七届大会上获得接纳，成为国际笔会的成员中心。此后，中文独立写作者便拥有了一个可以通过国际文学组织发声的制度性渠道。2001 年底，刘宾雁经会员投票当选首任主席，郑义担任副主席，贝岭负责执行事务，孟浪承担写作自由方面的工作。2003 年，笔会举行首次网络会员大会，制定章程、选举理事会，刘晓波当选会长。2005 年，组织正式采用“独立中文笔会”这一名称，进一步将会员范围扩展到从事中文编辑、翻译、研究和出版的人士。

这些变化看似属于组织内部的事务，却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它表明笔会不愿仅仅依靠几位著名作家的声望维持，而是尝试建立一个有章程、有会员大会、有定期选举的自治团体。对于一个以维护表达自由为宗旨的组织而言，内部是否允许不同意见、负责人能否依照程序更替，本身就是对其理念的检验。





二、刘宾雁与刘晓波：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独立中文笔会的历史中，有两个名字尤其无法绕过：刘宾雁与刘晓波。

刘宾雁曾经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关注普通人的处境，试图通过文学揭示社会中的不公。1957 年，他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此后经历长期政治磨难。改革开放初期，他重新走上文坛，作品受到广泛关注，却又在 1987 年被开除党籍。1989 年之后，他滞留海外，直至 2005 年去世，未能回到中国安度晚年。

刘宾雁的一生，折射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反复经历的历史困境。他们曾经相信文学能够帮助社会纠正错误，却发现当文字触及权力的根本利益时，作家本人便可能成为被惩罚的对象。即使经历过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刘宾雁仍然坚持作家的社会责任。这也是他在晚年愿意参与创立独立中文笔会的重要背景。

与刘宾雁相比，刘晓波属于另一代知识分子。1989 年，他从美国返回北京，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并因六四事件被捕。此后，他经历监禁、劳动教养和长期政治限制，却继续写作，关注中国政治改革与公民权利。2003 年，他当选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并在 2005 年获得连任。对于笔会而言，刘晓波不仅是一位著名会员，也是一位实际参与组织建设、推动中文写作自由的人。

2008 年 12 月，刘晓波因参与《零八宪章》而被拘押。2009 年 12 月，他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2010 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却无法亲自前往奥斯陆领奖。2017 年 7 月 13 日，刘晓波在服刑期间获准保外就医后病逝，终年六十一岁。

刘晓波的经历，使独立中文笔会所面对的问题变得格外具体。当一位曾经通过会员选举产生的会长，因为公开表达政治主张而长期身陷囹圄时，所谓“写作自由”就不再是文学会议上可以轻松讨论的抽象概念。它意味着一个人能否与家人团聚，能否继续写作，能否自由发表自己的作品，甚至能否在生命最后阶段获得完整的个人自主权。

刘宾雁与刘晓波属于不同世代，他们的思想和文学道路也不尽相同，但两人的命运共同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知识分子争取独立表达的历史，从来不是某一个时代已经结束的故事。政治运动可以改变名称，审查技术可以不断更新，而作家与权力之间围绕真相、批评和个人尊严发生的冲突，却可能以新的形式不断重现。

三、当写作者成为囚徒

如果独立中文笔会只是一个聚集著名作家、举办文学研讨会的组织，它未必会在海外民运和国际人权领域占有如此特殊的位置。真正使它区别于普通文学团体的，是它长期关注那些因为写作、出版和公共表达而失去自由的人。

笔会设有狱中作家相关工作机制，持续收集遭到监禁和迫害的写作者资料，向国际笔会及其他人权机构通报个案，组织声援，并在条件允许时向受难作家及其家庭提供帮助。2006 年，笔会设立“狱中作家奖”，2010 年将其更名为“刘晓波写作勇气奖”。杨天水、张林、吕耿松、刘贤斌、秦永敏、陈树庆、胡石根、朱虞夫、伊力哈木·土赫提等人，都曾进入笔会的奖项或重点声援名单。

这些名字背后并不是一种完全相同的政治经历。有的是民主运动参与者，有的是维权人士，有的是新闻工作者，有的是研究民族、宗教或地方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他们未必属于同一个组织，也未必拥有一致的政治理念。然而，当一个人因为写作和表达而遭受惩罚时，维护其基本权利并不需要首先审查他是否与自己观点一致。

这恰恰是独立中文笔会最值得珍惜的原则之一。

2017 年的笔会年度工作通报显示，其狱中作家资料库当年收录了二百三十三位相关人士的信息，并持续更新个案状况。这个数字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当时所有在押作家的准确人数，却足以说明笔会所面对的工作规模。每一个名字都意味着一个具体的人、一段被打断的生活，以及可能长期承受压力的家庭。

在外界看来，整理名单、核对判决、翻译声明、寄送信件，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事务。然而，对那些被关押的人而言，外界是否仍然记得自己的名字，可能具有难以衡量的意义。监禁不仅剥夺人的行动自由，也可能试图切断他与公共社会的联系。当一个人的作品不能出





版，消息无法传播，亲友不敢公开谈论他的处境时，他就可能逐渐从社会记忆中消失。

独立中文笔会所做的事情，正是在这种遗忘发生之前，把名字重新写下来，把案件记录下来，把被迫沉默的人重新带回公共视野。它不能代替司法救济，也不能保证每一次声援都能改变判决，但它至少拒绝让这些人的经历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消失。

四、林昭的名字与自由写作的传统

独立中文笔会设立的另一个重要奖项，是“林昭纪念奖”。

林昭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位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她曾经是怀抱理想的青年学生，后来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政治迫害，最终于 1968 年被处决。她留下的狱中书信和文字，成为后人理解那个时代的重要见证。

以林昭的名字设立奖项，并不只是为了纪念一个悲剧人物。它更是在提醒后来的写作者：当权力试图规定什么可以被思考、什么可以被表达时，一个人坚持独立判断，可能需要承担怎样的代价。

独立中文笔会还长期设置自由写作奖，鼓励那些在压力之下仍然坚持文学创作和公共表达的人。与一般文学奖项不同，这些奖项并不完全以作品的艺术成就作为唯一标准，也关注写作者在现实环境中承担的风险与责任。文学价值与公民勇气并非同一回事，却可以在某些人的生命中相互交织。

2010 年 3 月，笔会在香港举办自由写作奖、林昭纪念奖和狱中作家奖颁奖典礼，并举行“文学与公民社会”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海外的作家和文化人士参加活动。部分获奖者因为身在监狱或受到旅行限制而无法到场，只能由他人代为领奖。这样的场景，在普通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并不常见，却几乎成为独立中文笔会历史中反复出现的画面。

颁奖者与获奖者之间，有时隔着的不仅是海洋，还有监狱的高墙。

香港曾经为这样的交流提供过重要空间。来自中国大陆的独立作家能够在这里与国际文学界接触，海外作家也能够借助香港相对开放的出版和公共讨论环境，与中国境内的同行保持联系。随着香港政治环境的变化，这种交流所依赖的空间受到明显限制，也使跨境文学合作和公开声援面临新的困难。

五、二十五年后，笔会仍在写作

一个组织的价值不能只依靠创立者的声望来证明。刘宾雁已经去世，刘晓波已经去世，孟浪也在 2018 年离世。那些曾经共同筹建笔会的人，有的逐渐年老，有的离开公共生活，有的仍然在世界不同地方继续写作。组织能够在创立者相继离去之后维持运行，才是真正漫长的考验。

独立中文笔会二十五年的历程并非没有争论和困难。跨越不同国家的会员组织，既要面对中国境内的政治压力，也要处理海外社团普遍存在的资源不足、代际差异和内部治理问题。它不应被描绘成一个没有矛盾的理想共同体。恰恰相反，如何在不同意见中维持组织程序，如何让年轻写作者参与，如何在网络传播方式迅速变化的时代保持影响力，都是它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024 年 12 月至 2025 年 1 月，独立中文笔会举行第十一届会员大会，完成新一届理事会选举，作家马建当选会长，曾建元和朱欣欣当选副会长。马建既是创会会员，也是长期在海外坚持中文文学创作的作家。他的当选，使笔会与早期独立中文文学运动之间保持了某种历史延续。

2026 年 10 月，笔会第十一届理事会再次举行会议，决定成立青年作家委员会，支持《自由写作》季刊的网络建设，并将 2025 至 2026 年度林昭纪念奖授予苏昌兰和李卉。与此同时，理事会也处理了组织内部的人事与经费事务。这些工作或许不像著名作家获奖那样容易引起外界关注，却说明笔会并未停留在对过去的纪念之中，而是在寻找继续存在和发展的方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青年作家委员会的成立。今天的中文写作者与二十五年前面对的传播环境已经截然不同。互联网曾经被寄予打破信息封锁的希望，如今数字平台又成为审查、追踪和限制传播的重要场域。年轻作者可能不再依赖传统报刊，也不一定以小说、诗歌或文



学评论作为主要表达方式。他们可能通过网络文章、纪录片、播客或其他数字媒介参与公共讨论。

在这样的变化面前，独立中文笔会需要思考的，已经不仅是怎样保护传统意义上的作家，更是怎样维护一个不断扩展的中文公共表达空间。

六、文字不能替代行动，却能留下历史

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中，政治行动与文字记录始终存在密切关系。没有文字，许多政治事件只能停留在当事人的个人记忆之中；没有独立出版和公共讨论，社会也很难对历史形成持续的反思。

从民主墙时期的民间刊物，到八九民运期间的公开声明，从《零八宪章》到近年来的网络写作，文字不断成为普通人进入公共生活的一种方式。它有时并不激烈，只是记录一次不公正的审判、一名失踪者的经历、一座城市的变化，或者一个家庭在政治压力下的遭遇。然而，当这些记录不断积累，便可能形成与官方叙述不同的历史材料。

独立中文笔会的意义，也应当放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理解。

它并不是一个以争取政权为目标的政党，也不代表某一种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它的会员可能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制度、社会发展道路和文化问题持有不同意见，但他们至少可以在维护写作自由这一原则上形成共同立场。对于中国民主运动而言，这种独立性本身就是重要的。

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不应要求作家必须成为政治运动的成员，也不应要求每一篇文学作品都承担明确的政治使命。作家有权批评政府，也有权远离政治；有权赞美一种思想，也有权质疑所有流行的思想。维护写作自由的最终目的，不是让所有作家都说出某一种正确的话，而是让每个人都有可能不受强制地说出自己的话。

这也是独立中文笔会与一般政治组织最根本的区别。

在政治高压之下，作家的独立写作可能具有抗争意义；但在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里，作家首先应该有权只是一个作家。文学不必永远充当政治的附属品，思想也不必永远接受权力的审查。

七、为未来保留自由表达的可能

二十五年，对于一个民间文学组织而言，已经是一段不短的历史。独立中文笔会从波士顿的几通国际电话开始，经历了刘宾雁的晚年、刘晓波的监禁与离世，也经历了互联网兴起、香港公共空间变化以及新一代中文写作者的出现。

在这段历史中，它未必能够改变每一位狱中作家的命运，也无法独自解决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言论审查问题。它的力量有限，资源有限，能够影响的公共空间也有限。但一个组织的价值，并不总是由它是否迅速改变了现实来决定。

有些工作之所以重要，恰恰因为现实长期没有改变，所以必须有人继续做下去。

当一位作家的名字从国内媒体消失时，有人继续记录他的经历；当一部作品无法出版时，有人尝试为它寻找读者；当一个家庭因为亲人入狱而陷入孤立时，有人通过国际网络传递消息；当年轻写作者对表达的边界感到困惑时，仍然有人告诉他们，独立思考与自由写作不是一种需要向权力请求的恩赐，而是每个人本来就应当享有的权利。

《在野党》介绍独立中文笔会，并不是因为它的会员与我们拥有完全一致的政治主张，也不是要把文学组织简单归入某一种政治阵营。恰恰相反，它所体现的，是民主社会不可缺少的另一种力量：在政党之外、在权力之外，仍然存在能够独立思考、独立写作、独立组织的公共生活。

一个社会如果只有被允许发表的意见，就谈不上真正的思想自由；一个时代如果只留下胜利者批准的历史，也很难让后人理解曾经发生过什么。

刘宾雁离开了，刘晓波离开了，孟浪也离开了。然而，他们留下的作品、经历以及参与建立的独立写作传统，仍然值得后来者阅读、保存和重新讨论。

权力可以禁止一本书的出版，却不应拥有决定一本书是否值得被记住的最终权利；可以让一个写作者暂时失去声音，却不应因此让整个社会放弃倾听。

独立中文笔会二十五年的历史所提醒我们的，也许正是这样一个朴素而沉重的道理：一个民族要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历史，就必须允许那些不被权力喜欢的文字继续存在。

因为当文字可以自由书写的时候，历史才不必永远由权力独自讲述。

而只要还有人愿意记录、愿意阅读、愿意为被迫沉默的人保留一个名字，那支曾经被试图折断的笔，就仍然没有停止书写。

官网：www.chinesepen.org
联系：office@chinesepen.org
FB：獨立中文筆會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re (ICPC)

美编：胡海宁

獨立中文筆會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党的棋子

—— 中共输出革命秘史

作者：陀先润

第七篇：沙漠里的棋局 —— 中东与拉美

1970 年，约旦军队在镇压巴勒斯坦武装的过程中，俘虏了一批特殊的囚犯。

这批人不是巴勒斯坦人，不是约旦人，也不是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公民。他们是中国人，混在法塔赫的武装队伍里，以军事顾问的身份在约旦的土地上活动。约旦国王侯赛因下令把他们单独关押，不和其他俘虏混在一起。这件事随后被压了下来，约旦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不想把它闹大，这批人悄悄被遣返，从公开记录里消失，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他们在约旦的沙漠里教阿拉伯人打仗，教的是毛泽东思想，教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教的是如何在敌后建立群众组织。这些知识从延安的窑洞里出发，经过朝鲜的山地、越南的丛林、缅甸的原始森林，最终传到了中东的沙漠里，被一批说着阿拉伯语的年轻人用来对付以色列和西方世界。

中共进入中东的时间，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晚。在中东最早活动的是苏联，从二战期间就开始通过高加索方向渗透中东各国，克格勃在这个地区经营了几十年，影响力根深蒂固。中共在五十年代初才开始认真经营中东，而且进入的路径非常隐蔽，不是通过政党关系，不是通过外交渠道，而是通过一条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秘密线索：以色列。

中以关系是中共对外关系里最难说清楚的一段历史。以色列 1948 年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建政，两个新生国家几乎同时出现在世界地图上。以色列随即通过犹太商人网络，和中共建立了秘密联系渠道。这个渠道的建立，前期通过南方局，通过中共在香港的情报体系来操作。

朝鲜战争期间，这条渠道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中国那时候一穷二白，面对西方的封锁禁运，很多战略物资根本买不到。以色列通过犹太商人网络，帮助中国获取了包括稀有金属在内的一批战略物资，其中有乌矿，是生产坦克装甲穿甲弹不可或缺的原料。以色列缺这个，中国有；中国缺的东西，以色列能搞到。这是一笔双方都需要的买卖。

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这条线变得更有价值。苏联大力支持埃及、叙利亚、约旦对抗以色列，中国和苏联撕破了脸，敌人的敌人自然就变成了朋友。从那个时候开始，中以之间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军事技术交流，中国向以色列提供了缴获的苏制武器样品，包括各种型号的火炮、坦克和飞机，让以色列可以研究苏制武器的弱点，有针对性地开发反制手段。以色列回报的，是各种领先的军事技术，从雷达到航空电子系统，门类繁多。

这条线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正式建交，然后在八九十年代进一步扩大。网上能查到的那些交易 —— 费尔康预警机、幼狮无人机、各种军事技术图纸 —— 都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角。水面以下有多少，没有人完整地知道，大概也永远不会完整地知道。

但中东对中共来说，真正的战略价值不是以色列，而是巴勒斯坦。

1964 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随后几年里，大大小小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每一个都需要钱、需要武器、需要国际支持。其中有一个组织叫法塔赫，领袖是阿拉法特。他在六十年代中期来到中国，见了毛泽东，见了周恩来，谈了很久。

中共在众多巴勒斯坦组织里选择了法塔赫，这个选择在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共少有的有眼力的一次判断。法塔赫不是一个宗教组织，不是意识形态极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团体，而是一个以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为旗帜的世俗武装，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务实的政治头脑。中共看中的，正是这种灵活性。

支持是全方位的。法塔赫的游击队员到中国接受训练，中国的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随队跟进。政治顾问教的是毛泽东思想，教的是如何建立基层组织，如何发动群众，如何把武装斗争和政治动员结合起来。军事顾问教的是游击战术，教的是如何在城市里和正规军周旋，如何利用平民区域作为掩护。

阿拉法特后来建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整体架构，包括联合各派别的统一阵线模式，包括以民族主义而非意识形态为旗帜的政治策略，都有浓厚的中共影子。这不是巧合，这是中共政治顾问手把手教出来的。

与此同时，中共在巴勒斯坦的布局并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的派系支持不同的组织。中联部系统支持法塔赫，中央文革的激进派另有一条线，支持的是一个叫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组织，这个组织下面有一个分支叫黑九

月，就是 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劫持以色列运动员、造成十一人死亡的那个恐怖组织。

和黑九月合作的，还有日本赤军。日本赤军在中东活动期间，和巴勒斯坦各武装组织有密切的合作，一起搞劫机，一起制造爆炸，共同对抗西方世界。1972 年，三名日本赤军成员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发动枪击，造成二十六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刚刚落地的波多黎各天主教朝圣者。这次袭击至今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惨烈的恐怖袭击之一。

日本赤军在中东活动的后勤保障，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重信房子在被捕之前的几年里，护照上有超过二十次进入中国的记录，在北京居住的时间将近两年。她不是在北京旅游，也不是在北京做生意。日本警视厅认为，日本赤军在中国有一个实质性的基地，负责提供庇护、经费和后勤支持。中国从来没有承认这件事，但也从来没有认真否认过。

1977 年之后，和中联部激进派有关联的那条巴勒斯坦线索突然断掉了，相关组织销声匿迹。时间节点是“四人帮”倒台，邓小平重新掌权，中共的对外政策开始全面收缩。那些在文革期间被激进派推动起来的海外布局，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陆续被切断。

这说明了一件事：中共在中东的输出革命，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战略，而是几个不同派系在争夺主导权的产物。周恩来系统支持的法塔赫，操作相对克制，注重长远效果；中央文革激进派支持的那条线，走的是极端路线，搞的是恐怖主义。两条线同时在中东运作，有时候甚至支持立场相对立的组织，造成了中国人支持的一派和中国人支持的另一派在沙漠里打来打去的荒诞局面。

这种内部混乱，是中共在所有输出革命区域里都存在的问题，只是在中东因为地缘的复杂性而表现得尤为突出。

拉美的故事相对简单，简单到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中共在拉美主要是给钱，具体的事情让古巴去做。

卡斯特罗 1959 年革命成功之后，和中国的关系不错，但和苏联的关系更好。古巴革命胜利之后，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之间出现了方向上的分歧。卡斯特罗认为革命已经成功，接下来要经营国家，建设政权，不能无休止地在全球各地点火。格瓦拉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古巴的革命成功只是开始，整个拉丁美洲都需要革命，他要去拉美的丛林里继续战斗。

格瓦拉来到中国，和周恩来系统进行了会谈。中国以政府间贸易协定的名义，给了他几千万美元，说是贸易往来，实际上是给他去拉美搞革命用的。协议里有一个条款：如果钱用完了，可以来谈债务减免。这意味着这笔钱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回来，只是用一个经济协议的外壳包装，让双方都有台阶下。卡斯特罗帮着做了账目上的处理，格瓦拉拿着这笔钱离开了。

1967 年，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丛林里被捕，随即被处决。他死的时候身上带着一本破旧的笔记本，里面记着他的战略计划和对革命的思考。这本笔记本后来成了博物馆里的展品，浪漫而悲凉。

格瓦拉死后，中共在拉美的直接投入大幅减少。剩下的工作继续通过古巴来做，中国出钱，古巴出人，分工明确，责任清晰。这种代理人模式让中共在拉美的存在感相对隐蔽，不容易被直接追溯到北京。

但有一条线是直接的，那就是对墨西哥共产党游击队的支持。这条线在中联部的档案里做得极为隐秘，几乎没有公开记录，偶尔在一些解密文件里出现只言片语，研究者很难把它完整地拼出来。它的存在本身，说明中共在拉美的布局比外界通常认为的要更深、更广。

秘鲁的“光辉道路”是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案例。“光辉道路”在 1960 年代末受到中共输出革命的直接影响，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在安第斯山区建立根据地，对抗秘鲁政府。1982 年，当中国开始和拉美国家恢复正常外交关系，不再公开支持武装革命之后，“光辉道路”拒绝放下武器，和中共切割，独立走自己的路。

然后它就活下来了。活得很难看，变成了贩毒和勒索，但它活下来了。这个结局，和本系列一直在追踪的那条规律完全吻合：越听话，死得越快；越不听话，反而越能活。

日共不听话，活到了今天，在日本议会里有一席之地。菲律宾共产党不听话，现在还在菲律宾的丛林里打游击，主要业务变成了向华人企业收保护费。“光辉道路”不听话，变成了毒枭，但还在。马共听话，老死在旅游景点里。泰共听话，从历史记录里消失。缅共听话，在内讧里四分五裂，留下一个烂摊子变成了今天的缅北乱局。

这条规律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中共输出革命的本质：中共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那些被它扶持的组织的命运，它关心的只是这些组织对自己有没有用。有用的时候，给钱给枪给顾问。没用的时候，一个电话停止援助，然后假装不认识。

习近平当副主席的时候，在巴西说过一句话：我们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贫穷。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他大概知道这是谎言，听他说话的人大概也知道这是谎言，只是大家都假装信以为真，因为这符合外交场合的礼仪。

从 1920 年代的唐人街到 1960 年代的缅北丛林，从中东的沙漠到安第斯山区的高原，中共用了半个世纪，在全球各地布下了一张巨大的网。这张网造成了多少人死亡，没有人统计过。那些死去的人，有的是信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年轻人，有的是被谎言骗去充当炮灰的红卫兵，有的是在“肃反运动”里被自己同志杀死的无辜者，有的是在恐怖袭击里遇难的平民。

他们的共同点是，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只是一颗棋子。

那只手现在还在。只是棋盘更大了，棋子的种类更多了，玩法也更复杂了。武装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大外宣、选举干预、政党渗透、经济控制。工具变了，逻辑没变。棋子还是棋子，棋手还是棋手。

第八篇：换一张脸继续 —— 新时代的旧把戏

1989 年，柏林墙倒塌的那个冬天，北京的中南海里有一批人在认真地思考一个问题：下一步怎么办。

苏联解体了，东欧的共产党政权一个接一个垮掉，全球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了历史最低谷。中共自己在那年六月刚刚经历了天安门事件，国际社会的制裁和孤立让北京喘不过气来。与此同时，经营了几十年的海外武装革命布局，也在那几年里陆续走到了尽头：马共 1989 年解散，缅共 1989 年分裂，泰共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经瓦解。

那一批人得出了一个结论：武装革命这条路走不通了，不是因为理想错了，而是因为工具过时了。要继续扩展影响力，需要换一套工具。

这套新工具在 1994 年开始成型，内部有一个代号，后来被称为大外宣工程。它的核心思路是：不再用枪，改用钱；不再扶持游击队，改为影响媒体、收买政客、渗透学术界；不再在丛林里打游击，改为在议会大厅里布局。

换句话说，棋盘没有变，棋子的种类变了。

2003 年到 2004 年，大外宣工程进入第二阶段，规模大幅扩展。中联部在这一轮重建里正式转型，从一个支持海外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机构，变成了一个系统性影响各国政党、议会和媒体的机构。与此同时，统一战线工作部的海外业务也大幅扩张，开始在全球华人华侨社区里建立更密集的网络。这两个机构分工合作，一个负责影响外国政党和政客，一个负责管控海外华人，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共对外渗透的两条主线。

德国是最早意识到这件事的西方国家之一，但即便如此，他们也花了二十年。2024 年德国宪法保卫局发出警告的时候，中联部已经在德国议会里经营了将近二十年，有议员、有顾问、有各种以学术交流和商业合作为名义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那些和中联部有关联的德国政界人士，大多数并不知道自己在和一个情报组织打交道，他们以为自己只是在参加一个正常的国际交流项目，只是在接受一笔合理的演讲费或者咨询费。

这正是新工具和旧工具最大的区别。旧工具，也就是武装革命那套，棋子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他们有明确的政治信仰，知道自己在为谁战斗，哪怕最后被抛弃，至少曾经清醒过。新工具的棋子，很多连自己是棋子都不知道。他们以为自己在做生意，在做学术，在增进国际理解，实际上已经被编进了一张他们看不见的网里。

澳大利亚是另一个典型案例。2017 年，澳大利亚媒体曝光了一系列和中共有关联的政治献金案，多名澳大利亚议员和政党接受了来自有中共背景的华人商人的巨额捐款，其中有人在接受捐款后，在涉及中国的议题上改变了立场。这件事引发了轩然大波，澳大利亚随后修改了外国干预法，把接受外国政府资金并为其利益游说定为刑事犯罪。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随之急剧恶化，贸易战打了好几年。

加拿大的情况更复杂。加拿大情报安全局在 2023 年发布报告，确认中共通过统战部网络干预了加拿大的联邦选举，支持亲北京的候选人，打压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政治人物。干预的手段包括向特定选区的华裔选民散布定向信息，组织华人社区团体为特定候选人拉票，以及通过微信群传播针对特定政客的负面内容。这些操作在技术上和五十年代美国唐人街的华人帮会组织动员选民的做法如出一辙，只是平台从街头换成了手机屏幕。

孔子学院是这套新工具里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一个。很多人把孔子学院理解为单纯的文化推广机构，或者单纯的情报搜集机构，这两种理解都不完整。孔子学院的核心功能，是在各国高校里建立一个长期存在的关系节点，通过这个节点影响学术讨论的边界，让某些话题变得敏感，让某些研究方向变得困难，同时培养一批对中国持正面态度的学者和学生，让他们成为未来各国政界、学界、媒体界的友好力量。这

是一个以十年、二十年为周期的长期投资，不是短期的情报行动。

美国在 2019 年之后开始大规模关闭孔子学院，目前大部分已经关闭。但孔子学院关掉了，统战部在美国高校里的其他渠道并没有关掉，只是换了名字，换了组织形式，继续存在。

海外华人社区是这套新工具里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维度，也是最深入的一个。统战部在全球华人聚居地区建立了密集的组织网络，以同乡会、商会、学生会、文化协会的名义出现，覆盖了从纽约到悉尼、从多伦多到伦敦的几乎所有主要华人社区。这些组织的功能是多重的：监控海外华人的政治立场，向北京汇报持异见者的活动，在选举期间动员华裔选民支持特定候选人，以及在关键时刻组织华人社区表达对北京政策的支持。

对于住在海外的普通华人来说，这张网是无处不在又几乎看不见的。你参加同乡会的年夜饭，你在微信群里转发春节祝福，你参加商会组织的商务论坛，你不知道这些活动背后有多少和统战部的网络有关联。你更不知道，如果你在公开场合批评了北京的某项政策，你的名字可能已经被记录在某个地方，等到你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需要在国内办什么事的时候，那个记录会以某种方式发挥作用。

这是一种比枪更有效的控制，因为它不需要任何明显的强制，它靠的是人们对可能后果的模糊恐惧。

华为、中兴这些企业是新工具箱里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对华为的担忧不只是技术层面的，不只是担心通讯设备里有后门，更深层的担忧是：当一个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大量依赖来自中国的技术和设备，这个国家在面对来自北京的压力时，还有多少独立行动的空间？这个问题不是假设，是活生生的地缘政治现实。

把这些新工具和本系列前面讲的那些旧故事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件令人不安的事：逻辑完全一样。

五十年代，中联部向马共的领导人承诺支持，让他们继续打仗，然后在需要改善和马来西亚关系的时候，一个电话停掉所有援助。今天，统战部向海外华人社区的领袖们提供各种资源和荣誉，让他们在当地社区里为北京发声，然后在他们不再有用或者开始表达独立立场的时候，通过各种渠道施压，让他们知道不合作的代价。

五十年代，中共向法塔赫派遣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帮助阿拉法特建立组织架构，但同时保留着随时切割关系的选项。今天，中共通过〝一带一路〞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输出贷款和基础设施，帮助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建立政治遗产，但同时在贷款协议里埋下各种条款，确保北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关系转化为政治筹码。

棋子的形态变了，棋手的逻辑没有变。

习近平上台之后，这套新工具的使用力度大幅加强，同时变得更加急迫和冒进。原本那些需要以十年、二十年为单位慢慢经营的布局，开始被要求在更短的时间内产生可见的效果。这种急迫性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暴露。

澳大利亚的政治献金案是暴露，加拿大的选举干预报告是暴露，德国的议员被策反是暴露，黑命贵运动背后的中共资金链被追溯是暴露。这些暴露接连发生，不是因为西方情报机构突然变得更聪明，而是因为操作变得太急、太粗，留下了太多可以被追溯的痕迹。

邓小平当年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把中共在东南亚的武装革命布局悄悄收掉，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国际反应。习近平用了不到十年，把几代人辛苦建立的新型渗透网络大规模暴露在西方民主国家的视野之下，触发了一场全球范围内针对中共影响力行动的系统性反制。

这个代价有多大，现在还看不清楚全貌，但可以确定的是，那张花了几十年才织成的网，正在被一个网眼一个网眼地拆开。

但网被拆开之后，那些被编进网里的人怎么办？那些在海外华人社区里参与了统战活动的人，那些接受过中共关联资金的外国政客，那些在孔子学院里工作过的学者，那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棋子的人。他们的处境，和当年在缅北丛林里的知青、在马来西亚丛林里的马共游击队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被编进了一个自己看不清楚的游戏里，等到游戏结束，没有人会替他们收拾残局。

马共的普通战士老死在泰国边境的旅游景点里；缅北的知青回到中国之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那些今天被统战部网络编织进去的棋子们，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历史已经给出了足够清晰的参考答案。

这个系列从缅北丛林里哭着冲锋的年轻人开始，到这里结束。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棋子，同一只手，同一个逻辑。

那只手从来没有停过。

编辑：胡景　校对：熊辩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政治民主》

民主政体的形成 - 政治参与意识（第八期）

作者：祝正明

公民是否有政治参与意识，是民主政治能否建立并长期维持下去的关键。民主社会政府的构成与行为完全取决于大多数公民的观点与信念。具体包括：政府机构应该如何设置？政治家应起何作用？政府应该如何运作？

民主得以实现，社会的政治活动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必须使反对派有机会建立自己的组织，表达不同的政治见解；第二，必须有明文条例使公众能通过周期性的选举控制官员，当选民选择其他领导人后，原政治领导人必须自觉下台。

民主政治若要成功，民众必须有两种普遍的素质：第一，关心政治，坚信自己的判断，容忍各种内容背道而驰的政治宣传；第二，当多数人的意志与他们的意见相反时，必须乐意服从。如果各党派团体固执己见，势必使国家陷入无休止的纷争之中。

例如按照宪法的规定，某位总统候选人获得了竞选的胜利，应替换原总统，如果只有宪法的规定，这件事并不会发生，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全体人民对竞选规则已有了事先的了解，都一致认为必须去遵守，包括落选者的支持者们在内，他们事先就有思想准备，尊重选举结果，如果是对方获胜，就接受对方的领导。同足球比赛一样，大家按规定的方式往对方球门踢球，时间一到，进球少的一方就要自动认输。

公民持有何种政治观点与政治期望是决定与控制政府行为和官员作风的根本因素。如果公民根本就不指望政府官员会考虑自己的意见，不指望决策者对自己负责，对官员的武断与反复无常不闻不问，认为贪污腐败是正常现象，就会给独裁专制创造天然条件，独裁专制就会自然衍生并发展壮大。许多国家尽管有良好的宪法，但却仍转变成为一党制或军事独裁，其原因就在于社会大众没有民主的信念，没有联合起来采取主权人的行动，使国家只有民主的形式，没有民主的实质，民主成了统治者骗人的招牌。

因此，公民必须坚定地期望政府能按公众的意志办事，官员能做到真正有效地为自己服务，公民对政府所抱的高度期望是民主社会的政治能按照民意长期运作的唯一保证。民主社会的公民绝非是麻木的、绵羊式的，而是睿智的，活跃的。

一项国际性民意调查表明，不同国家的普通公民对自己的政治影响能力具有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参见下表。调查提问的内容为：对一条不公正的法令，你认为你能对它的修改发挥影响吗？

表中数据为回答“是”的人所占的百分比。

	美国	英国	西德	意大利	墨西哥
全国政府的法令	75%	62%	38%	28%	38%
地方政府的法令	77%	78%	62%	51%	52%

一个国家的百分数高，并不能说明这个国家的社会就是最民主的社会，它只能说明这个国家的民主气氛更活跃，民主的理论更深入人心，民主政治的信念得到了百姓和官员的更多认同。这些基本的信念是：

- 政府的统治必须建立在人民的同意之上；
- 政治必须按照人民的意志办事，对人民负责任，人民为国家政治权力的来源；
- 人人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和机会平等；
- 多数人统治；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保护公民中少数人的利益；
- 言论自由；
- 新闻出版自由；
- 信仰自由；
- 结社自由；
- 选举是选择领导人的最好办法；
- 落选者必须主动地，安静地交出领导权；
- 不负责任的、不正派的、品德低下的人必须马上离开政府领导岗位；

	美国	英国	德国	意大利	墨西哥
认为自己能受到政府官员的平等待遇	83%	83%	65%	53%	42%
认为普通人在社团中很活跃	51%	39%	22%	10%	26%

政府官员只是行政权的受托人，他们不是人民的主人，只是人民利益的代理人。只要人民高兴，随时可以把他们抬起来，也可以把他们拉下去，他们只有服从的义务，无权争论条件，讨价还价。他们的任务是去做人民要求他们做的事情，不要少做，也不要多做，因为多做时常也会是一种侵权行为。

注：表中数据为一些国家的公民在接受一项民意调查时对所提问题持肯定观点的人所占的百分数。

人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动物，再聪明仔细的人也可能犯错误，达官贵人在传统上有轻视平民的习惯，懒惰与自信的本能时常使官僚们忽视了百姓的利益还常常毫无察觉。因此，民众必须警惕政府官员的行为，监督他们，评论他们，通过集体的力量撤换他们。

民众可以非常关心政治领导人的产生，但他们并不能告诉领导人如何去制定政策，他们只能对政策作出评价，当政策对他们的利益产生影响时作出反应，并在下届选举时决定是否投该领导人的票。民意可以告诉领导人往什么方向去做，但并不能告诉领导人怎样去做。

民主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类似于一种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通用的思维和交流方式，人们掌握一种新的语言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但当人们一旦掌握和习惯了它，要人们不再使用它，就不再可能。

第六章民主政体的形成

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几乎实行的都是专制统治，一部分人总是控制着另一部分人，要他们缴纳劳动所得，甚至掌握着他们生杀大权。但是，这并不符合人类自由的天性。只要一有机会，被控制压迫的一方就会起来反抗，改变控制关系，使自己成为新的控制者。人类社会的权利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种斗争有时是如此惨烈，以至于不仅摧毁掉经过数十代人才创造出来的文化和物质财富，甚至使千千万人自己也在搏杀中丧命。这种以强权进行统治的模式严重阻碍着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与人类已有的文明、理性和智商不相容，文明社会必须及早摒弃。

（一）民主政治的起源

人类对自由和和平生活的向往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理想美好政治制度与社会模式的探索也从未中断过。早在两千四百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就设想了一个政治平等、个人自由的国度。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出对君主的权力应有所限制，主张公众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财产公有、发展教育，这一理论对促进当时古希腊模式选举制度的建立并带动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作出了贡献。与柏拉图年代相当的东方的孔夫子，则提出“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哲学思想，其用意亦在于劝告社会中的强者适当地克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为，缓和社会矛盾。这对中国保持数千年的相对繁荣与东方强国地位也起到一定作用。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人类社会的稳定与和睦共处作出了贡献。四百八十多年前，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只要财产属于私人所有，就不可能根除贪婪、纷争、掠夺、战争以及一切社会不安定因素。莫尔在他 1516 年出版的《乌托邦》—— 书名含义为“最完美的国家制度”—— 一书中，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实行财产公有制，不管什么产品，吃的还是用的，都汇集到每座城市的指定市场，家家户户到市场取用东西，不付钱，也不付任何其它代价，数量不受限制。因为该国物资充裕，取之不尽，在自己家里积存物资完全是多此一举；他们不生产工艺品、美术用品以及其它只能供奢侈享受而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物品；以农为本、重视教育、医疗免费、每天工作六小时；由于彻底废除了私有制，因此住宅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无需门锁，并可以随意调换住宅。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共产主义大家庭。

但是，莫尔并未构想出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因此，他只能算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空想家。

一百二十年前，真正的无产者马克思将实现这一空想的方法具体化。即由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暴力手段没收有产者的财产，来实现这一伟大理想。第一个以此方式成立的政权 —— 巴黎公社 —— 不久成立，但是，在其短暂的七十二天生命中，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及不可妥协性成了其过早夭折的重要原因。这也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缺陷之一：它无力解决领导人之间的内部矛盾分歧，这种矛盾时常严重到使其行政组织陷于瘫痪的地步。

巴黎公社尽管失败了，但是对理想国的坚定信念，最终还是使地球上成立了许多类似模式的国家。然而，几十年的实践表明，公有制并未能改变老百姓的地位。消灭了私有制，并不能消灭掉人的私心。在公有制社会，仍然需要管理者，而这些管理者很快就会变成特权阶级，演变成新的贵族。而且，由于所有生活资料的分配使用权都掌握在少数官员手中，百姓被剥夺了一切个人财产，很快就使百姓陷入了更加险恶的境地，被任意调拨驱使，出现新的剥削与压迫。而获得政权的工具 —— 军队，成为了新的统治者维持自己统治的暴力机器。“公有制”与“人民当家作主”并无因果关系，一种是经济制度，一种是政治制度，经济改革并不能解决政治问题。可以说，实现财产的公有制在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中并非是成功的尝试。同莫尔一样，马克思只是一个哲学家、思想家，或许可以被称为是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但绝不是一个政治家和政治学家。

相反，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反独裁专制的变革尝试，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纵观历史，古希腊实行民主选举执政官的制度，曾使其强盛一时，成为爱琴海地区的霸主，并带来了文化、艺术、哲学的繁荣，成为今日欧洲文化的发源地。古罗马实行的政治民主也有同样的效果，由贵族组成的元老院百人大会每年选举一次国家的执政官，并以选举产生权力相对独立的大法官、检察官，实行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决策，促进了国家有序合理的管理，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繁荣，使罗马帝国空前强大，在其短暂的五十三年历史中，征服了包括西班牙、大不列颠、土耳其在内的几乎整个欧洲，以及北部非洲的广大地区。

古罗马之所以强盛是由于有良好的政治制度，使罗马内部的各种势力得到协调和平衡，避免了权贵之间的内部斗争，一致对外。元老院组织健全，执政官忠于职守，法律开明，检察官廉洁奉公，社会民风朴实，思想自由。元老院是国家兼有立法和管理权的机关；执政官是最高

行政长官，每年由百人团会议选出两人，任期一年，享有最高指挥权；检察官是大罗马权力独立的高级长官，选举产生，任期五年，主要负责户口调查，财产登记和征集壮丁，后兼管财政事宜，监督风纪。只是后来由于国家扩张的速度过快，导致执政官的权力膨胀，掌握了全部立法、司法大权，少数贵族重新独揽了军事、宗教、政治及其它一切职位，恢复了专权，废弃了选举制度，最终使国家走向衰败。

在十六世纪的英国，一部分有团体意识、有社会地位的人逐渐结成同盟，他们怀有敌意地与王权相抗争，最终推动社会走向了议会制民主政治道路。十七世纪中叶，英国首先发生资产阶级大革命，限制了国王的权力，开辟了民选议院参政议政的先例，首先带来了产业革命，国力大增，使其在其后的两百年里，势力迅速扩展到全世界，在大于其本土一百四十倍的土地上建立了殖民地。美国民主制度的确立，使北美从一个荒无人烟、土地板结的原始未垦地，迅速发展成为世界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汲取各国之精华，在工业、农业、科技发展上独领风骚。而日本 1868 年的明治维新，引进西方民主模式，使其从一个以农业为主、工业资源极其匮乏，在文化、艺术上经常派人向中国学习的儒教岛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军事大国。

民主政治制度的成功及其所制订的政策的合理、明智、人道，极大地理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信心与志气。它给社会带来的自由平等，为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希望。成为全世界人民人心所向的一种政治制度，以至于许多大独裁者也念念不忘对民主的敬意。希特勒曾公然宣称他所建立的制度是“更高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墨索里尼 1937 年 9 月在柏林的一次演讲中吹嘘：“在世界上今天存在的最伟大而健全的民主国家就是意大利和德国”。这些民主的敌人亦迷惑性地表示忠于民主，正表明民主的理想对现代人具有的巨大吸引力和普遍的感召力。恩格斯也曾说：“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❶。列宁则表示：“无产阶级民主要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❷。

民主化进程是一个逐渐发展演变，逐步完善的过程。在大多数已经实现政治决策民主化的国家历史中，有权参与政治决策的公民的数量都有一个逐渐递增普及的过程。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有权参政议政的只限于自由人；在英国，早期的民主只限于

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664 页。
❷《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634 页。

贵族，后来延伸到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在美国、法国、日本的民主政体建立的初期，拥有选举权的人曾被限定为有文化、有财产的纳税人，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公民文化水平的普及提高，纳税限制与性别限制被逐渐取消，选举权扩展到全社会所有的成年人。实际上，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限制选举权也许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对于一个存在大量的，几乎没有任何文化知识，没有阅读能力的文盲的社会，实行广泛的民主，也许不会带来明显的好处。但是，遗憾的是，这在当时被少数贫困的文人作为政治不平等的实例，成为无产者以暴力夺取和没收有产者财产的借口。

可以说，西方民主革命最初是一场中产阶级的革命，受益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其领导者有许多是贵族阶级，支持者主要是工薪阶级，而工薪阶级最终成为永久的受益者。因为民主政治是多数人的政治，工薪阶级在任何社会都占据多数。

在当今世界，民主政治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改进，已经摸索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模式。同任何其它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理论一样，民主政治理论也是人类共同创造、积累的财富，而不是任何个人的发明，对其学习与使用并不会受到任何出于自私心态的限制。因此，因种种原因尚未能实现民主而欲实现民主的国家，已用不着从头摸索民主制度的建立，只要对已有的大量的理论与经验，进行学习与吸收即可。就像在自然科学领域一样，对前人作出的发明创造，不需要再化巨大的时间、精力、经费去研究开发，要做的是，只是派人去学习借鉴。实际上，已经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们，通常都很乐意帮助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人民实现民主。在民主化社会，社会科学、政治科学同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一样，向任何人敞开着大门，接受任何人的求学，也接受任何人的贡献。它们本身就是全人类智慧的财富，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服务。

编辑：赵杰　校对：孔祥庆　美编：胡海宁

杂志社组织架构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中 国 民 主 党 主 办

Sponsored by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在野党》杂志社

总 编 辑：朱 虞 夫
社　　长：郑 存 柱
出 品 人：景 辉 辰

荣誉主编：
毛庆祥（发起人）**谢长发**（倡导人）**胡石根 陈西 吕耿松 查建国 陈树庆 许万平 刘贤斌 胡明君 黄燕明**

副总编辑暨副社长：鲁慧文
副总编：冯仍
轮值总编辑：冯仍 / 吕锋
日本分社社长：漠北独侠 / 漠北孤侠
副主编：张致君 陆乾坤
编辑部：李聪玲（部长） 李晶（副部长） 钟然（副部长） 胡丽莉 冯仍 周志刚 赵杰 韩立华 黄吉洲 胡景 Gloria Wang Geoffrey Jin
收稿部：马群（部长） 戈冰（副部长）田家元
校对部：程筱筱（部长） 熊辩（副部长） 王滨 毛一炜 孔祥庆 周敏 易勇
翻译部：吕峰（部长） 周敏（副部长） 戈冰 沈美花
美编部：胡海宁（部长） 阎梦菁（副部长） 刘敖（副部长） 宋佳航 傅贻红 张帆 张婷
采访部：贾嘉（部长）沈美花（副部长）缪青（旧金山记者站站长）陀先润 侯冰封 郝剑平 庄帆 韩震 唐鑫
宣发部：Gloria（部长） 彭硕（副部长） 曾群兰（副部长） 夏体姗（副部长） 何愚 黄吉洲 李延龙 程筱筱 张晓丽 Rong 汪洋 易勇
信息技术部：卢新虎（部长） 卢超（副部长）李建伟 张湘潇 程筱筱 张荣鑫 姜俊良 吕峰 胡丽莉
人权观察部：黄吉洲（部长） 张维清（副部长） 陈娟（副部长） 何愚 老默 王晓华 周敏
公关事务部：李享（部长） 王连江（副部长） 黄国安（副部长） 宋娟华（副部长）翼超 张帅 刘乐源 蔡政 黄剑强
外联部：张致君（部长）赵杰（副部长）王海霞（副部长）史庆梅（副部长） 常坤 张俊杰 权录军 汪洋 Rong
党史部：何愚（部长） 周兰英（副部长）
新媒体部：小舞（部长） 王晓华（副部长） 周兰英
财务部：朱晓娜（部长） 高晗（副部长） 朱小砚（出纳） 张致君
行政部：吕聪（部长） 张宇（副部长） 陈婷
法务部：陈闯创 郑存柱

投稿与联络方式

URL:www.ZYD1998.com
Email:zaiyedang1998@gmail.com
Tweet: @zaiyedang1998
Address:228 N Garfield Ave #202,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Telephone:+1-626-889-0419（张致君）

亲爱的读者与战友们：

《在野党》是我们共同的火种，承载着无数中国民主志士二十七年来前仆后继的牺牲与期盼。这份刊物从1998年的呐喊中诞生，在铁蹄与暴力下中断，却从未泯灭我们追求自由与正义的信念。今天，我们《在野党》重新出发，这不仅是一次杂志的复刊，更是为中国民主、人权与法治而战斗的庄严誓言！

一路走来，我们深知前方依然布满荆棘。但我们也更加明白，只要有您的支持，这盏希望之灯就能持续燃烧。您的每一份捐款，都将帮助我们支付杂志制作、印刷与发行费用，帮助我们搭建更加广阔的传播平台，也为我们调查迫害案例、组织采访交流提供有力保障，让《在野党》成为海内外民主力量集结的号角，让真相与呐喊直达世界各个角落。

历史的洪流正在前行，我们呼吁您与我们一起，不再沉默，不再退让！请扫描本页二维码，以 Zelle 捐款支持我们，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共同守望一份对自由的承诺、一份对正义的坚持、一份对美好未来的追求！

您的善意将铭刻在《在野党》的史册中，您的力量也将成为中国民主进步最真实、最可贵的见证！

如有国际合作与联系意向，也欢迎通过 zaiyedang1998@gmail.com 与我们取得联系！请关注我们的官方推特：@zaiyedang1998，与我们保持密切互动，共同见证并参与这场改变中国未来的努力！

抗共救国，我们是认真的！为了中国民主自由，我们更加坚定！

《在野党》杂志社 敬上

Send Money with Zelle®
OPPOSITION PARTY INC

Zelle®

可直接转账到 Zelle 账号 zaiyedang20250625@gmail.com
收款名称为：Opposition Party INC

《在野党》2026 年 9-10 月接收的捐款信息如下：

捐款日期	捐款者姓名	捐款金额	捐款用途
September 16, 2026	Jianqiang Huang	$200.00	捐助杂志社
September 16, 2026	Yunhui Ge	$150.00	捐助杂志社
September 17, 2026	Jiawei Wang	$150.00	定向捐助邹巍眷爱宗
September 21, 2026	Jisen Zhao	$180.00	定向捐助邹巍眷爱宗
September 28, 2026	Chao Ji	$200.00	捐助杂志社
September 28, 2026	Shuai Zhang	$100.00	捐助杂志社
October 5, 2026	Xiang Li	$1000.00	定向捐助朱虞夫
October 5, 2026	Chao Ji	$100.00	捐助杂志社
October 5, 2026	Lequan Liu	$100.00	捐助杂志社
October 5, 2026	Zheng Cai	$100.00	捐助杂志社
October 5, 2026	Xiang Li	$100.00	定向捐助朱虞夫

幕 后 团 队

《在野党》并非在真空中完成。

从选题策划、内容编辑、事实核实与语言转换，到版式设计、校对、发布与长期维护，每一期的完成都依赖一支长期协作、分工明确的幕后团队。

团队成员分别承担文字编辑、资料核验、翻译协调以及版式与技术支持等工作。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出现在显眼位置，但正是这些持续、稳定的专业劳动，构成了杂志得以按期完成并保持质量的基础。

编辑与出版岗位分工说明：

一、内容策划与选题统筹

由编辑团队共同完成选题方向的确立与内容结构规划，确保刊物在价值立场、主题连续性与公共讨论深度上的一致性，构成每一期内容生产的起点。

二、记者与写作

由前线记者、特约作者及撰稿人员组成，负责采访、资料整理、事实核实与写作，为刊物提供第一手文本内容与信息来源。

三、编辑与校对

由编辑团队对稿件进行结构性编辑与语言修订，并由校对人员对定稿内容进行文字、标点、事实与格式层面的复核，确保文本准确性、严谨性与出版一致性。

四、翻译与语言支持

由翻译与语言支持人员负责中英文内容的互译与语言协调，确保各语言版本在语义、语气与信息完整性上的一致，为刊物的跨语言传播提供保障。

五、版式设计与出版制作

由幕后制作团队完成刊物整体版式设计与出版制作工作，包括版式系统设定、页面结构规划、文字与图像编排、双语内容技术适配，以及印刷与数字版本的最终文件输出与校验。该环节承担将内容转化为可持续出版成品的关键制作流程，是刊物按期完成与质量稳定的重要保障。

六、发行与传播支持

由相关支持人员协助完成刊物发布、传播渠道协调与读者反馈整理，使出版成果进入公共视野并形成持续影响。

荣 誉 墙



吕峰，*中国民主党党员，《在野党》杂志翻译部部长，同时参与宣发部和信息技术部的工作，长期从事杂志稿件翻译、网站维护及宣传推广等工作。*

在具体工作中，他主要负责稿件的翻译与校对，并及时将稿件上传至网站，同时对已上传的相关稿件进行格式整理和调整。在线上线下，他都积极参与杂志的宣传推广，为提高杂志的知名度作出贡献。此外，他还积极为杂志撰写文章并投稿，关注国内民生及社会问题。

他始终保持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在翻译、宣发及网站维护等岗位上持续付出，为提升杂志内容质量和扩大杂志影响力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贾嘉，*中国民主党党员，现任《在野党》杂志采访部部长，长期关注中国民主、自由、人权与法治等公共议题，并积极参与杂志采访及相关公共事务。*

在具体工作中，她主要负责采访选题策划、人物联络、访谈及采访内容整理，长期关注民主人士、社会活动人士和重要公共事件，通过真实记录与深入访谈，呈现不同声音，保存时代记忆。同时，她也持续跟进相关议题，为杂志采访报道和公共传播提供内容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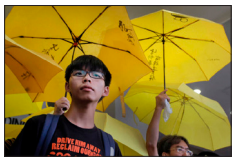
她始终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投入采访工作，在人物访谈、内容整理及公共议题记录等方面持续付出，为丰富《在野党》杂志内容、提升采访质量和扩大公共影响力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黃之鋒（1996 – ）
香港青年民主運動的標志性人物

十五歲，他以少年的聲音走上街頭；十八歲，他的身影出現在雨傘撐起的香港；二十四歲，他再次走進鐵窗。2026 年 10 月 13 日，黃之鋒在獄中迎來了三十歲生日。沒有自由的慶生，沒有親友的團聚，祇有鐵窗內外無聲流逝的歲月。從反國教運動到爭取普選，從街頭呐喊到身陷囹圄，他把人生最燦爛的年華，留在了香港風雲激蕩的歷史之中。曾經那個以稚嫩聲音追問時代的少年，如今已步入而立之年。他的命運，不僅記録着一個年輕人的成長與磨難，也映照着一座城市在理想、權力與時代巨變之間的掙扎。

三十歲，本該是人生盛放的年紀；而他的青春，却仍在鐵窗中等待黎明。







An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China
© 2026 All rights reserved.

在野堂™
www.ZYD1998.com

9 773069 451168

《在野党》ISSN 3069-4515 本刊为非营利政治刊物，所有销售收入将公开用于：资助受政治迫害者及家属；支持中国民主党行动；支持《在野党》杂志运营与国际传播。建议售价：$25.00